

2025年9月3日紀念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

抗戰時期的毛澤東 雄才偉略救中國

黃金富 編著



A15

香港同胞永遠不
八個月的痛苦歲月

2025年9月3日紀念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

抗戰時期的毛澤東 雄才偉略救中國

黃金富 編著



統一碼出版社

香港同胞永遠不會忘記三年零八個月的痛苦歲月



本書編者簡介

黃金富，廣東東莞清溪人，香港星光傳訊創辦人、中國專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創辦人、亞非拉知識產權聯盟（控股）有限公司發起人、亞非拉知識產權聯盟協會有限公司發起人、香港毛澤東詩詞研究會會長。曾任北京大學顧問教授、北京大學知識產權學院董事會主席、上海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名譽院長、中國知識產權研究會理事。

黃金富上世紀80年代曾資助多項國內重要發明到國外申請專利，更先後捐款資助成立北京大學知識產權學院、上海大學知識產權學院，為促進中國知識產權事業而作出巨大貢獻。

統一碼出版社



抗戰時期的毛澤東 雄才偉略救中國

黃金富 編著

黃金富

2025年7月24日

統一碼出版社

書名：抗戰時期的毛澤東 雄才偉略救中國

編著：黃金富

出版：統一碼出版社

香港上環干諾道中 158 號 開僑商業大廈 21 樓

電話：+852 2681-1238

傳真：+852 2770-0222

網址：www.1226 8341.com

www.1226 8341.org

版次：2025 年 7 月 24 日 初版

書號：978-988-70287-6-5

Publish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本書編者
黃金富微信

前 言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正義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戰爭。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在中華民族瀕臨亡國滅種的抗日戰爭中，發揮了扭轉乾坤的巨大作用，創造了弱國打敗強國的奇跡。

毛澤東在抗戰中發表了《論持久戰》等著作，提出了持久抗戰的戰略思想，為抗戰的勝利奠定了理論基礎，強調要充分利用中國的地理和人口優勢，以及人民的抗戰熱情，積小勝為大勝，最終戰勝日本侵略者。以他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倡導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凝聚全民族力量共禦外侮。並在敵後地區建立了眾多根據地，通過靈活機動的游擊戰術，形成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夾擊侵華日軍的戰略格局，對日軍形成了有效的牽制和消耗，為抗戰的勝利做出了貢獻。

抗日戰爭的勝利，改寫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被外敵入侵而屢屢戰敗的屈辱歷史，維護了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基礎。

本書蒐集了抗戰時期毛澤東的相關事跡和主要著作，希望能通過抗戰歷史傳承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精神。本書的出版是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緬懷抗戰期間為國犧牲的抗日英雄烈士，希望能夠喚醒和提高年輕一代人的愛國情懷，弘揚民族精神。本書雖為編者傾心盡力而作，但由於個人能力水平有限，其中謬誤與錯漏之處在所難免，敬請各位讀者不吝指正。

黃金富

2025年7月24日

目錄

第一章 九一八事變 —— 拉開了日本侵華戰爭的序幕.....	1
第二章 西安事變 —— 國共兩黨合作共同抗日.....	7
第三章 實踐論 —— 為抗日戰爭提供正確的理論指導.....	15
第四章 矛盾論 —— 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理論武器.....	33
第五章 論持久戰 —— 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	76
第六章 眾志成城奮勇抗戰 —— 最終打敗日本帝侵略者.....	162
聯繫我們.....	181

第一章

九一八事變 ——拉開了日本侵華戰爭的序幕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瀋陽市附近發動的軍事行動，炸毀南滿鐵路柳條溝地區橋梁一段，並誣指中國軍隊破壞鐵路。當日夜間日本關東軍向國軍東北駐地「北大營」和瀋陽發起猛烈進攻，當時駐瀋陽東北軍領袖張學良判斷錯誤，下令「不抵抗」與「不正面衝突」，並撤至山海關內，導致關東軍迅速佔領了南滿、安奉鐵路沿線的重要城鎮。隨後又向長春等地發起進攻，佔領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整個中國東北近100萬平方公里土地和3000萬同胞，迅即陷入日軍手中，拉開了日本侵華戰爭的序幕。此後，日本以清朝遜帝溥儀的名義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傀儡政權，對東北3000多萬人民進行長達14年極其殘暴的殖民統治和掠奪。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了《中國共

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號召全中國工農勞苦民眾一致動員武裝起來，給日本強盜與一切帝國主義以嚴重的回答。隨後，又發表了一系列宣言和決定，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批判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並採取切實的措施，建立抗日游擊隊，組織和領導各界民眾開展抗日鬥爭。

1932年4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發表《對日戰爭宣言》，正式宣佈蘇維埃政府對日宣戰，號召全國工農兵及一切勞苦大眾，一致起來進行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徹底爭得中華民族真正的獨立與解放。

1935年10月26日，紅十五軍團發起榆林橋戰鬥，全殲國民黨軍東北軍第107師第619團等部，俘獲了曾任張學良衛隊營長的高福源¹。紅軍不僅沒殺他，而且認真執行毛澤東提出的優待俘虜的政

1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頁483。

策，妥善地給他悉心治傷。同時還向他講解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道理，讓他瞭解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反動實質，提出了紅軍與東北軍聯合抗日的建議。毛澤東制定的統一戰線和俘虜政策，終於使高福源思想發生了變化，他決定返回東北軍去勸說張學良，走聯共抗日的道路。

高福源返回東北軍軍部，向張學良痛哭陳詞，成為促使張學良下決心走上聯共抗日的重要因素。張學良當即委派高福源再返紅軍駐地，請紅軍派正式代表與東北軍談判聯合抗日問題。

毛澤東親自接見了這個「俘虜特使」，並感謝他為國家民族辦了一件大好事。以後紅軍與張學良頻繁接觸，促使張學良走上了聯共抗日的道路，在西北形成了紅軍、東北軍、西北軍「三位一體」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局面。化敵為友，昔日與紅軍作戰的東北軍、西北軍，成了紅軍抗日的同盟軍。²

1935年12月17日至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西省安定縣瓦窯堡召開的擴大會議，討

2 參見嚴奉平主編，《跟毛澤東學智慧》，頁228。

論與抗日戰爭路線有關的軍事問題和政治問題，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12月27日，毛澤東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³。報告論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以及共產黨和紅軍在這個統一戰線中的具有決定意義的領導作用，並指出：共產黨和紅軍不但在現在充當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而且在將來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軍隊中必然要成為堅強的台柱子。只要共產黨和紅軍本身是存在的，發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然也會是存在的，發展的。這就是共產黨和紅軍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共產黨人現在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他們能夠善處自己，又能夠善處同盟者。

1936年2月，毛澤東和彭德懷率領紅軍長征部隊到達陝北清澗縣袁家溝，準備渡河東征，開赴華北抗日前線。毛澤東為了視察地形，登上海拔千米

3 參見《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一卷，頁142。

白雪覆蓋的塬上。目之所視，群山環抱、溝壑縱橫、千里冰封、萬里雪飄，不禁感慨萬千，詩興大發，揮筆寫下《沁園春·雪》這首氣勢磅礴為世人所稱頌的壯麗詞章：

běi guó fēng guāng , qiān lǐ bīng fēng , wàn lǐ xuě
 北 國 風 光 ， 千 里 冰 封 ， 萬 里 雪
 piāo 。 wàng cháng chéng nèi wài , wéi yú mǎng mǎng 。 dà hé
 飄 。 望 長 城 內 外 ， 惟 餘 莽 莽 。 大 河
 shàng xià , dùn shī tāo tāo 。 shān wǔ yín shé , yuán chí
 上 下 ， 頓 失 滔 滔 。 山 舞 銀 蛇 ， 原 馳
 là xiàng 。 yù yǔ tiān gōng shì bǐ gāo 。 xū qíng rì ,
 蠟 像 。 欲 與 天 公 試 比 高 。 須 晴 日 ，
 kàn hóng zhuāng sù guò fèn wài yāo ráo 。
 看 紅 裝 素 裹 ， 分 外 妖 嬈 。
 jiāng shān rú cǐ duō jiāo , yǐn wú shù yīng xióng jìng
 江 山 如 此 多 嬌 ， 引 無 數 英 雄 競
 zhé yāo 。 xī qín huáng hàn wǔ , lüè shū wén cǎi ; táng
 折 腰 。 惜 秦 皇 漢 武 ， 略 輸 文 采 ； 唐
 zōng sòng zǔ , shāo xùn fēng sāo 。 yí dài tiān jiāo , chéng
 宗 宋 祖 ， 稍 遜 風 騷 。 一 代 天 驕 ， 成
 jí sī hán , zhǐ shí wān gōng shè dà diāo 。 jù wǎng yǐ
 吉 思 汗 ， 只 識 彎 弓 射 大 雕 。 俱 往 矣
 , shǔ fēng liú rén wù , hái kàn jīn zhāo 。
 ， 數 風 流 人 物 ， 還 看 今 朝 。

——毛澤東《沁園春·雪》（1936年2月7日）



這首《沁園春·雪》寄情於景，以古襯今，禮

6 抗戰時期的毛澤東 雄才偉略救中國

讚了我國的壯麗河山，抒發了毛澤東前無古人的巨大胸懷與氣魄，具有不可抗拒的藝術感染力。

第二章

西安事變

——國共兩黨合作共同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在西安實行「兵諫」，將前來佈置“剿共”的蔣介石和十多名軍政要員扣留，迫使他停止反共內戰，實行聯共抗日，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⁴

張學良、楊虎城宣佈取消“西北剿匪總部”，成立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張學良、楊虎城分任正、副委員長。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國民政府，停止內戰，釋放救國會領袖及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實行孫中山遺囑，召集救國會議等8項主張。當天清晨，張學良、楊虎城聯名打電報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邀請中共代表團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國大計，處理捉蔣的善後有關事宜。

4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頁620。

當天上午 8 時，毛澤東看到張學良發來的電報：「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⁵

當時，全國民眾包括共產黨一部分人都強烈要求嚴懲蔣介石，以絕後患。然而，毛澤東提醒紅軍幹部注意：「我們必須明白，這次蔣介石被捉，既不同於俄國十月革命被捉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也不同於滑鐵盧被擒的拿破崙。前者是革命勝利的結果，後者是軍事失利的必然。這次抓蔣介石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備，他的軍事實力還原封不動地保留在那裏，如果我們不殺他，通過談判，逼他改變態度，把軍事力量用到抗日上去，豈不更好麼？如果我們只記黨和個人的恩怨，忘記民族危亡這個大局，那是不行的，我們要從中華民族的利益出發，不能給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我國創造條件。」⁶他深刻地分析道：

5 參見張學良給毛澤東、周恩來的電報，1936年12月12日。

6 參見嚴奉平主編，《跟毛澤東學智慧》，頁301。

「若殺掉蔣介石，就正好中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親日派的下懷。因為群龍無首，各派軍閥必將為爭權奪利而大打內戰，這就給日本帝國主義提供了最好的侵略機會。」⁷

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國民政府中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主張進攻西安，藉機擴大事態，奪取蔣介石的統治權力，進一步與日本妥協，並派飛機轟炸西安臨近地區。

最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分析了國內外形勢，確定了以民族抗戰的大局為重，力促張學良、楊虎城釋放了蔣介石，使事變得以和平解決，推動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實現團結抗日。

毛澤東高瞻遠矚，從顧全大局出發，從民族大義出發，不計個人恩怨得失，胸懷坦盪，寬宏大量，毅然放蔣介石的寬廣胸懷和高風亮節，實乃我們學習和歌頌的榜樣。

7 參見嚴奉平主編，《跟毛澤東學智慧》，頁222。

全民抗戰，抵抗日寇

1937年7月7日深夜，在北平的盧溝橋附近，日本侵略軍在中國駐軍陣地附近舉行軍事演習，並謊稱有日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搜查，遭到中國駐軍嚴辭拒絕。日本侵略軍突然向中國軍隊發動進攻，中國駐軍第29軍37師219團奮起還擊，進行了頑強的抗爭，掀開了中國人民全民抗日的序幕。

7月8日，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指出：「中華民族已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只有全民族團結抗戰，才是中國生存和發展的唯一出路，必須立刻旗幟鮮明地喊出這個口號。」並率先向全國發出通電：「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⁸

8 參見《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解放》第1卷第10期，解放週刊出版社1937年版。

國民黨政府在這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也不得不進行抵抗日本侵略的準備。但國民黨對共產黨的疑忌太深了，在國共合作的談判中不斷橫生枝節，對兩黨關於建立統一戰線，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具體問題的談判卻遲遲沒有結果。

7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共產黨員和機關工作人員的緊急會議，號召「每一個共產黨員與抗日的革命者，應該沈著地完成一切必須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7月14日，毛澤東等致電葉劍英，要他轉告蔣介石：「紅軍主力準備隨時出動抗日，已令各軍十天內準備完畢，待令出動。」

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宣佈：「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7月23日，毛澤東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表示：「共產黨人願同國民黨人和全國同胞一道為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反對一切游移、動搖、妥協、退讓，實行堅決的抗戰。」

紅軍各部已陸續準備就緒，隨時準備開赴前線。

但是，在南京的國共談判卻並不順利，國民黨在各種問題上諸多留難。直到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直接威脅到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心臟地區和英、美等國的在華利益，談判才出現轉機，蔣介石不得不進行全國性的抵抗。

8月22日，根據國共兩黨達成的協議，國民政府軍委會宣佈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並同意設總指揮部，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指揮，下轄三個師。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佈命令，宣佈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八路軍從9月2日起，陸續從山西開赴華北前線。

1937年7月23日，毛澤東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明確提出實行堅決抗戰的方針，實行全國軍隊和人民的總動員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辦法。毛澤東向全黨全國呼籲：“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要求立刻給進攻的日軍以堅決的抵抗，並立刻準備應付新的大事變。全國上下應立刻放棄任何與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

8月22日至25日，中國共產黨在陝北洛川馮家村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著名的洛川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任弼時、關向應、劉伯承、賀龍、博古、彭德懷、張浩、林彪、聶榮臻、羅榮桓、張文彬、蕭勁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鍾、凱豐、張國燾、周昆共23人。會上討論確定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方針、任務及各項政策，毛澤東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指出：「現在已經開始政府的抗戰，而且得到人民的擁護，但人民還沒有大規模地參加，這就成為現在的弱點與今後的任務——使成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我們的方針最基本的是持久戰，不是速決戰，持久戰的結果是中國勝利。」⁹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洛川會議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十大綱領的主要內容是：「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二、全國軍事的總動員；三、全國人民的總動員；四、改革政治機構；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七、改良人

9 參見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8月24日。

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後方；十、抗日的民族團結。」

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明確地提出紅軍在抗日戰爭現階段的戰略方針以游擊戰爭為主。這是中國共產黨一個重大的軍事戰略轉變。毛澤東在抗戰剛開始、紅軍還沒有開赴前線的時候，經分析了客觀實際情況後，便及時地提出要這個戰略轉變，充分表現了他的遠見卓識。

第三章**實踐論****——為抗日戰爭提供正確的理論指導**

1937年4月至7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事政治大學講授哲學，並親自撰寫講義《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當時，由於中國共產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思想，使中國革命在1931～1934年遭受極大的損失，而教條主義者卻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迷惑了廣大的同志。毛澤東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主觀主義錯誤，寫成講授提綱的第二章第十一節，標題為《實踐論》，並於7月份在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作為講授哲學課時的講義。



《實踐論》¹⁰

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

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歷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瞭解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即認識對生產和階級鬥爭的依賴關係。

首先，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於物質的生產活動，逐漸地瞭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和自然的關係；而且經過生產活動，也在各種不同程度上逐漸地認識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關係。一切這些知識，離開生產活動是不能得到的。在沒有階級的社會中，每個人以社會一員的資格，同其他社會成員協力，結成一定的生產關係，從事生產活動，以解決人類物質生活問題。在各種階級的社會中，各階級的社會成員，則又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結成一定的生產關係，從事生產活動，以解決人類物質生活問題。這是人的認識發展的基本來源。

人的社會實踐，不限於生產活動一種形式，還有多種其他的形式，階級鬥爭，政治生活，科學和藝術的活動，總之社會實際生活的一切領域都是社會的人所參加的。因此，人的認識，在物質生活以外，還從政治生活文化

¹⁰ 參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282-297頁

生活中（與物質生活密切聯繫），在各種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種關係。其中，尤以各種形式的階級鬥爭，給予人的認識發展以深刻的影響。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因此，人們的認識，不論對於自然界方面，對於社會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即由淺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大家對於社會的歷史只能限於片面的瞭解，這一方面是由於剝削階級的偏見經常歪曲社會的歷史，另一方面，則由於生產規模的狹小，限制了人們的眼界。人們能夠對於社會歷史的發展作全面的歷史的瞭解，把對於社會的認識變成了科學，這只是到了伴隨巨大生產力——大工業而出現近代無產階級的時候，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實際的情形是這樣的，只有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物質生產過程中，階級鬥爭過程中，科學實驗過程中），人們達到了思想中所預想的結果時，人們的認識才被證實了。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於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人們經過失敗之後，也就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於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為勝利，所謂

“失敗者成功之母”，“吃一塹長一智”，就是這個道理。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為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排斥一切否認實踐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的錯誤理論。列寧這樣說過：“實踐高於（理論的）認識，因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還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論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它的階級性，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再一個是它的實踐性，強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

然而人的認識究竟怎樣從實踐發生，而又服務於實踐呢？這只要看一看認識的發展過程就會明瞭的。

原來人在實踐過程中，開始只是看到過程中各個事物的現象方面，看到各個事物的片面，看到各個事物之間的外部聯繫。例如有些外面的人們到延安來考察，頭一兩天，他們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觸了許多的人，參加了宴會、晚會和群眾大會，聽到了各種說話，看到了各種文件，這些就是事物的現象，事物的各個片面以及這些事物的外部聯繫。這叫做認識的感性階段，就是感覺和印象的階段。也就是延安這些各別的事物作用於考察團先生們的感官，引起了他們的感覺，在他們的腦子中生起了許多的印象，以及這些印象間的

大概的外部的聯繫，這是認識的第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人們還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論理（即合乎邏輯）的結論。

社會實踐的繼續，使人們在實踐中引起感覺和印象的東西反復了多次，於是在人們的腦子裏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中的突變（即飛躍），產生了概念。概念這種東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不是事物的各個片面，不是它們的外部聯繫，而是抓著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內部聯繫了。概念同感覺，不但是數量上的差別，而且有了性質上的差別。循此繼續，使用判斷和推理的方法，就可產生出合乎論理的結論來。《三國演義》上所謂“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我們普通說話所謂“讓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腦子中運用概念以作判斷和推理的工夫。這是認識的第二個階段。外來的考察團先生們在他們集合了各種材料，加上他們“想了一想”之後，他們就能夠作出“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徹底的、誠懇的和真實的”這樣一個判斷了。在他們作出這個判斷之後，如果他們對於團結救國也是真實的話，那末他們就能夠進一步作出這樣的結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能夠成功的。”這個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階段，在人們對於一個事物的整個認識過程中是更重要的階段，也就是理性認識的階段。認識的真正任務在於經過感覺而到達於思維，到達於逐步瞭解客觀事物的內部矛盾，瞭解它的規律性，瞭解這一過程和那一過程間的內部聯繫，即到達於論理的認識。重複地說，論理的認識所以

和感性的認識不同，是因為感性的認識是屬於事物之片面的、現象的、外部聯繫的東西，論理的認識則推進了一大步，到達了事物的全體的、本質的、內部聯繫的東西，到達了暴露周圍世界的內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圍世界的總體上，在周圍世界一切方面的內部聯繫上去把握周圍世界的發展。

這種基於實踐的由淺入深的辯證唯物論的關於認識發展過程的理論，在馬克思主義以前，是沒有一個人這樣解決過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第一次正確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唯物地而且辯證地指出了認識的深化的運動，指出了社會的人在他們的生產和階級鬥爭的複雜的、經常反復的實踐中，由感性認識到論理認識的推移的運動。列寧說過：“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價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話，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鄭重的、非瞎說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著自然。”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認識過程中兩個階段的特性，在低級階段，認識表現為感性的，在高級階段，認識表現為論理的，但任何階段，都是統一的認識過程中的階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質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離的，它們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我們的實踐證明：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無論何人要認識什麼事物，除了同那個事物接觸，即生活於（實踐於）那個事物的環境中，是

沒有法子解決的。不能在封建社會就預先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因為資本主義還未出現，還無這種實踐。馬克思主義只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馬克思不能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就預先具體地認識帝國主義時代的某些特異的規律，因為帝國主義這個資本主義最後階段還未到來，還無這種實踐，只有列寧和斯大林才能擔當此項任務。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之所以能夠作出他們的理論，除了他們的天才條件之外，主要地是他們親自參加了當時的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的實踐，沒有這後一個條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在技術不發達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話，在技術發達的現代雖然可以實現這句話，然而真正親知的是天下實踐著的人，那些人在他們的實踐中間取得了“知”，經過文字和技術的傳達而到達於“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間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認識某種或某些事物，便只有親身參加於變革現實、變革某種或某些事物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觸到那種或那些事物的現象，也只有在親身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暴露那種或那些事物的本質而理解它們。這是任何人實際上走著的認識路程，不過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說些反對的話罷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識裏手”，有了道聽途說的一知半解，便自封為“天下第一”，適足見其不自量而已。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問題，來不得半點的虛偽和驕傲，決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誠實和謙遜的態度。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組織同性質，你就得實行物理學和化學的實驗，變草原子的情況。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論和方法，你就得參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從直接經驗發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經驗，事實上多數的知識都是間接經驗的東西，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識。這些知識在古人外人是直接經驗的東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經驗時是符合於列寧所說的條件“科學的抽象”，是科學地反映了客觀的事物，那末這些知識是可靠的，否則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個人的知識，不外直接經驗的和間接經驗的兩部分。而且在我為間接經驗者，在人則仍為直接經驗。因此，就知識的總體說來，無論何種知識都是不能離開直接經驗的。任何知識的來源，在於人的肉體感官對客觀外界的感覺，否認了這個感覺，否認了直接經驗，否認親自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他就不是唯物論者。“知識裏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這個地方。中國人有一句老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句話對於人們的實踐是真理，對於認識論也是真理。離開實踐的認識是不可能的。

為了明瞭基於變革現實的實踐而產生的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認識的逐漸深化的運動，下面再舉出幾個具體的例子。

無產階級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在其實踐的初期——破壞機器和自發鬥爭時期，他們還只在感性認識的階段，只認識資本主義各個現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聯

繫。這時，他們還是一個所謂“自在的階級”。但是到了他們實踐的第二個時期——有意識有組織的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的時期，由於實踐，由於長期鬥爭的經驗，經過馬克思、恩格斯用科學的方法把這種經驗總結起來，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用以教育無產階級，這樣就使無產階級理解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理解了社會階級的剝削關係，理解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這時他們就變成了一個“自為的階級”。

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的認識也是這樣。第一階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認識階段，表現在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等籠統的排外主義的鬥爭上。第二階段才進到理性的認識階段，看出了帝國主義內部和外部的各種矛盾，並看出了帝國主義聯合中國買辦階級和封建階級以壓榨中國人民大眾的實質，這種認識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前後才開始的。

我們再來看戰爭。戰爭的領導者，如果他們是一些沒有戰爭經驗的人，對於一個具體的戰爭（例如我們過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戰爭）的深刻的指導規律，在開始階段是不瞭解的。他們在開始階段只是身歷了許多作戰的經驗，而且敗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於這些經驗（勝仗，特別是敗仗的經驗），使他們能夠理解貫串整個戰爭的內部的東西，即那個具體戰爭的規律性，懂得了戰略和戰術，因而能夠有把握地去指導戰爭。此時，如果改換一個無經驗的人去指導，又會要在吃了一些敗仗之後（有了經驗之後）才能理會戰爭的正確的規律。

常常聽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務時說出來的一句話：沒有把握。為什麼沒有把握呢？因為他對於這項工作的內容和環境沒有規律性的瞭解，或者他從來就沒有接觸過這類工作，或者接觸得不多，因而無從談到這類工作的規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況和環境給以詳細分析之後，他就覺得比較地有了把握，願意去做這項工作。如果這個人在這項工作中經過了一個時期，他有了這項工作的經驗了，而他又是一個肯虛心體察情況的人，不是一個主觀地、片面地、表面地看問題的人，他就能夠自己做出應該怎樣進行工作的結論，他的工作勇氣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觀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問題的人，跑到一個地方，不問環境的情況，不看事情的全體（事情的歷史和全部現狀），也不觸到事情的本質（事情的性質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內部聯繫），就自以為是地發號施令起來，這樣的人是沒有不摔跤子的。

由此看來，認識的過程，第一步，是開始接觸外界事情，屬於感覺的階段。第二步，是綜合感覺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屬於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階段。只有感覺的材料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於實際（不是錯覺），才能根據這樣的材料造出正確的概念和論理來。

這裏有兩個要點必須著重指明。第一個，在前面已經說過的，這裏再重複說一說，就是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的問題。如果以為理性認識可以不從感性認識得來，他就是一個唯心論者。哲學史上有所謂“唯理論”

一派，就是只承認理性的實在性，不承認經驗的實在性，以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覺的經驗是靠不住的，這一派的錯誤在於顛倒了事實。理性的東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於它來源於感性，否則理性的東西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只是主觀自生的靠不住的東西了。從認識過程的秩序說來，感覺經驗是第一的東西，我們強調社會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意義，就在於只有社會實踐才能使人的認識開始發生，開始從客觀外界得到感覺經驗。一個閉目塞聽、同客觀外界根本絕緣的人，是無所謂認識的。認識開始於經驗——這就是認識論的唯物論。

第二是認識有待於深化，認識的感性階段有待於發展到理性階段——這就是認識論的辯證法。如果以為認識可以停頓在低級的感性階段，以為只有感性認識可靠，而理性認識是靠不住的，這便是重複了歷史上的“經驗論”的錯誤。這種理論的錯誤，在於不知道感覺材料固然是客觀外界某些真實性的反映（我這裏不來說經驗只是所謂內省體驗的那種唯心的經驗論），但它們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東西，這種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沒有反映事物本質的。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製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這種改造過的認識，不是更空虛了更不可靠了的認識，相反，只要是在認識過程中根據於實踐基礎而科學地改造過的東西，正如列寧所

說乃是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客觀事物的東西。庸俗的事務主義家不是這樣，他們尊重經驗而看輕理論，因而不能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缺乏明確的方針，沒有遠大的前途，沾沾自喜於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見。這種人如果指導革命，就會引導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哲學上的“唯理論”和“經驗論”都不懂得認識的歷史性或辯證性，雖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對於唯物的唯理論和經驗論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論和經驗論），但在認識論的全體上則都是錯誤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對於一個小的認識過程（例如對於一個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認識）是如此，對於一個大的認識過程（例如對於一個社會或一個革命的認識）也是如此。

然而認識運動至此還沒有完結。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如果只到理性認識為止，那末還只說到問題的一半。而且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說來，還只說到非十分重要的一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理論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現在列寧說過的一句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然而馬克思主義看重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為它能夠指導行動。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並不實行，那末，這種

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於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於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抓著了世界的規律性的認識，必須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再用到生產的實踐、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實踐以及科學實驗的實踐中去。這就是檢驗理論和發展理論的過程，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繼續。理論的東西之是否符合於客觀真理性這個問題，在前面說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認識運動中是沒有完全解決的，也不能完全解決的。要完全地解決這個問題，只有把理性的認識再回到社會實踐中去，應用理論於實踐，看它是否能夠達到預想的目的。許多自然科學理論之所以被稱為真理，不但在於自然科學家們創立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於為爾後的科學實踐所證實的時候。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被稱為真理，也不但在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人科學地構成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於為爾後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實踐所證實的時候。辯證唯物論之所以為普遍真理，在於經過無論什麼人的實踐都不能逃出它的範圍。人類認識的歷史告訴我們，許多理論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了它們的不完全性。許多理論是錯誤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其錯誤。所謂實踐是真理的標準，所謂“生活、實踐底觀點，應該是認識論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觀點”，理由就在這個地方。斯大林說得好：“理論若不和革命

實踐聯繫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

說到這裏，認識運動就算完成了嗎？我們的答復是完成了，又沒有完成。社會的人們投身於變革在某一發展階段內的某一客觀過程的實踐中（不論是關於變革某一自然過程的實踐，或變革某一社會過程的實踐），由於客觀過程的反映和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使得人們的認識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體上相應於該客觀過程的法則性的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然後再應用這種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於該同一客觀過程的實踐，如果能夠實現預想的目的，即將預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在該同一過程的實踐中變為事實，或者大體上變為事實，那末，對於這一具體過程的認識運動算是完成了。例如，在變革自然的過程中，某一工程計劃的實現，某一科學假想的證實，某一器物的製成，某一農產的收穫，在變革社會過程中某一罷工的勝利，某一戰爭的勝利，某一教育計劃的實現，都算實現了預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說來，不論在變革自然或變革社會的實踐中，人們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毫無改變地實現出來的事，是很少的。這是因為從事變革現實的人們，常常受著許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著科學條件和技術條件的限制，而且也受著客觀過程的發展及其表現程度的限制（客觀過程的方面及本質尚未充分暴露）。在這種情形之下，由於實踐中發現前所未料的情況，因而部分地改變思想、理論、計劃、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變

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說，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於實際，部分錯了或全部錯了的事，都是有的。許多時候須反復失敗過多次，才能糾正錯誤的認識，才能到達於和客觀過程的規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夠變主觀的東西為客觀的東西，即在實踐中得到預想的結果。但是不管怎樣，到了這種時候，人們對於在某一發展階段內的某一客觀過程的認識運動，算是完成了。

然而對於過程的推移而言，人們的認識運動是沒有完成的。任何過程，不論是屬於自然界的和屬於社會的，由於內部的矛盾和鬥爭，都是向前推移向前發展的，人們的認識運動也應跟著推移和發展。依社會運動來說，真正的革命的指導者，不但在於當自己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有錯誤時須得善於改正，如同上面已經說到的，而且在於當某一客觀過程已經從某一發展階段向另一發展階段推移轉變的時候，須得善於使自己和參加革命的一切人員在主觀認識上也跟著推移轉變，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務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適合於新的情況的變化。革命時期情況的變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黨人的認識不能隨之而急速變化，就不能引導革命走向勝利。

然而思想落後於實際的事是常有的，這是因為人的認識受了許多社會條件的限制的緣故。我們反對革命隊伍中的頑固派，他們的思想不能隨變化了的客觀情況而前進，在歷史上表現為右傾機會主義。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鬥爭已將客觀過程推向前進了，而他們的認識仍然

停止在舊階段。一切頑固黨的思想都有這樣的特徵。他們的思想離開了社會的實踐，他們不能站在社會車輪的前頭充任嚮導的工作，他們只知跟在車子後面怨恨車子走得太快了，企圖把它向後拉，開倒車。

我們也反對“左”翼空談主義。他們的思想超過客觀過程的一定發展階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則把僅在將來有現實可能性的理想，勉強地放在現時來做，離開了當前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前的現實性，在行動上表現為冒險主義。

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徵的。以科學的社會實踐為特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不能不堅決反對這些錯誤思想。馬克思主義者承認，在絕對的總的宇宙發展過程中，各個具體過程的發展都是相對的，因而在絕對真理的長河中，人們對於在各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對的真理。無數相對的真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的真理。客觀過程的發展是充滿著矛盾和鬥爭的發展，人的認識運動的發展也是充滿著矛盾和鬥爭的發展。一切客觀世界的辯證法的運動，都或先或後地能夠反映到人的認識中來。社會實踐中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是無窮的，人的認識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也是無窮的。根據於一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以從事於變革客觀現實的實踐，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們對於客觀現實的認識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

人們在實踐中對於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真理的道路。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

社會的發展到了今天的時代，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責任，已經歷史地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這種根據科學認識而定下來的改造世界的實踐過程，在世界、在中國均已到達了一個歷史的時節——自有歷史以來未曾有過的重大時節，這就是整個兒地推翻世界和中國的黑暗面，把它們轉變過來成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鬥爭，包括實現下述的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係。地球上已經有一部分實行了這種改造，這就是蘇聯。他們還正在促進這種改造過程。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將要通過這樣的改造過程。所謂被改造的客觀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對改造的人們，他們的被改造，須要通過強迫的階段，然後才能進入自覺的階段。世界到了全人類都自覺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時候，那就是世界的共產主義時代。

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

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毛澤東《實踐論》（1937年7月）

《實踐論》深刻論述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的基本原理，強調實踐是認識的來源、認識的目的和認識發展的動力，闡明了毛澤東思想的實事求是基本觀點，解決了幾千年來中國哲學史上爭論不休的知、行關係問題，並以此來指導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實踐活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為中國共產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哲學基礎，為抗日戰爭提供正確的理論指導。

第四章

矛盾論

——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理論武器

1937年8月，正值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關鍵時期，中國人民面臨著民族存亡的嚴峻考驗。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組建了抗日根據地，積極組織和領導抗日鬥爭。8月7日，毛澤東為了克服存在於中國共產黨內的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寫了《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第三章第一節“矛盾統一法則”，並於8月份在延安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作為講授哲學課時的講義。這一節後來以《矛盾論》為篇名收入《毛澤東選集》。

《矛盾論》¹¹

（一九三七年八月）



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列寧說：“就本來的意義講，辯證法是研究對象的本質自身中的矛盾。”列寧常稱這個法

11 參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299-337頁

則為辯證法的本質，又稱之為辯證法的核心。因此，我們在研究這個法則時，不得不涉及廣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許多的哲學問題。如果我們將這些問題都弄清楚了，我們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辯證法。這些問題是：兩種宇宙觀；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蘇聯哲學界在最近數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學派的唯心論，這件事引起了我們的極大的興趣。德波林的唯心論在中國共產黨內發生了極壞的影響，我們黨內的教條主義思想不能說和這個學派的作風沒有關係。因此，我們現在的哲學研究工作，應當以掃除教條主義思想為主要的目標。

一 兩種宇宙觀

在人類的認識史中，從來就有關於宇宙發展法則的兩種見解，一種是形而上學的見解，一種是辯證法的見解，形成了互相對立的兩種宇宙觀。列寧說：“對於發展（進化）所持的兩種基本的（或兩種可能的？或兩種在歷史上常見的？）觀點是：（一）認為發展是減少和增加，是重複；（二）認為發展是對立的統一（統一物分成為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而兩個對立又互相關聯著）。”列寧說的就是這兩種不同的宇宙觀。

形而上學，亦稱玄學。這種思想，無論在中國，在歐洲，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間內，是屬於唯心論的宇宙觀，

並在人們的思想中佔了統治的地位。在歐洲，資產階級初期的唯物論，也是形而上學的。由於歐洲許多國家的社會經濟情況進到了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階段，生產力、階級鬥爭和科學均發展到了歷史上未有過的水平，工業無產階級成為歷史發展的最偉大的動力，因而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於是，在資產階級那裏，除了公開的極端露骨的反動的唯心論之外，還出現了庸俗的進化論，出來對抗唯物辯證法。

所謂形而上學的或庸俗進化論的宇宙觀，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這種宇宙觀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態和種類，都看成是永遠彼此孤立和永遠不變化的。如果說有變化，也只是數量的增減和場所的變更。而這種增減和變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內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於外力的推動。形而上學家認為，世界上各種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從它們一開始存在的時候就是如此。後來的變化，不過是數量上的擴大或縮小。他們認為一種事物永遠只能反復地產生為同樣的事物，而不能變化為另一種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學家看來，資本主義的剝削，資本主義的競爭，資本主義社會的個人主義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隸社會裏，甚至在原始社會裏，都可以找得出來，而且會要永遠不變地存在下去。說到社會發展的原因，他們就用社會外部的地理、氣候等條件去說明。他們簡單地從事物外部去找發展的原因，否認唯物辯證法所主張的事物因內部矛盾引起發展的學說。因此，他們不能解釋事物

的質的多樣性，不能解釋一種質變為他種質的現象。這種思想，在歐洲，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是機械唯物論，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則有庸俗進化論。在中國，則有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曾經長期地為腐朽了的封建統治階級所擁護。近百年來輸入了歐洲的機械唯物論和庸俗進化論，則為資產階級所擁護。

和形而上學的宇宙觀相反，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主張從事物的內部、從一事物對他事物的關係去研究事物的發展，即把事物的發展看做是事物內部的必然的自己的運動，而每一事物的運動都和它的周圍其他事物互相聯繫著和互相影響著。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內部都有這種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運動和發展。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聯繫和互相影響則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的原因。這樣，唯物辯證法就有力地反對了形而上學的機械唯物論和庸俗進化論的外因論或被動論。這是清楚的，單純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機械的運動，即範圍的大小，數量的增減，不能說明事物何以有性質上的千差萬別及其互相變化。事實上，即使是外力推動的機械運動，也要通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動物的單純的增長，數量的發展，主要地也是由於內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樣，社會的發展，主要地不是由於外因而是由於內因。許多國家在差不多一樣的地理和氣候的條

件下，它們發展的差異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個國家吧，在地理和氣候並沒有變化的情形下，社會的變化却是很大的。帝國主義的俄國變為社會主義的蘇聯，封建的閉關鎖國的日本變為帝國主義的日本，這些國家的地理和氣候並沒有變化。長期地被封建制度統治的中國，近百年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正在變化到一個自由解放的新中國的方向去，中國的地理和氣候並沒有變化。整個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氣候也是變化著的，但以它們的變化和社會的變化相比較，則顯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萬年為單位而顯現其變化的，後者則在幾千年、幾百年、幾十年、甚至幾年或幾個月（在革命時期）內就顯現其變化了。按照唯物辯證法的觀點，自然界的變化，主要地是由於自然界內部矛盾的發展。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於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唯物辯證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並不排除。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雞蛋因得適當的溫度而變化為雞子，但溫度不能使石頭變為雞子，因為二者的根據是不同的。各國人民之間的互相影響是時常存在的。在資本主義時代，特別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各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響和互相激動，是極其巨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不只是開創了俄國歷史的新紀元，而且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影響到世

界各國內部的變化，同樣地而且還特別深刻地影響到中國內部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是通過了各國內部和中國內部自己的規律性而起的。兩軍相爭，一勝一敗，所以勝敗，皆決於內因。勝者或因其強，或因其指揮無誤，敗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揮失宜，外因通過內因而引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國大資產階級戰敗了無產階級，是通過中國無產階級內部的（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機會主義而起作用的。當著我們清算了這種機會主義的時候，中國革命就重新發展了。後來，中國革命又受了敵人的嚴重的打擊，是因為我們黨內產生了冒險主義。當著我們清算了這種冒險主義的時候，我們的事業就又重新發展了。由此看來，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

辯證法的宇宙觀，不論在中國，在歐洲，在古代就產生了。但是古代的辯證法帶著自發的樸素的性質，根據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還不可能有完備的理論，因而不能完全解釋宇宙，後來就被形而上學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期的德國著名哲學家黑格爾，對於辯證法曾經給了很重要的貢獻，但是他的辯證法却是唯心的辯證法。直到無產階級運動的偉大的活動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綜合了人類認識史的積極的成果，特別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合理的部分，創造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這個偉大的理論，才在人類認識史上起了一個空前的大革命。後來，經過列寧和斯大林，又發展了這個偉大的理論。這個理論一經傳到中國來，

就在中國思想界引起了極大的變化。

這個辯證法的宇宙觀，主要地就是教導人們要善於去觀察和分析各種事物的矛盾的運動，並根據這種分析，指出解決矛盾的方法。因此，具體地瞭解事物矛盾這一個法則，對於我們是非常重要的。

二 矛盾的普遍性

為了敘述的便利起見，我在這裏先說矛盾的普遍性，再說矛盾的特殊性。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的創造者和繼承者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發現了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已經把唯物辯證法應用在人類歷史的分析和自然歷史的分析的許多方面，應用在社會的變革和自然的變革（例如在蘇聯）的許多方面，獲得了極其偉大的成功，矛盾的普遍性已經被很多人所承認，因此，關於這個問題只需要很少的話就可以說明白；而關於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則還有很多的同志，特別是教條主義者，弄不清楚。他們不瞭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於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們也不瞭解研究當前具體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對於我們指導革命實踐的發展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因此，關於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應當著重地加以研究，並用足夠的篇幅加以說明。為了這個緣故，當著我們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則的時候，我們就先來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問題，然後再著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最後仍歸到矛盾的普遍性的問題。

矛盾的普遍性或絕對性這個問題有兩方面的意義。

其一是說，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其二是說，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

恩格斯說：“運動本身就是矛盾。”列寧對於對立統一法則所下的定義，說它就是“承認（發現）自然界（精神和社會兩者也在內）的一切現象和過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趨向”。這些意見是對的嗎？是對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賴和相互鬥爭，決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動一切事物的發展。沒有什麼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

矛盾是簡單的運動形式（例如機械性的運動）的基礎，更是複雜的運動形式的基礎。

恩格斯這樣說明過矛盾的普遍性：“如果簡單的機械的移動本身包含著矛盾，那末，物質的更高的運動形式，特別是有機生命及其發展，就更加包含著矛盾。……生命首先就在於：生物在每一個瞬間是它自身，但却又是別的什麼。所以，生命也是存在於物體和過程本身中的不斷地自行產生並自行解決的矛盾；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於是死就來到。同樣，我們看到了，在思維的範圍以內我們也不能避免矛盾，並且我們看到了，例如，人的內部無限的認識能力與此種認識能力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認識上也被局限的個別人們身上的實際的實現二者之間的矛盾，是在人類世代的無窮的——至少對於我們，實際上是無窮的——連續系列之中，是在無窮的前進運動之中解決的。”

“高等數學的主要基礎之一，就是矛盾……”

“就是初等數學，也充滿著矛盾。……”

列寧也這樣說明過矛盾的普遍性：“在數學中，正和負，微分和積分。

在力學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學中，陽電和陰電。

在化學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會科學中，階級鬥爭。”

戰爭中的攻守，進退，勝敗，都是矛盾著的現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雙方鬥爭而又聯結，組成了戰爭的總體，推動了戰爭的發展，解決了戰爭的問題。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異，都應把它看作是客觀矛盾的反映。客觀矛盾反映入主觀的思想，組成了概念的矛盾運動，推動了思想的發展，不斷地解決了人們的思想問題。

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鬥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鬥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由此看來，不論是簡單的運動形式，或複雜的運動形式，不論是客觀現象，或思想現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著，矛盾存在於一切過程中，這一點已經弄清楚了。但是每一過程的開始階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具有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呢？

從蘇聯哲學界批判德波林學派的文章中看出，德波林學派有這樣一種見解，他們認為矛盾不是一開始就在過程中出現，須待過程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才出現。那末，

在那一時間以前，過程發展的原因不是由於內部的原因，而是由於外部的原因了。這樣，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學的外因論和機械論去了。拿這種見解去分析具體的問題，他們就看見在蘇聯條件下富農和一般農民之間只有差異，並無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見。在分析法國革命時，他們就認為在革命前，工農資產階級合組的第三等級中，也只有差異，並無矛盾。德波林學派這類見解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他們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異中就已經包含著矛盾，差異就是矛盾。勞資之間，從兩階級發生的時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僅僅還沒有激化而已。工農之間，即使在蘇聯的社會條件下，也有差異，它們的差異就是矛盾，僅僅不會激化成為對抗，不取階級鬥爭的形態，不同於勞資間的矛盾；它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鞏固的聯盟，並在由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地解決這個矛盾。這是矛盾的差別性的問題，不是矛盾的有無的問題。矛盾是普遍的、絕對的，存在於事物發展的一切過程中，又貫串於一切過程的始終。

新過程的發生是什麼呢？這是舊的統一和組成此統一的對立成分讓位於新的統一和組成此統一的對立成分，於是新過程就代替舊過程而發生。舊過程完結了，新過程發生了。新過程又包含著新矛盾，開始它自己的矛盾發展史。

事物發展過程的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列寧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模範地作了這樣的分析。這是研究任何事物發展過程所必須應用的方法。列寧自己也正確

地應用了它，貫徹於他的全部著作中。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首先分析的是資產階級社會（商品社會）裏最簡單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見的、最平常的、碰到億萬次的關係——商品交換。這一分析在這個最簡單的現象之中（資產階級社會的這個‘細胞’之中）暴露了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後的敘述又向我們表明了這些矛盾和這個社會各個部分總和的自始至終的發展（增長與運動兩者）。”

列寧說了上面的話之後，接著說道：“這應該是一般辯證法的……敘述（以及研究）方法。”

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學會這個方法，才能正確地分析中國革命的歷史和現狀，並推斷革命的將來。

三 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發展的過程中，矛盾貫串於每一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前面已經說過了。現在來說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

這個問題，應從幾種情形中去研究。

首先是各種物質運動形式中的矛盾，都帶特殊性。人的認識物質，就是認識物質的運動形式，因為除了運動的物質以外，世界上什麼也沒有，而物質的運動則必取一定的形式。對於物質的每一種運動形式，必須注意它和其他各種運動形式的共同點。但是，尤其重要的，成為我們認識事物的基礎的東西，則是必須注意它的特

殊點，就是說，注意它和其他運動形式的質的區別。只有注意了這一點，才有可能區別事物。任何運動形式，其內部都包含著本身特殊的矛盾。這種特殊的矛盾，就構成一事物區別於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這就是世界上諸種事物所以有千差萬別的內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據。自然界存在著許多的運動形式，機械運動、發聲、發光、發熱、電流、化分、化合等等都是。所有這些物質的運動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質上互相區別的。每一物質的運動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質，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規定。這種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著，在社會現象和思想現象中也是同樣地存在著。每一種社會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質。

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對於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種矛盾的研究，就構成某一門科學的對象。例如，數學中的正數和負數，機械學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學中的陰電和陽電，化學中的化分和化合，社會科學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階級和階級的互相鬥爭，軍事學中的攻擊和防禦，哲學中的唯心論和唯物論、形而上學觀和辯證法觀等等，都是因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質，才構成了不同的科學研究的對象。固然，如果不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據；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無從確定一事物不同於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據，也就無從辨

別事物，無從區分科學研究的領域。

就人類認識運動的秩序說來，總是由認識個別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擴大到認識一般的事物。人們總是首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然後才有可能更進一步地進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當著人們已經認識了這種共同的本質以後，就以這種共同的認識為指導，繼續地向著尚未研究過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各種具體的事物進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質，這樣才可以補充、豐富和發展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而使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不致變成枯槁的和僵死的東西。這是兩個認識的過程：一個是由特殊到一般，一個是由一般到特殊。人類的認識總是這樣循環往復地進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環（只要是嚴格地按照科學的方法）都可能使人類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類的認識不斷地深化。我們的教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認識各別事物的特殊的本質，才有可能充分地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們認識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質以後，還必須繼續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或者新冒出來的具體的事物。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於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認了並且顛倒了這個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他們也不懂得人類認識的兩個過程的互相聯結——由特殊到

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們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不但要研究每一個大系統的物質運動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規定的本質，而且要研究每一個物質運動形式在其發展長途中的每一個過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質。一切運動形式的每一個實在的非臆造的發展過程內，都是不同質的。我們的研究工作必須著重這一點，而且必須從這一點開始。

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例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決；殖民地和帝國主義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戰爭的方法去解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用農業集體化和農業機械化的方法去解決；共產黨內的矛盾，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去解決；社會和自然的矛盾，用發展生產力的方法去解決。過程變化，舊過程和舊矛盾消滅，新過程和新矛盾發生，解決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決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決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嚴格地遵守的一個原則。教條主義者不遵守這個原則，他們不瞭解諸種革命情況的區別，因而也不瞭解應當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將本來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壞。

為要暴露事物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在其總體上、在其相互聯結上的特殊性，就是說暴露事物發展過程的本質，就必須暴露過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則暴露過程的本質成為不可能，這也是我們作研究工作時必須十分注意的。

一個大的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包含著許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有中國社會各被壓迫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有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有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有各個反動的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複雜的。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兩方面，又各各有其特點，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們從事中國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個矛盾的總體上，即矛盾的相互聯結上，瞭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從矛盾的各個方面著手研究，才有可能瞭解其總體。所謂瞭解矛盾的各個方面，就是了解它們每一方面各佔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種具體形式和對方發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關係，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後，又各用何種具體的方法和對方作鬥爭。研究這些問題，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就是說的這個意思。我們的教條主義者違背列寧的指示，從來不用腦筋具體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說來，總是空洞無物的八股調，在我們黨內造成了一種極壞的

作風。

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謂主觀性，就是不知道客觀地看問題，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觀點去看問題。這一點，我在《實踐論》一文中已經說過了。所謂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問題。例如：只瞭解中國一方、不瞭解日本一方，只瞭解共產黨一方、不瞭解國民黨一方，只瞭解無產階級一方、不瞭解資產階級一方，只瞭解農民一方、不瞭解地主一方，只瞭解順利情形一方、不瞭解困難情形一方，只瞭解過去一方、不瞭解將來一方，只瞭解個體一方、不瞭解總體一方，只瞭解缺點一方、不瞭解成績一方，只瞭解原告一方、不瞭解被告一方，只瞭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瞭解革命的公開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話，不瞭解矛盾各方的特點。這就叫做片面地看問題。或者叫做只看見局部，不看見全體，只看見樹木，不看見森林。這樣，是不能找出解決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務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確地發展黨內的思想鬥爭的。孫子論軍事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他說的是作戰的雙方。唐朝人魏徵說過：“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對。可是我們的同志看問題，往往帶片面性，這樣的人就往往碰釘子。《水滸傳》上宋江三打祝家莊，兩次都因情況不明，方法不對，打了敗仗。後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形入手，於是熟悉了盤陀路，拆散了李家莊、扈家莊和祝家莊的聯盟，並且布置了藏在敵人營盤裏的伏兵，用了和外國故事中所說木

馬計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勝仗。《水滸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這個三打祝家莊，算是最好的一個。列寧說：“要真正地認識對象，就必須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繫和‘媒介’。我們決不會完全地作到這一點，可是要求全面性，將使我們防止錯誤，防止僵化。”我們應該記得他的話。表面性，是對矛盾總體和矛盾各方的特點都不去看，否認深入事物裏面精細地研究矛盾特點的必要，僅僅站在那裏遠遠地望一望，粗枝大葉地看到一點矛盾的形相，就想動手去解決矛盾（答復問題、解決糾紛、處理工作、指揮戰爭）。這樣的做法，沒有不出亂子的。中國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同志們所以犯錯誤，就是因為他們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觀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觀性，因為一切客觀事物本來是互相聯繫的和具有內部規律的，人們不去如實地反映這些情況，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們，不認識事物的互相聯繫，不認識事物的內部規律，所以這種方法是主觀主義的。

不但事物發展的全過程中的矛盾運動，在其相互聯結上，在其各方情況上，我們必須注意其特點，而且在過程發展的各個階段中，也有其特點，也必須注意。

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及為此根本矛盾所規定的過程的本質，非到過程完結之日，是不會消滅的；但是事物發展的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的階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區別。這是因為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質和過程的本質雖然沒有變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長過程中的各

個發展階段上採取了逐漸激化的形式。並且，被根本矛盾所規定或影響的許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暫時地或局部地解決了，或者緩和了，又有些是發生了，因此，過程就顯出階段性來。如果人們不去注意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人們就不能適當地處理事物的矛盾。

例如，自由競爭時代的資本主義發展為帝國主義，這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根本矛盾著的階級的性質和這個社會的資本主義的本質，並沒有變化；但是，兩階級的矛盾激化了，獨佔資本和自由資本之間的矛盾發生了，宗主國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即由各國發展不平衡的狀態而引起的矛盾特別尖銳地表現出來了，因此形成了資本主義的特殊階段，形成了帝國主義階段。列寧主義之所以成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因為列寧和斯大林正確地說明了這些矛盾，並正確地作出了解決這些矛盾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

拿從辛亥革命開始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的情形來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階段。特別是在資產階級領導時期的革命和在無產階級領導時期的革命，區別為兩個很大不同的歷史階段。這就是：由於無產階級的領導，根本地改變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階級關係的新調度，農民革命的大發動，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主義的革命徹底性，由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在資產階級領導革命時期不可能出

現的。雖然整個過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質，過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質（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並沒有變化，但是，在這長時間中，經過了辛亥革命失敗和北洋軍閥統治，第一次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統一戰線破裂和資產階級轉入反革命，新的軍閥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第二次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和抗日戰爭等等大事變，二十多年間經過了幾個發展階段。在這些階段中，包含着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戰爭和日本侵入東北四省），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暫時地解決了（例如北洋軍閥的被消滅，我們沒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發生了（例如新軍閥之間的鬥爭，南方各革命根據地喪失後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研究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須在其聯結上、在其總體上去看，而且必須從各個階段中矛盾的各個方面去看。

例如國共兩黨。國民黨方面，在第一次統一戰線時期，因為它實行了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援助工農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氣的，它是各階級的民主革命的聯盟。一九二七年以後，國民黨變到了與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反動集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後又開始向停止內戰、聯合共產黨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個方面轉變。這就是國民黨在三個階段上的特點。形成這些特點，當然有種種的原因。中國共產黨方面，在第一次統一戰線時期，它是幼年的黨，它英

勇地領導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對於革命的性質、任務和方法的認識方面，却表現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這次革命的後期所發生的陳獨秀主義能夠起作用，使這次革命遭受了失敗。一九二七年以後，它又英勇地領導了土地革命戰爭，創立了革命的軍隊和革命的根據地，但是它也犯過冒險主義的錯誤，使軍隊和根據地都受了很大的損失。一九三五年以後，它又糾正了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了新的抗日的統一戰線，這個偉大的鬥爭現在正在發展。在這個階段上，共產黨是一個經過了兩次革命的考驗、有了豐富的經驗的黨。這些就是中國共產黨在三個階段上的特點。形成這些特點也有種種的原因。不研究這些特點，就不能瞭解兩黨在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特殊的相互關係：統一戰線的建立，統一戰線的破裂，再一個統一戰線的建立。而要研究兩黨的種種特點，更根本的就必須研究這兩黨的階級基礎以及因此在各個時期所形成的它們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對立。例如，國民黨在它第一次聯合共產黨的時期，一方面有和國外帝國主義的矛盾，因而它反對帝國主義；另一方面有和國內人民大眾的矛盾，它在口頭上雖然允許給予勞動人民以許多的利益，但在實際上則只給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簡直什麼也不給。在它進行反共戰爭的時期，則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合作反對人民大眾，一筆勾銷了人民大眾原來在革命中所爭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眾的矛盾。現在抗日時期，國民黨和日本帝國主義有矛盾，它一面要聯合共產黨，同時它對共產黨和

國內人民並不放鬆其鬥爭和壓迫。共產黨則無論在哪一時期，均和人民大眾站在一道，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但在現在的抗日時期，由於國民黨表示抗日，它對國民黨和國內封建勢力，也就採取了緩和的政策。由於這些情況，所以或者造成了兩黨的聯合，或者造成了兩黨的鬥爭，而且即使在兩黨聯合的時期也有又聯合又鬥爭的複雜的情況。如果我們不去研究這些矛盾方面的特點，我們就不但不能瞭解這兩個黨各各和其他方面的關係，也不能瞭解兩黨之間的相互關係。

由此看來，不論研究何種矛盾的特性——各個物質運動形式的矛盾，各個運動形式在各個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各個發展過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個發展過程在其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以及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帶主觀隨意性，必須對它們實行具體的分析。離開具體的分析，就不能認識任何矛盾的特性。我們必須時刻記得列寧的話：對於具體的事物作具體的分析。

這種具體的分析，馬克思、恩格斯首先給了我們以很好的模範。

當馬克思、恩格斯把這事物矛盾的法則應用到社會歷史過程的研究的時候，他們看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看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以及由於這些矛盾所產生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而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會在各種不同的階級社會中，引出各種不同的社會革命。

馬克思把這一法則應用到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的研究的時候，他看出這一社會的基本矛盾在於生產的社會性和佔有制的私人性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表現於在各別企業中的生產的有組織性和在全社會中的生產的無組織性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的階級表現則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

由於事物範圍的極其廣大，發展的無限性，所以，在一定場合為普遍性的東西，而在另一一定場合則變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場合為特殊性的東西，而在另一一定場合則變為普遍性。資本主義制度所包含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的各國所共有的東西，對於資本主義說來，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資本主義的這種矛盾，乃是一般階級社會發展在一定歷史階段上的東西，對於一般階級社會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說來，這是矛盾的特殊性。然而，當著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來之後，同時也就更進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階級社會中這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的普遍性闡發出來了。

由於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聯結的，由於每一個事物內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於特殊性之中，所以，當著我們研究一定事物的時候，就應當去發現這兩方面及其互相聯結，發現一事物內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兩方面及其互相聯結，發現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許多事物的互相聯

結。斯大林在他的名著《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書中說明列寧主義的歷史根源的時候，他分析了列寧主義所由產生的國際環境，分析了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已經發展到極點的資本主義的諸矛盾，以及這些矛盾使無產階級革命成為直接實踐的問題，並造成了直接衝擊資本主義的良好條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為什麼俄國成為列寧主義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國當時是帝國主義一切矛盾的集合點以及俄國無產階級所以能夠成為國際的革命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的原因。這樣，斯大林分析了帝國主義的矛盾的普遍性，說明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又分析了沙俄帝國主義在這一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說明俄國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的故鄉，而在這種特殊性中間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這種分析，給我們提供了認識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聯結的模範。

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樣地列寧和斯大林，他們對於應用辯證法到客觀現象的研究的時候，總是指導人們不要帶上任何的主觀隨意性，而必須從客觀的實際運動所包含的具體的條件，去看出這些現象中的具體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體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體的相互關係。我們的教條主義者因為沒有這種研究態度，所以弄得一無是處。我們必須以教條主義的失敗為鑒戒，學會這種研究態度，捨此沒有第二種研究法。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關係，就是矛盾的共性和個性的關係。其共性是矛盾存在於一切過程中，

並貫串於一切過程的始終，矛盾即是運動，即是事物，即是過程，也即是思想。否認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認了一切。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絕對性。然而這種共性，即包含於一切個性之中，無個性即無共性。假如除去一切個性，還有什麼共性呢？因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個性。一切個性都是有條件地暫時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對的。

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於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於拋棄了辯證法。

四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特殊性的問題中，還有兩種情形必須特別地提出來加以分析，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複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於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

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矛盾著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例如，殘存的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農民小資產者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農民小資產者的矛盾，自由資產階級和壟斷資產階級的矛盾，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法西斯主義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的矛盾，都為這個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規定、所影響。

半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

的關係呈現著複雜的情況。

當著帝國主義向這種國家舉行侵略戰爭的時候，這種國家的內部各階級，除開一些叛國分子以外，能夠暫時地團結起來舉行民族戰爭去反對帝國主義。這時，帝國主義和這種國家之間的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而這種國家內部各階級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間這個主要矛盾在內），便都暫時地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中國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戰爭和目前的中日戰爭，都有這種情形。

然而在另一種情形之下，則矛盾的地位起了變化。當著帝國主義不是用戰爭壓迫而是用政治、經濟、文化等比較溫和的形式進行壓迫的時候，半殖民地國家的統治階級就會向帝國主義投降，二者結成同盟，共同壓迫人民大眾。這種時候，人民大眾往往採取國內戰爭的形式，去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的同盟，而帝國主義則往往採取間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國家的反動派壓迫人民，而不採取直接行動，顯出了內部矛盾的特別尖銳性。中國的辛亥革命戰爭，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戰爭，一九二七年以後的十年土地革命戰爭，都有這種情形。還有半殖民地國家各個反動的統治集團之間的內戰，例如在中國的軍閥戰爭，也屬於這一類。

當著國內革命戰爭發展到從根本上威脅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內反動派的存在的時候，帝國主義就往往採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圖維持其統治：或者分化革命

陣線的內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國內反動派。這時，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完全公開地站在一個極端，人民大眾則站在另一極端，成為一個主要矛盾，而規定或影響其他矛盾的發展狀態。十月革命後各資本主義國家援助俄國反動派，是武裝干涉的例子。一九二七年的蔣介石的叛變，是分化革命陣線的例子。

然而不管怎樣，過程發展的各個階段中，只有一種主要的矛盾起著領導的作用，是完全沒有疑義的。

由此可知，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於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複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告訴我們的方法。列寧和斯大林研究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候，列寧和斯大林研究蘇聯經濟的時候，也告訴了這種方法。萬千的學問家和實行家，不懂得這種方法，結果如墮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

不能把過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須把它們區別為主要的和次要的兩類，著重於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種矛盾之中，不論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著的兩個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無論什麼矛盾，矛盾的諸方面，其發展是不平衡的。有時候似乎勢均力敵，然而這只是暫時的和相對的情形，基本的形態則是不平衡。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

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

然而這種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轉化著，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在矛盾發展的一定過程或一定階段上，主要方面屬於甲方，非主要方面屬於乙方；到了另一發展階段或另一發展過程時，就互易其位置，這是依靠事物發展中矛盾雙方鬥爭的力量的增減程度來決定的。

我們常常說“新陳代謝”這句話。新陳代謝是宇宙間普遍的永遠不可抵抗的規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質和條件，經過不同的飛躍形式，一事物轉化為他事物，就是新陳代謝的過程。任何事物的內部都有其新舊兩個方面的矛盾，形成為一系列的曲折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為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則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於滅亡的東西。而一當新的方面對於舊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時候，舊事物的性質就變化為新事物的性質。由此可見，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變化，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已從舊的封建主義社會時代的附庸地位，轉化成了取得支配地位的力量，社會的性質也就由封建主義的變為資本主義的。在新的資本主義社會時代，封建勢力則由原來處在支配地位的力量轉化為附庸的力量，隨著也就逐步地歸於消滅了，例

如英法諸國就是如此。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資產階級由新的起進步作用的階級，轉化為舊的起反動作用的階級，以至於最後被無產階級所推翻，而轉化為私有的生產資料被剝奪和失去權力的階級，這個階級也就要逐步歸於消滅了。人數比資產階級多得多、並和資產階級同時生長、但被資產階級統治著的無產階級，是一個新的力量，它由初期的附屬於資產階級的地位，逐步地壯大起來，成為獨立的和在歷史上起主導作用的階級，以至最後奪取政權成為統治階級。這時，社會的性質，就由舊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轉化成了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這就是蘇聯已經走過和一切其他國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就中國的情形來說，帝國主義處在形成半殖民地這種矛盾的主要地位，壓迫中國人民，中國則由獨立國變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會變化，在雙方鬥爭的局勢中，中國人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所生長起來的力量必然會把中國由半殖民地變為獨立國，而帝國主義則將被打倒，舊中國必然要變為新中國。

舊中國變為新中國，還包含著國內舊的封建勢力和新的人民勢力之間的情況的變化。舊的封建地主階級將被打倒，由統治者變為被統治者，這個階級也就會要逐步歸於消滅。人民則將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由被統治者變為統治者。這時，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會起變化，由舊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變為新的民主的社會。

這種互相轉化的事情，過去已有經驗。統治中國將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國，曾在辛亥革命時期被打倒；而孫

中山領導的革命同盟會，則曾經一度取得了勝利。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戰爭中，共產黨和國民黨聯合的南方革命勢力，曾經由弱小的力量變得強大起來，取得了北伐的勝利；而稱雄一時的北洋軍閥則被打倒了。一九二七年，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受了國民黨反動勢力的打擊，變得很小了；但因肅清了自己內部的機會主義，就又逐步地壯大起來。在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內，農民由被統治者轉化為統治者，地主則作了相反的轉化。世界上總是這樣以新的代替舊的，總是這樣新陳代謝、除舊佈新或推陳出新的。

革命鬥爭中的某些時候，困難條件超過順利條件，在這種時候，困難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順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於革命黨人的努力，能夠逐步地克服困難，開展順利的新局面，困難的局面讓位於順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後的情形，中國紅軍在長征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現在的中日戰爭，中國又處在困難地位，但是我們能夠改變這種情況，使中日雙方的情況發生根本的變化。在相反的情形之下，順利也能轉化為困難，如果是革命黨人犯了錯誤的話。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勝利，變為失敗了。一九二七年以後在南方各省發展起來的革命根據地，至一九三四年都失敗了。

研究學問的時候，由不知到知的矛盾也是如此。當著我們剛才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無知或知之不多的情況，和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之間，

互相矛盾著。然而由於努力學習，可以由無知轉化為有知，由知之不多轉化為知之甚多，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盲目性改變為能夠自由運用馬克思主義。

有人覺得有些矛盾並不是這樣。例如，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生產力是主要的；理論和實踐的矛盾，實踐是主要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經濟基礎是主要的：它們的地位並不互相轉化。這是機械唯物論的見解，不是辯證唯物論的見解。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係、理論、上層建築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當著不變更生產關係，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係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如同列寧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的時候，革命理論的創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樣）要做，但是還沒有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的時候，確定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決定的東西。當著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築阻礙著經濟基礎的發展的時候，對於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為主要的決定的東西了。我們這樣說，是否違反了唯物論呢？沒有。因為我們承認總的歷史發展中是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但是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於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築對於經濟基

礎的反作用。這不是違反唯物論，正是避免了機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證唯物論。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問題中，如果不研究過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這兩種情形，也就是說不研究這兩種矛盾情況的差別性，那就將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體地懂得矛盾的情況，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決矛盾的正確的方法。這兩種矛盾情況的差別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沒有絕對地平衡發展的東西，我們必須反對平衡論，或均衡論。同時，這種具體的矛盾狀況，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發展過程中的變化，正是表現出新事物代替舊事物的力量。對於矛盾的各種不平衡情況的研究，對於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為革命政黨正確地決定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方針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產黨人都應當注意的。

五 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

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問題之後，我們必須進而研究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的問題。

同一性、統一性、一致性、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依賴（或依存）、互相聯結或互相合作，這些不同的名詞都是一個意思，說的是如下兩種情形：第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每一種矛盾的兩個方面，各以和它對立著的方面為自己存在的前提，雙方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

第二、矛盾著的雙方，依據一定的條件，各向著其相反的方面轉化。這些就是所謂同一性。

列寧說：“辯證法是這樣的一種學說：它研究對立怎樣能夠是同一的，又怎樣成為同一的（怎樣變成同一的），——在怎樣的條件之下它們互相轉化，成為同一的，——為什麼人的頭腦不應當把這些對立看作死的、凝固的東西，而應當看作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

列寧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

一切過程中矛盾著的各方面，本來是互相排斥、互相鬥爭、互相對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過程裏和人們的思想裏，都包含著這樣帶矛盾性的方面，無一例外。單純的過程只有一對矛盾，複雜的過程則有一對以上的矛盾。各對矛盾之間，又互相成為矛盾。這樣地組成客觀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們的思想，並推使它們發生運動。

如此說來，只是極不同一，極不統一，怎樣又說是同一或統一呢？

原來矛盾著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沒有和它作對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條件。試想一切矛盾著的事物或人們心中矛盾著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夠獨立地存在嗎？沒有生，死就不見；沒有死，生也不見。沒有上，無所謂下；沒有下，也無所謂上。沒有禍，無所謂福；沒有福，也無所謂禍。沒有順利，無所謂困難；沒有困難，也無所謂順利。沒有地主，就沒有佃農；沒有佃農，也就沒有地主。沒有資產階級，

就沒有無產階級；沒有無產階級，也就沒有資產階級。沒有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就沒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沒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沒有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一切對立的成分都是這樣，因一定的條件，一面互相對立，一面又互相聯結、互相貫通、互相滲透、互相依賴，這種性質，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著的方面都因一定條件具備著不同一性，所以稱為矛盾。然而又具備著同一性，所以互相聯結。列寧所謂辯證法研究“對立怎樣能夠是同一的”，就是說的這種情形。怎樣能夠呢？因為互為存在的條件。這是同一性的第一種意義。

然而單說了矛盾雙方互為存在的條件，雙方之間有同一性，因而能夠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這樣就夠了嗎？還不夠。事情不是矛盾雙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還在於矛盾著的事物的互相轉化。這就是說，事物內部矛盾著的兩方面，因為一定的條件而各向著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轉化了去，向著它的對立方面所處的地位轉化了去。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種意義。

為什麼這裏也有同一性呢？你們看，被統治的無產階級經過革命轉化為統治者，原來是統治者的資產階級却轉化為被統治者，轉化到對方原來所佔的地位。蘇聯已經是這樣做了，全世界也將要這樣做。試問其間沒有在一定條件之下的聯繫和同一性，如何能夠發生這樣的變化呢？

曾在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定階段上起過某種積極作用的國民黨，因為它的固有的階級性和帝國主義的引誘（這

些就是條件），在一九二七年以後轉化為反革命，又由於中日矛盾的尖銳化和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這些就是條件），而被迫著贊成抗日。矛盾著的東西這一個變到那一個，其間包含了一定的同一性。

我們實行過的土地革命，已經是並且還將是這樣的過程，擁有土地的地主階級轉化為失掉土地的階級，而曾經是失掉土地的農民却轉化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有無、得失之間，因一定條件而互相聯結，二者具有同一性。在社會主義條件之下，農民的私有制又將轉化為社會主義農業的公有制，蘇聯已經這樣做了，全世界將來也會這樣做。私產和公產之間有一條由此達彼的橋梁，哲學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轉化、互相滲透。

鞏固無產階級的專政或人民的專政，正是準備著取消這種專政，走到消滅任何國家制度的更高階段去的條件。建立和發展共產黨，正是準備著消滅共產黨和一切政黨制度的條件。建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進行革命戰爭，正是準備著永遠消滅戰爭的條件。這許多相反的東西，同時却是相成的東西。

大家知道，戰爭與和平是互相轉化的。戰爭轉化為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轉化為戰後的和平，中國的內戰現在也停止了，出現了國內的和平。和平轉化為戰爭，例如一九二七年的國共合作轉化為戰爭，現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轉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什麼是這樣？因為在階級社會中戰爭與和平這樣矛盾著的事物，在一定條件下具備著同一性。

一切矛盾著的東西，互相聯繫著，不但在一定條件之下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而且在一定條件之下互相轉化，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義。列寧所謂“怎樣成為同一的（怎樣變成同一的），——在怎樣的條件之下它們互相轉化，成為同一的”，就是這個意思。

“為什麼人的頭腦不應當把這些對立看作死的、凝固的東西，而應當看作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呢？”因為客觀事物本來是如此的。客觀事物中矛盾著的諸方面的統一或同一性，本來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暫時的、相對的東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條件向它們的反面轉化著。這種情況，反映在人們的思想裏，就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只有現在的和歷史上的反動的統治階級以及為他們服務的形而上學，不是把對立的事物當作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去看，而是當作死的、凝固的東西去看，並且把這種錯誤的看法到處宣傳，迷惑人民群眾，以達其繼續統治的目的。共產黨人的任務就在於揭露反動派和形而上學的錯誤思想，宣傳事物的本來的辯證法，促成事物的轉化，達到革命的目的。

所謂矛盾在一定條件下的同一性，就是說，我們所說的矛盾乃是現實的矛盾，具體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轉化也是現實的、具體的。神話中的許多變化，例如《山海經》中所說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說的“羿射九日”，《西遊記》中所說的孫悟空七十二變和《聊

齋誌異》中的許多鬼狐變人的故事等等，這種神話中所說的矛盾的互相變化，乃是無數複雜的現實矛盾的互相變化對於人們所引起的一種幼稚的、想像的、主觀幻想的變化，並不是具體的矛盾所表現出來的具體的變化。馬克思說：“任何神話都是用想像和藉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隨著這些自然力之實際上被支配，神話也就消失了。”這種神話中的（還有童話中的）千變萬化的故事，雖然因為它們想像出人們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夠吸引人們的喜歡，並且最好的神話具有“永久的魅力”（馬克思），但神話並不是根據具體的矛盾之一定的條件而構成的，所以它們並不是現實之科學的反映。這就是說，神話或童話中矛盾構成的諸方面，並不是具體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學地反映現實變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

為什麼雞蛋能夠轉化為雞子，而石頭不能夠轉化為雞子呢？為什麼戰爭與和平有同一性，而戰爭與石頭却沒有同一性呢？為什麼人能生人不能生出其他的東西呢？沒有別的，就是因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條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條件，就沒有任何的同一性。

為什麼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直接地聯繫著，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沒有直接地聯繫於社會主義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終於失敗了呢？為什麼蒙古和中

亞細亞的遊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會主義聯繫了呢？為什麼中國的革命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可以和社會主義直接聯繫起來，不要再走西方國家的歷史老路，不要經過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時期呢？沒有別的，都是由於當時的具體條件。一定的必要的條件具備了，事物發展的過程就發生一定的矛盾，而且這種或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轉化，否則，一切都不可能。

同一性的問題如此。那末，什麼是鬥爭性呢？同一性和鬥爭性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列寧說：“對立的統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條件的、一時的、暫存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的鬥爭則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

列寧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

一切過程都有始有終，一切過程都轉化為它們的對立物。一切過程的常住性是相對的，但是一種過程轉化為他種過程的這種變動性則是絕對的。

無論什麼事物的運動都採取兩種狀態，相對地靜止的狀態和顯著地變動的狀態。兩種狀態的運動都是由事物內部包含的兩個矛盾著的因素互相鬥爭所引起的。當著事物的運動在第一種狀態的時候，它只有數量的變化，沒有性質的變化，所以顯出好似靜止的面貌。當著事物的運動在第二種狀態的時候，它已由第一種狀態中的數量的變化達到了某一個最高點，引起了統一物的分解，發生了性質的變化，所以顯出顯著地變化的面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見的統一、團結、聯合、調和、均勢、

相持、僵局、靜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處在量變狀態中所顯現的面貌。而統一物的分解，團結、聯合、調和、均勢、相持、僵局、靜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狀態的破壞，變到相反的狀態，便都是事物在質變狀態中、在一種過程過渡到他種過程的變化中所顯現的面貌。事物總是不斷地由第一種狀態轉化為第二種狀態，而矛盾的鬥爭則存在於兩種狀態中，並經過第二種狀態而達到矛盾的解決。所以說，對立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相對的，而對立的互相排除的鬥爭則是絕對的。

前面我們曾經說，兩個相反的東西中間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夠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又能夠互相轉化，這是說的條件性，即是說在一定條件之下，矛盾的東西能夠統一起來，又能夠互相轉化；無此一定條件，就不能成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轉化。由於一定的條件才構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說同一性是有條件的、相對的。這裏我們又說，矛盾的鬥爭貫串於過程的始終，並使一過程向著他過程轉化，矛盾的鬥爭無所不在，所以說矛盾的鬥爭性是無條件的、絕對的。

有條件的相對的同一性和無條件的絕對的鬥爭性相結合，構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運動。

我們中國人常說：“相反相成。”就是說相反的東西有同一性。這句話是辯證法的，是違反形而上學的。“相反”就是說兩個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鬥爭。“相成”就是說在一定條件之下兩個矛盾方面互相聯結起來，

獲得了同一性。而鬥爭性即寓於同一性之中，沒有鬥爭性就沒有同一性。

在同一性中存在著鬥爭性，在特殊性中存在著普遍性，在個性中存在著共性。拿列寧的話來說，叫做“在相對的東西裏面有著絕對的東西”。

六 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在矛盾的鬥爭性的問題中，包含著對抗是什麼的問題。我們回答道：對抗是矛盾鬥爭的一種形式，而不是矛盾鬥爭的一切形式。

在人類歷史中，存在著階級的對抗，這是矛盾鬥爭的一種特殊的表現。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無論在奴隸社會也好，封建社會也好，資本主義社會也好，互相矛盾著的兩階級，長期地並存於一個社會中，它們互相鬥爭著，但要待兩階級的矛盾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的時候，雙方才取外部對抗的形式，發展為革命。階級社會中，由和平向戰爭的轉化，也是如此。

炸彈在未爆炸的時候，是矛盾物因一定條件共居於一個統一體中的時候。待至新的條件（發火）出現，才發生了爆炸。自然界中一切到了最後要採取外部衝突形式去解決舊矛盾產生新事物的現象，都有與此相仿佛的情形。

認識這種情形，極為重要。它使我們懂得，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捨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

獲得政權。共產黨人必須揭露反動派所謂社會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地等等欺騙的宣傳，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革命論，使人民懂得，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個人類的歷史和蘇聯的勝利，都證明了這個科學的真理。

但是我們必須具體地研究各種矛盾鬥爭的情況，不應當將上面所說的公式不適當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矛盾和鬥爭是普遍的、絕對的，但是解決矛盾的方法，即鬥爭的形式，則因矛盾的性質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開的對抗性，有些矛盾則不是這樣。根據事物的具體發展，有些矛盾是由原來還非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為對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則由原來是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為非對抗性的。

共產黨內正確思想和錯誤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說，在階級存在的時候，這是階級矛盾對於黨內的反映。這種矛盾，在開始的時候，或在個別的問題上，並不一定馬上表現為對抗性的。但隨著階級鬥爭的發展，這種矛盾也就可能發展為對抗性的。蘇聯共產黨的歷史告訴我們：列寧、斯大林的正確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錯誤思想的矛盾，在開始的時候還沒有表現為對抗的形式，但隨後就發展為對抗的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也有過這樣的情形。我們黨內許多同志的正確思想和陳獨秀、張國燾等人的錯誤思想的矛盾，在開始的時候也沒有表現為對抗的形式，但隨後就發展為對抗的了。目前我們黨內的正確思想和錯誤思想的矛盾，沒有表現為對

抗的形式，如果犯錯誤的同志能夠改正自己的錯誤，那就不會發展為對抗性的東西。因此，黨一方面必須對於錯誤思想進行嚴肅的鬥爭，另一方面又必須充分地給犯錯誤的同志留有自己覺悟的機會。在這樣的情況下，過火的鬥爭，顯然是不適當的。但如果犯錯誤的人堅持錯誤，並擴大下去，這種矛盾也就存在著發展為對抗性的東西的可能性。

經濟上城市和鄉村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那裏資產階級統治的城市殘酷地掠奪鄉村），在中國的國民黨統治區域裏面（那裏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買辦大資產階級所統治的城市極野蠻地掠奪鄉村），那是極其對抗的矛盾。但在社會主義國家裏面，在我們的革命根據地裏面，這種對抗的矛盾就變為非對抗的矛盾，而當到達共產主義社會的時候，這種矛盾就會消滅。

列寧說：“對抗和矛盾斷然不同。在社會主義下，對抗消滅了，矛盾存在著。”這就是說，對抗只是矛盾鬥爭的一種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處套用這個公式。

七 結論

說到這裏，我們可以總起來說幾句。事物矛盾的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自然和社會的根本法則，因而也是思維的根本法則。它是和形而上學的宇宙觀相反的。它對於人類的認識史是一個大革命。按照辯證唯物論的觀點看來，矛盾存在於一切客觀事物和主觀思維的

過程中，矛盾貫串於一切過程的始終，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矛盾著的事物及其每一個側面各有其特點，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矛盾著的事物依一定的條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夠共居於一個統一體中，又能夠互相轉化到相反的方面去，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然而矛盾的鬥爭則是不斷的，不管在它們共居的時候，或者在它們互相轉化的時候，都有鬥爭的存在，尤其是在它們互相轉化的時候，鬥爭的表現更為顯著，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當著我們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的時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區別；當著我們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鬥爭性的時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種不同的鬥爭形式的區別。否則就要犯錯誤。如果我們經過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這些要點，我們就能夠擊破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的不利於我們的革命事業的那些教條主義的思想；也能夠使有經驗的同志們整理自己的經驗，使之帶上原則性，而避免重複經驗主義的錯誤。這些，就是我們研究矛盾法則的一些簡單的結論。

——毛澤東《矛盾論》（1937年8月）

《矛盾論》是毛澤東繼《實踐論》之後，為了克服存在於中國共產黨內的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經典著作。標誌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掌握了運用辯證

唯物論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為中國共產黨提供強大的理論武器，對指導中國革命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是哲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典著作。

第五章

論持久戰 ——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

1938年5月19日徐州淪陷，此時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早已相繼淪陷。中國能不能取得勝利？怎樣才能取得勝利？對這些問題，有人感到迷惘。“亡國論”、“速勝論”等錯誤觀點到處流傳。“亡國論”的人說：「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速勝論”的人幻想依靠外援來迅速取勝。淞滬會戰時就有人提出：「只要打三個月，國際局勢一定會發生變化，戰爭就可解決。」台兒莊一戰取勝後，《大公報》又鼓吹徐州戰役是“準決戰”。這種輕敵思想也同樣出現在共產黨內，有些人還把抗戰的希望寄託在國民黨的兩百萬正規軍上，急於打大仗，對戰爭的長期性艱苦性缺乏心理準備。

毛澤東深感有必要對抗戰10個月來的經驗做個總結性的解釋，特別是“有著重地研究持久戰的必要”，遂於延安的窯洞內寫下著名的《論持久戰》，

並於 1938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3 日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發表。

論持久戰¹²

(一九三八年五月)



問題的提起

(一) 偉大抗日戰爭的一週年紀念，七月七日，快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團結起來，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同敵人作英勇的戰爭，快一年了。這個戰爭，在東方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歷史上也將是偉大的，全世界人民都關心這個戰爭。身受戰爭災難、為著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奮鬥的每一個中國人，無日不在渴望戰爭的勝利。然而戰爭的過程究竟會要怎麼樣？能勝利還是不能勝利？能速勝還是不能速勝？很多人都說持久戰，但是為什麼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很多人都說最後勝利，但是為什麼會有最後勝利？怎樣爭取最後勝利？這些問題，不是每個人都解決了的，甚至是大多數人至今沒有解決的。於是失敗主義的亡國論者跑出來向人們說：中國會亡，最後勝利不是中國的。某些性急的朋友們也跑出來向人們說：中國很快就能戰勝，無需乎費大氣力。這些議論究竟對不對呢？我們一向都說：這些議

12 參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二版，第 439-518 頁

論是不對的。可是我們說的，還沒有為大多數人所瞭解。一半因為我們的宣傳解釋工作還不夠，一半也因為客觀事變的發展還沒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質，還沒有將其面貌鮮明地擺在人們之前，使人們無從看出其整個的趨勢和前途，因而無從決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針和做法。現在好了，抗戰十個月的經驗，儘夠擊破毫無根據的亡國論，也儘夠說服急性朋友們的速勝論了。在這種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個總結性的解釋。尤其是對持久戰，有亡國論和速勝論的反對意見，也有空洞無物的瞭解。“盧溝橋事變以來，四萬萬人一齊努力，最後勝利是中國的。”這樣一種公式，在廣大的人們中流行著。這個公式是對的，但有加以充實的必要。抗日戰爭和統一戰線之所以能夠堅持，是由於許多的因素：全國黨派，從共產黨到國民黨；全國人民，從工人農民到資產階級；全國軍隊，從主力軍到游擊隊；國際方面，從社會主義國家到各國愛好正義的人民；敵國方面，從某些國內反戰的人民到前線反戰的兵士。總而言之，所有這些因素，在我們的抗戰中都盡了他們各種程度的努力。每一個有良心的人，都應向他們表示敬意。我們共產黨人，同其他抗戰黨派和全國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團結一切力量，戰勝萬惡的日寇。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十七週年紀念日。為了使每個共產黨員在抗日戰爭中能夠盡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著重地研究持久戰的必要。因此，我的講演就來研究持久戰。和持久戰這個題目有關的問題，我都準備說到；但是不能一切都說到，

因為一切的東西，不是在一個講演中完全說得了的。

(二) 抗戰十個月以來，一切經驗都證明下述兩種觀點的不對：一種是中國必亡論，一種是中國速勝論。前者產生妥協傾向，後者產生輕敵傾向。他們看問題的方法都是主觀的和片面的，一句話，非科學的。

(三) 抗戰以前，存在著許多亡國論的議論。例如說：“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如果抗戰，必會作阿比西尼亞。”抗戰以後，公開的亡國論沒有了，但暗地是有的，而且很多。例如妥協的空氣時起時伏，主張妥協者的根據就是“再戰必亡”。有個學生從湖南寫信來說：“在鄉下一切都感到困難。單獨一個人作宣傳工作，只好隨時隨地找人談話。對象都不是無知無識的愚民，他們多少也懂得一點，他們對我的談話很有興趣。可是碰了我那幾位親戚，他們總說：‘中國打不勝，會亡。’討厭極了。好在他們還不去宣傳，不然真糟。農民對他們的信仰當然要大些啊！”這類中國必亡論者，是妥協傾向的社會基礎。這類人中國各地都有，因此，抗日陣線中隨時可能發生的妥協問題，恐怕終戰爭之局也不會消滅的。當此徐州失守武漢緊張的時候，給這種亡國論痛駁一駁，我想不是無益的。

(四) 抗戰十個月以來，各種表現急性病的意見也發生了。例如在抗戰初起時，許多人有一種毫無根據的樂觀傾向，他們把日本估計過低，甚至以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有些人輕視抗日戰爭中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他們對於“在全體上，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是輔助

的；在部分上，游擊戰是主要的，運動戰是輔助的”這個提法，表示懷疑。他們不贊成八路軍這樣的戰略方針：“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認為這是“機械的”觀點。上海戰爭時，有些人說：“只要打三個月，國際局勢一定變化，蘇聯一定出兵，戰爭就可解決。”把抗戰的前途主要地寄託在外國援助上面。台兒莊勝利之後，有些人主張徐州戰役應是“準決戰”，說過去的持久戰方針應該改變。說什麼“這一戰，就是敵人的最後掙扎”，“我們勝了，日閥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場，只有靜候末日審判”。平型關一個勝仗，沖昏了一些人的頭腦；台兒莊再一個勝仗，沖昏了更多人的頭腦。於是敵人是否進攻武漢，成為疑問了。許多人以為：“不一定”；許多人以為：“斷不會”。這樣的疑問可以牽涉到一切重大的問題。例如說：抗日力量是否夠了呢？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為現在的力量已使敵人不能再進攻，還要增加力量幹什麼呢？例如說：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是否依然正確呢？回答可以是否定的，因為統一戰線的現時狀態已夠打退敵人，還要什麼鞏固和擴大呢？例如說：國際外交和國際宣傳工作是否還應該加緊呢？回答也可以是否定的。例如說：改革軍隊制度，改革政治制度，發展民眾運動，厲行國防教育，鎮壓漢奸托派，發展軍事工業，改良人民生活，是否應該認真去做呢？例如說：保衛武漢、保衛廣州、保衛西北和猛烈發展敵後游擊戰爭的口號，是否依然正確呢？回答都可以是否定的。甚至某些人在戰爭形勢稍

為好轉的時候，就準備在國共兩黨之間加緊磨擦一下，把對外的眼光轉到對內。這種情況，差不多每一個較大的勝仗之後，或敵人進攻暫時停頓之時，都要發生。所有上述一切，我們叫它做政治上軍事上的近視眼。這些話，講起來好像有道理，實際上是毫無根據、似是而非的空談。掃除這些空談，對於進行勝利的抗日戰爭，應該是有好處的。

（五）於是問題是：中國會亡嗎？答復：不會亡，最後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復：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

（六）這些問題的主要論點，還在兩年之前我們就一般地指出了。還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在西安事變前五個月，盧溝橋事變前十二個月，我同美國記者斯諾先生的談話中，就已經一般地估計了中日戰爭的形勢，並提出了爭取勝利的各種方針。為備忘計，不妨抄錄幾段如下：

問：在什麼條件下，中國能戰勝並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呢？

答：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就中國人民的立場來說，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

問：你想，這個戰爭要延長多久呢？

答：要看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實力和中日兩國其他

許多決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說，除了主要地看中國自己的力量之外，國際間所給中國的援助和日本國內革命的援助也很有關係。如果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有力地發展起來，橫的方面和縱的方面都有效地組織起來，如果認清日本帝國主義威脅他們自己利益的各國政府和各國人民能給中國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來得快，則這次戰爭將迅速結束，中國將迅速勝利。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很快實現，戰爭就要延長。但結果還是一樣，日本必敗，中國必勝。只是犧牲會大，要經過一個很痛苦的時期。

問：從政治上和軍事上來看，你以為這個戰爭的前途會要如何發展？

答：日本的大陸政策已經確定了，那些以為同日本妥協，再犧牲一些中國的領土主權就能夠停止日本進攻的人們，他們的想法只是一種幻想。我們確切地知道，就是揚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經包括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之內。並且日本還想佔領菲律賓、暹羅、越南、馬來半島和荷屬東印度，把外國和中國切開，獨佔西南太平洋。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這樣的時期，中國無疑地要處於極端困難的地位。可是大多數中國人相信，這種困難是能夠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敗論者，因為他們害怕損失財產。有許多人想，一旦中國海岸被日本封鎖，中國就

不能繼續作戰。這是廢話。為反駁他們，我們不妨舉出紅軍的戰爭史。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所佔的優勢，比內戰時紅軍的地位強得多。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就是日本能佔領中國一萬萬至二萬萬人口的區域，我們離戰敗還很遠呢。我們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戰，而日本在整個戰爭中須得時時在其後方作防禦戰。中國經濟的不統一、不平衡，對於抗日戰爭反為有利。例如將上海和中國其他地方割斷，對於中國的損害，絕沒有將紐約和美國其他地方割斷對於美國的損害那樣嚴重。日本就是把中國沿海封鎖，中國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無法封鎖的。所以問題的中心點還是中國全體人民團結起來，樹立舉國一致的抗日陣線。這是我們早就提出的了。

問：假如戰爭拖得很長，日本沒有完全戰敗，共產黨能否同意講和，並承認日本統治東北？

答：不能。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一樣，不容許日本保留中國的寸土。

問：照你的意見，這次解放戰爭，主要的戰略方針是什麼？

答：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後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就是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

設防、專靠防禦工事的陣地戰。這並不是說要放棄一切重要的軍事地點，對於這些地點，只要有利的，就應配置陣地戰。但是轉換全域的戰略方針，必然要是運動戰。陣地戰雖也必需，但是屬於輔助性質的第二種的方針。在地理上，戰場這樣廣大，我們作最有效的運動戰，是可能的。日軍遇到我軍的猛烈活動，必得謹慎。他們的戰爭機構很笨重，行動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們集中兵力在一個狹小的陣地上作消耗戰的抵抗，將使我軍失掉地理上和經濟組織上的有利條件，犯阿比西尼亞的錯誤。戰爭的前期，我們要避免一切大的決戰，要先用運動戰逐漸地破壞敵人軍隊的精神和戰鬥力。

除了調動有訓練的軍隊進行運動戰之外，還要在農民中組織很多的游擊隊。須知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僅僅是表示了全國農民所能動員抗戰的潛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國農民有很大的潛伏力，只要組織和指揮得當，能使日本軍隊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時，使之疲於奔命。必須記住這個戰爭是在中國打的，這就是說，日軍要完全被敵對的中國人所包圍；日軍要被迫運來他們所需的軍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們要用重兵去保護交通線，時時謹防襲擊；另外，還要有一大部力量駐紮滿洲和日本內地。

在戰爭的過程中，中國能俘虜許多的日本兵，奪取

許多的武器彈藥來武裝自己；同時，爭取外國的援助，使中國軍隊的裝備逐漸加強起來。因此，中國能夠在戰爭的後期從事陣地戰，對於日本的佔領地進行陣地的攻擊。這樣，日本在中國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氣行將頹靡。中國方面，則抗戰的潛伏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眾不斷地傾注到前線去，為自由而戰爭。所有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來，就使我們能夠對日本佔領地的堡壘和根據地，作最後的致命的攻擊，驅逐日本侵略軍出中國。（斯諾：《西北印象記》）

抗戰十個月的經驗，證明上述論點的正確，以後也還將繼續證明它。

（七）還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一個多月，即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就在它的《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中，清楚地指出：

盧溝橋的挑戰和平津的佔領，不過是日寇大舉進攻中國本部的開始。日寇已經開始了全國的戰時動員。他們的所謂“不求擴大”的宣傳，不過是掩護其進攻的烟幕彈。

七月七日盧溝橋的抗戰，已經成了中國全國性抗戰的起點。中國的政治形勢從此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就是實行抗戰的階段。抗戰的準備階段已經過去了。這一階段的最中心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

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

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只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後的勝利。

由於當前的抗戰還存在著嚴重的弱點，所以在今後的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卻，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和局部的妥協等不利的情況。因此，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但我們相信，已經發動的抗戰，必將因為我黨和全國人民的努力，衝破一切障礙物而繼續地前進和發展。

抗戰十個月的經驗，同樣證明了上述論點的正確，以後也還將繼續證明它。

（八）戰爭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機械論的傾向，是一切錯誤觀點的認識論上的根源。他們看問題的方法是主觀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無根據地純主觀地說一頓；或者是只根據問題的一側面、一時候的表現，也同樣主觀地把它誇大起來，當作全體看。但是人們的錯誤觀點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根本的錯誤，帶一貫性，這是難於糾正的；另一類是偶然的錯誤，帶暫時性，這是易於糾正的。但既同為錯誤，就都有糾正的必要。因此，反對戰爭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機械論的傾向，採用客觀的觀點和全面的觀點去考察戰爭，才能使戰爭問題得出正確的結論。

問題的根據

（九）抗日戰爭為什麼是持久戰？最後勝利為什麼是中國的呢？根據在什麼地方呢？

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全部問題的根據就在這裏。分別地說來，戰爭的雙方有如下互相反對的許多特點。

(一〇) 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個強的帝國主義國家，它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在東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個著名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一個。這是日本侵略戰爭的基本條件，戰爭的不可避免和中國的不能速勝，就建立在這個日本國家的帝國主義制度及其強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上面。然而第二，由於日本社會經濟的帝國主義性，就產生了日本戰爭的帝國主義性，它的戰爭是退步的和野蠻的。時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國主義，由於內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舉行空前大規模的冒險戰爭，而且使得它臨到最後崩潰的前夜。從社會行程說來，日本已不是興旺的國家，戰爭不能達到日本統治階級所期求的興旺，而將達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國主義的死亡。這就是所謂日本戰爭的退步性。跟著這個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個帶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這一特點，就產生了它的戰爭的特殊野蠻性。這樣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國內的階級對立、日本民族和中國民族的對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對立。日本戰爭的退步性和野蠻性是日本戰爭必然失敗的主要根據。還不止此，第三，日本戰爭雖是在其強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的基礎之上進行的，但同時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礎之上進行的。日本的軍力、經

濟力和政治組織力雖強，但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國度比較地小，其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日本統治者想從戰爭中解決這個困難問題，但同樣，將達到其所期求的反面，這就是說，它為解決這個困難問題而發動戰爭，結果將因戰爭而增加困難，戰爭將連它原有的東西也消耗掉。最後，第四，日本雖能得到國際法西斯國家的援助，但同時，卻又不能不遇到一個超過其國際援助力量的國際反對力量。這後一種力量將逐漸地增長，終究不但將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並將施其壓力於日本自身。這是失道寡助的規律，是從日本戰爭的本性產生出來的。總起來說，日本的長處是其戰爭力量之強，而其短處則在其戰爭本質的退步性、野蠻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國際形勢之寡助。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點。

（一一）中國方面：第一，我們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從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戊戌維新，辛亥革命，直至北伐戰爭，一切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運動，都遭到了嚴重的挫折，因此依然保留下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我們依然是一個弱國，我們在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各方面都顯得不如敵人。戰爭之不可避免和中國之不能速勝，又在這個方面有其基礎。然而第二，中國近百年的解放運動積累到了今日，已經不同於任何歷史時期。各種內外反對力量雖給了解放運動以嚴重挫折，同時卻鍛煉了中國人民。今日中國的軍事、經濟、政治、文化雖不如日本之強，

但在中國自己比較起來，卻有了比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更為進步的因素。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就是這種進步因素的代表。中國今天的解放戰爭，就是在這種進步的基礎上得到了持久戰和最後勝利的可能性。中國是如日方升的國家，這同日本帝國主義的沒落狀態恰是相反的對照。中國的戰爭是進步的，從這種進步性，就產生了中國戰爭的正義性。因為這個戰爭是正義的，就能喚起全國的團結，激起敵國人民的同情，爭取世界多數國家的援助。第三，中國又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夠支持長期的戰爭，這同日本又是一個相反的對比。最後，第四，由於中國戰爭的進步性、正義性而產生出來的國際廣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總起來說，中國的短處是戰爭力量之弱，而其長處則在其戰爭本質的進步性和正義性，在其是一個大國家，在其國際形勢之多助。這些都是中國的特點。

（一二）這樣看來，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強的，但其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國際形勢又處於不利。中國反是，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比較地弱的，然而正處於進步的時代，其戰爭是進步的和正義的，又有大國這個條件足以支持持久戰，世界的多數國家是會要援助中國的。——這些，就是中日戰爭互相矛盾著的基本特點。這些特點，規定了和規定著雙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規定了和規定著戰爭的持久性和最後勝利屬於中國而不屬於日本。戰爭就是這些特點的比賽。這些特點

在戰爭過程中將各依其本性發生變化，一切東西就都從這裏發生出來。這些特點是事實上存在的，不是虛造騙人的；是戰爭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殘缺不全的片段；是貫徹於雙方一切大小問題和一切作戰階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無的。觀察中日戰爭如果忘記了這些特點，那就必然要弄錯；即使某些意見一時有人相信，似乎不錯，但戰爭的經過必將證明它們是錯的。我們現在就根據這些特點來說明我們所要說的一切問題。

駁亡國論

（一三）亡國論者看到敵我強弱對比一個因素，從前就說“抗戰必亡”，現在又說“再戰必亡”。如果我們僅僅說，敵人雖強，但是小國，中國雖弱，但是大國，是不足以折服他們的。他們可以搬出元朝滅宋、清朝滅明的歷史證據，證明小而強的國家能夠滅亡大而弱的國家，而且是落後的滅亡進步的。如果我們說，這是古代，不足為據，他們又可以搬出英滅印度的事實，證明小而強的資本主義國家能夠滅亡大而弱的落後國家。所以還須提出其他的根據，才能把一切亡國論者的口封住，使他們心服，而使一切從事宣傳工作的人們得到充足的論據去說服還不明白和還不堅定的人們，鞏固其抗戰的信心。

（一四）這應該提出的根據是什麼呢？就是時代的特點。這個特點的具體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國的進步和多助。

(一五) 我們的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中日兩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戰爭。在我們的敵人方面，首先，它是快要死亡的帝國主義，它已處於退步時代，不但和英滅印度時期英國還處於資本主義的進步時代不相同，就是和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日本也不相同。此次戰爭發動於世界帝國主義首先是法西斯國家大崩潰的前夜，敵人也正是為了這一點才舉行這個帶最後掙扎性的冒險戰爭。所以，戰爭的結果，滅亡的不會是中國而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集團，這是無可逃避的必然性。再則，當日本舉行戰爭的時候，正是世界各國或者已經遭遇戰爭或者快要遭遇戰爭的時候，大家都正在或準備著為反抗野蠻侵略而戰，中國這個國家又是同世界多數國家和多數人民利害相關的，這就是日本已經引起並還要加深地引起世界多數國家和多數人民的反對的根源。

(一六) 中國方面呢？它已經不能和別的任何歷史時期相比較。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是它的特點，所以被稱為弱國。但是在同時，它又處於歷史上進步的時代，這就是足以戰勝日本的主要根據。所謂抗日戰爭是進步的，不是說普通一般的進步，不是說阿比西尼亞抗意戰爭的那種進步，也不是說太平天國或辛亥革命的那種進步，而是說今天中國的進步。今天中國的進步在什麼地方呢？在於它已經不是完全的封建國家，已經有了資本主義，有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有了已經覺悟或正在覺悟的廣大人民，有了共產黨，有了政治上進步的軍隊

即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紅軍，有了數十年革命的傳統經驗，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十七年的經驗。這些經驗，教育了中國的人民，教育了中國的政黨，今天恰好作了團結抗日的基礎。如果說，在俄國，沒有一九〇五年的經驗就不會有一九一七年的勝利；那末，我們也可以說，如果沒有十七年以來的經驗，也將不會有抗日的勝利。這是國內的條件。

國際的條件，使得中國在戰爭中不是孤立的，這一點也是歷史上空前的東西。歷史上不論中國的戰爭也罷，印度的戰爭也罷，都是孤立的。惟獨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空前廣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運動及其對於中國的援助。俄國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遇到世界的援助，俄國的工人和農民因此勝利了，但那個援助的規模還沒有今天廣大，性質也沒有今天深刻。今天的世界的人民運動，正在以空前的大規模和空前的深刻性發展著。蘇聯的存在，更是今天國際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極大的熱忱援助中國，這一現象，是二十年前完全沒有的。所有這些，造成了和造成著為中國最後勝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條件。大量的直接的援助，目前雖然還沒有，尚有待於來日，但是中國有進步和大國的條件，能夠延長戰爭的時間，促進並等候國際的援助。

（一七）加上日本是小國，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國是大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這一個條件，於是在強弱對比之外，就還有小國、退步、寡助和大國、進步、多助的對比，這就是中國決不會亡的根據。強弱

對比雖然規定了日本能夠在中國有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的橫行，中國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艱難的路程，抗日戰爭是持久戰而不是速決戰；然而小國、退步、寡助和大國、進步、多助的對比，又規定了日本不能橫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後的失敗，中國決不會亡，必然要取得最後的勝利。

（一八）阿比西尼亞為什麼滅亡了呢？第一，它不是弱國，而且是小國。第二，它不如中國進步，它是一個古老的奴隸制到農奴制的國家，沒有資本主義，沒有資產階級政黨，更沒有共產黨，沒有中國這樣的軍隊，更沒有如同八路軍這樣的軍隊。第三，它不能等候國際的援助，它的戰爭是孤立的。第四，這是主要的，抗意戰爭領導方面有錯誤。阿比西尼亞因此滅亡了。然而阿比西尼亞還有相當廣大的游擊戰爭存在，如能堅持下去，是可以在未來的世界變動中據以恢復其祖國的。

（一九）如果亡國論者搬出中國近代解放運動的失敗史來證明“抗戰必亡”和“再戰必亡”的話，那我們的答復也是時代不同一句話。中國本身、日本內部、國際環境都和過去不相同。日本比過去更強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地位依然未變，力量依然頗弱，這一點是嚴重的情形。日本暫時還能控制其國內的人民，也還能利用國際間的矛盾作為其侵華的工具，這些都是事實。然而在長期的戰爭過程中，必然要發生相反的變化。這一點現在還不是事實，但是將來必然要成為事實的。這一點，亡國論者就拋棄不顧了。中國呢？不但現在已有

新的人、新的政黨、新的軍隊和新的抗日政策，和十餘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而且這些都必然會向前發展。雖然歷史上的解放運動屢次遭受挫折，使中國不能積蓄更大的力量用於今日的抗日戰爭——這是非常可痛惜的歷史的教訓，從今以後，再也不要自己摧殘任何的革命力量了——然而就在既存的基礎上，加上廣大的努力，必能逐漸前進，加強抗戰的力量。偉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是這種努力的總方向。國際援助一方面，眼前雖然還看不見大量的和直接的，但是國際局面根本已和過去兩樣，大量和直接的援助正在醞釀中。中國近代無數解放運動的失敗都有其客觀和主觀的原因，都不能比擬今天的情況。在今天，雖然存在著許多困難條件，規定了抗日戰爭是艱難的戰爭，例如敵人之強，我們之弱，敵人的困難還剛在開始，我們的進步還很不夠，如此等等，然而戰勝敵人的有利條件是很多的，只須加上主觀的努力，就能克服困難而爭取勝利。這些有利條件，歷史上沒有一個時候可和今天比擬，這就是抗日戰爭必不會和歷史上的解放運動同歸失敗的理由。

妥協還是抗戰？腐敗還是進步？

(二〇) 亡國論之沒有根據，俱如上述。但是另有許多人，並非亡國論者，他們是愛國志士，卻對時局懷抱甚深的憂慮。他們的問題有兩個：一是懼怕對日妥協，一是懷疑政治不能進步。這兩個可憂慮的問題在廣大的人們中間議論著，找不到解決的基點。我們現在就來研

究這兩個問題。

(二一) 前頭說過，妥協的問題是有其社會根源的，這個社會根源存在，妥協問題就不會不發生。但妥協是不會成功的。要證明這一點，仍不外向日本、中國、國際三方面找根據。第一是日本方面。還在抗戰初起時，我們就估計有一種醞釀妥協空氣的時機會要到來，那就是在敵人佔領華北和江浙之後，可能出以勸降手段。後來果然來了這一手；但是危機隨即過去，原因之一是敵人採取了普遍的野蠻政策，實行公開的掠奪。中國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國奴。敵人的這一掠奪的即滅亡中國的政策，分為物質的和精神的兩方面，都是普遍地施之於中國人的；不但是對下層民眾，而且是對上層成分，——當然對後者稍為客氣些，但也只有程度之別，並無原則之分。大體上，敵人是將東三省的老辦法移植於內地。在物質上，掠奪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廣大人民啼饑號寒；掠奪生產工具，使中國民族工業歸於毀滅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殘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在太陽旗下，每個中國人只能當順民，做牛馬，不許有一絲一毫的中國氣。敵人的這一野蠻政策，還要施之於更深的內地。他的胃口很旺，不願停止戰爭。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內閣宣言的方針，至今堅決執行，也不能不執行，這就激怒了一切階層的中國人。這是根據敵人戰爭的退步性野蠻性而來的，“在劫難逃”，於是形成了絕對的敵對。估計到某種時機，敵之勸降手段又將出現，某些亡國論者又將蠕蠕而動，而且難免勾結某些國際成分（英、美、

法內部都有這種人，特別是英國的上層分子），狼狽為奸。但是大勢所趨，是降不了的，日本戰爭的堅決性和特殊的野蠻性，規定了這個問題的一方面。

（二二）第二是中國方面。中國堅持抗戰的因素有三個：其一，共產黨，這是領導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又其一，國民黨，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會投降。又其一，別的黨派，大多數是反對妥協、擁護抗戰的。這三者互相團結，誰要妥協就是站在漢奸方面，人人得而誅之。一切不願當漢奸的人，就不能不團結起來堅持抗戰到底，妥協就實際上難於成功。

（二三）第三是國際方面。除日本的盟友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上層分子中的某些成分外，其餘都不利於中國妥協而利於中國抗戰。這一因素影響到中國的希望。今天全國人民有一種希望，認為國際力量必將逐漸增強地援助中國。這種希望不是空的；特別是蘇聯的存在，鼓舞了中國的抗戰。空前強大的社會主義的蘇聯，它和中國是歷來休戚相關的。蘇聯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上層成分之唯利是圖者根本相反，它是以援助一切弱小民族和革命戰爭為其職志的。中國戰爭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個國際的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蘇聯的援助上。中蘇兩國是地理接近的，這一點加重了日本的危機，便利了中國的抗戰。中日兩國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國抗戰的困難。然而中蘇的地理接近，卻是中國抗戰的有利條件。

（二四）由此可作結論：妥協的危機是存在的，但

是能夠克服。因為敵人的政策即使可作某種程度的改變，但其根本改變是不可能的。中國內部有妥協的社會根源，但是反對妥協的佔大多數。國際力量也有一部分贊助妥協，但是主要的力量贊助抗戰。這三種因素結合起來，就能克服妥協危機，堅持抗戰到底。

(二五) 現在來答復第二個問題。國內政治的改進，是和抗戰的堅持不能分離的。政治越改進，抗戰越能堅持；抗戰越堅持，政治就越能改進。但是基本上依賴於堅持抗戰。國民黨的各方面的不良現象是嚴重地存在著，這些不合理因素的歷史積累，使得廣大愛國志士發生很大的憂慮和煩悶。但是抗戰的經驗已經證明，十個月的中國人民的進步抵得上過去多少年的進步，並無使人悲觀的根據。歷史積累下來的腐敗現象，雖然很嚴重地阻礙著人民抗戰力量增長的速度，減少了戰爭的勝利，招致了戰爭的損失，但是中國、日本和世界的大局，不容許中國人民不進步。由於阻礙進步的因素即腐敗現象之存在，這種進步是緩慢的。進步和進步的緩慢是目前時局的兩個特點，後一個特點和戰爭的迫切要求很不相稱，這就是使得愛國志士們大為發愁的地方。然而我們是在革命戰爭中，革命戰爭是一種抗毒素，它不但將排除敵人的毒焰，也將清洗自己的污濁。凡屬正義的革命的戰爭，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為改造事物開闢道路。中日戰爭將改造中日兩國；只要中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就一定能把舊日本化為新日本，把舊中國化為新中國，中日兩國的人和物都將在這次戰

爭中和戰爭後獲得改造。我們把抗戰和建國聯繫起來看，是正當的。說日本也能獲得改造，是說日本統治者的侵略戰爭將走到失敗，有引起日本人民革命之可能。日本人民革命勝利之日，就是日本改造之時。這和中國的抗戰密切地聯繫著，這一個前途是應該看到的。

亡國論是不對的，速勝論也是不對的

(二六) 我們已把強弱、大小、進步退步、多助寡助幾個敵我之間矛盾著的基本特點，作了比較研究，批駁了亡國論，答復了為什麼不易妥協和為什麼政治可能進步的問題。亡國論者看重了強弱一個矛盾，把它誇大起來作為全部問題的論據，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們只提強弱對比一點，是他們的片面性；他們將此片面的東西誇大起來看成全體，又是他們的主觀性。所以在全體說來，他們是沒有根據的，是錯誤的。那些並非亡國論者，也不是一貫的悲觀主義者，僅為一時候和一局部的敵我強弱情況或國內腐敗現象所迷惑，而一時地發生悲觀心理的人們，我們也得向他們指出，他們的觀點的來源也是片面性和主觀性的傾向。但是他們的改正較容易，只要一提醒就會明白，因為他們是愛國志士，他們的錯誤是一時的。

(二七) 然而速勝論者也是不對的。他們或則根本忘記了強弱這個矛盾，而單單記起了其他矛盾；或則對於中國的長處，誇大得離開了真實情況，變成另一種樣子；或則拿一時一地的強弱現象代替了全體中的強弱現

象，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而自以為是。總之，他們沒有勇氣承認敵強我弱這件事實。他們常常抹殺這一點，因此抹殺了真理的一方面。他們又沒有勇氣承認自己長處之有限性，因而抹殺了真理的又一方面。由此犯出或大或小的錯誤來，這裏也是主觀性和片面性作怪。這些朋友們的心是好的，他們也是愛國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的看法則不對，照了做去，一定碰壁。因為估計不符合真相，行動就無法達到目的；勉強行去，敗軍亡國，結果和失敗主義者沒有兩樣。所以也是要不得的。

（二八）我們是否否認亡國危險呢？不否認的。我們承認在中國面前擺著解放和亡國兩個可能的前途，兩者在猛烈地鬥爭中。我們的任務在於實現解放而避免亡國。實現解放的條件，基本的是中國的進步，同時，加上敵人的困難和世界的援助。我們和亡國論者不同，我們客觀地而且全面地承認亡國和解放兩個可能同時存在，著重指出解放的可能佔優勢及達到解放的條件，並為爭取這些條件而努力。亡國論者則主觀地和片面地只承認亡國一個可能性，否認解放的可能性，更不會指出解放的條件和為爭取這些條件而努力。我們對於妥協傾向和腐敗現象也是承認的，但是我們還看到其他傾向和其他現象，並指出二者之中後者對於前者將逐步地佔優勢，二者在猛烈地鬥爭著；並指出後者實現的條件，為克服妥協傾向和轉變腐敗現象而努力。因此，我們並不悲觀，而悲觀的人們則與此相反。

(二九) 我們也不是不喜歡速勝，誰也贊成明天一個早上就把“鬼子”趕出去。但是我們指出，沒有一定的條件，速勝只存在於頭腦之中，客觀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因此，我們客觀地並全面地估計到一切敵我情況，指出只有戰略的持久戰才是爭取最後勝利的唯一途徑，而排斥毫無根據的速勝論。我們主張為著爭取最後勝利所必要的一切條件而努力，條件多具備一分，早具備一日，勝利的把握就多一分，勝利的時間就早一日。我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縮短戰爭的過程，而排斥貪便宜尚空談的速勝論。

為什麼是持久戰？

(三〇) 現在我們來把持久戰問題研究一下。“為什麼是持久戰”這一個問題，只有依據全部敵我對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確的回答。例如單說敵人是帝國主義的強國，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就有陷入亡國論的危險。因為單純地以弱敵強，無論在理論上，在實際上，都不能產生持久的結果。單是大小或單是進步退步、多助寡助，也是一樣。大併小、小併大的事都是常有的。進步的國家或事物，如果力量不強，常有被大而退步的國家或事物所滅亡者。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隨因素，依敵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因此，我們說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是從全部敵我因素的相互關係產生的結論。敵強我弱，我有滅亡的危險。但敵尚有其他缺點，我尚有其他優點。敵之優點

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點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擴大。我方反是，我之優點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強，缺點則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後勝利，避免滅亡，敵則將最後失敗，而不能避免整個帝國主義制度的崩潰。

（三一）既然敵之優點只有一個，餘皆缺點，我之缺點只有一個，餘皆優點，為什麼不能得出平衡結果，反而造成了現時敵之優勢我之劣勢呢？很明顯的，不能這樣形式地看問題。事情是現時敵我強弱的程度懸殊太大，敵之缺點一時還沒有也不能發展到足以減殺其強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我之優點一時也沒有且不能發展到足以補充其弱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所以平衡不能出現，而出現的是不平衡。

（三二）敵強我弱，敵是優勢而我是劣勢，這種情況，雖因我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努力而有所變化，但是還沒有產生基本的變化。所以，在戰爭的一定階段上，敵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勝利，我則將遭到一定程度的失敗。然而敵我都只限於這一定階段內一定程度上的勝或敗，不能超過而至於全勝或全敗，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一則敵強我弱之原來狀況就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二則由於我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努力，更加造成這種相對的形勢。拿原來狀況來說，敵雖強，但敵之強已為其他不利的因素所減殺，不過此時還沒有減殺到足以破壞敵之優勢的必要的程度；我雖弱，但我之弱已為其他有利的因素所補充，不過此時還沒有補充到足以改變我之劣勢的必要的程度。於是形成敵是相對的強，我是

相對的弱；敵是相對的優勢，我是相對的劣勢。雙方的強弱優劣原來都不是絕對的，加以戰爭過程中我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努力，更加變化了敵我原來強弱優劣的形勢，因而敵我只限於一定階段內的一定程度上的勝或敗，造成了持久戰的局面。

（三三）然而情況是繼續變化的。戰爭過程中，只要我能運用正確的軍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則的錯誤，竭盡最善的努力，敵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將隨戰爭之延長而發展，必能繼續改變著敵我強弱的原來程度，繼續變化著敵我的優劣形勢。到了新的一定階段時，就將發生強弱程度上和優劣形勢上的大變化，而達到敵敗我勝的結果。

（三四）目前敵尚能勉強利用其強的因素，我之抗戰尚未給他以基本的削弱。其人力、物力不足的因素尚不足以阻止其進攻，反之，尚足以維持其進攻到一定的程度。其足以加劇本國階級對立和中國民族反抗的因素，即戰爭之退步性和野蠻性一因素，亦尚未造成足以根本妨礙其進攻的情況。敵人的國際孤立的因素也方在變化發展之中，還沒有達到完全的孤立。許多表示助我的國家的軍火資本家和戰爭原料資本家，尚在唯利是圖地供給日本以大量的戰爭物資，他們的政府亦尚不願和蘇聯一道用實際方法制裁日本。這一切，規定了我之抗戰不能速勝，而只能是持久戰。中國方面，弱的因素表現在軍事、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雖在十個月抗戰中有了某種程度的進步，但距離足以阻止敵之進攻及準備

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還遠得很。且在量的方面，又不得不有所減弱。其各種有利因素，雖然都在起積極作用，但達到足以停止敵之進攻及準備我之反攻的程度則尚有待於巨大的努力。在國內，克服腐敗現象，增加進步速度；在國外，克服助日勢力，增加反日勢力，尚非目前的現實。這一切，又規定了戰爭不能速勝，而只能是持久戰。

持久戰的三個階段

（三五）中日戰爭既然是持久戰，最後勝利又將是屬於中國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設想，這種持久戰，將具體地表現於三個階段之中。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禦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三個階段的具體情況不能預斷，但依目前條件來看，戰爭趨勢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觀現實的行程將是異常豐富和曲折變化的，誰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戰爭的“流年”來；然而給戰爭趨勢描畫一個輪廓，卻為戰略指導所必需。所以，儘管描畫的東西不能盡合將來的事實，而將為事實所校正，但是為著堅定地有目的地進行持久戰的戰略指導起見，描畫輪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三六）第一階段，現在還未完結。敵之企圖是攻佔廣州、武漢、蘭州三點，並把三點聯繫起來。敵欲達此目的，至少出五十個師團，約一百五十萬兵員，時間一年半至兩年，用費將在一百萬萬日元以上。敵人如此

深入，其困難是非常之大的，其後果將不堪設想。至欲完全佔領粵漢鐵路和西蘭公路，將經歷非常危險的戰爭，未必儘能達其企圖。但是我們的作戰計劃，應把敵人可能佔領三點甚至三點以外之某些部分地區並可能互相聯繫起來作為一種基礎，部署持久戰，即令敵如此做，我也有應付之方。這一階段我所採取的戰爭形式，主要的是運動戰，而以游擊戰和陣地戰輔助之。陣地戰雖在此階段之第一期，由於國民黨軍事當局的主觀錯誤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從全階段看，仍然是輔助的。此階段中，中國已經結成了廣大的統一戰線，實現了空前的團結。敵雖已經採用過並且還將採用卑鄙無恥的勸降手段，企圖不費大力實現其速決計劃，整個地征服中國，但是過去的已經失敗，今後的也難成功。此階段中，中國雖有頗大的損失，但是同時卻有頗大的進步，這種進步就成為第二階段繼續抗戰的主要基礎。此階段中，蘇聯對於我國已經有了大量的援助。敵人方面，士氣已開始表現頹靡，敵人陸軍進攻的銳氣，此階段的中期已不如初期，末期將更不如初期。敵之財政和經濟已開始表現其竭蹶狀態，人民和士兵的厭戰情緒已開始發生，戰爭指導集團的內部已開始表現其“戰爭的煩悶”，生長著對於戰爭前途的悲觀。

（三七）第二階段，可以名之曰戰略的相持階段。第一階段之末尾，由於敵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堅強抵抗，敵人將不得不決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戰略進攻終點，到達此終點以後，即停止其戰略進攻，轉入保守佔領地的階段。

此階段內，敵之企圖是保守佔領地，以組織偽政府的欺騙辦法據之為己有，而從中國人民身上儘量搜括東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著頑強的游擊戰爭。游擊戰爭在第一階段中乘著敵後空虛將有一個普遍的發展，建立許多根據地，基本上威脅到敵人佔領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階段仍將有廣大的戰爭。此階段中我之作戰形式主要的是游擊戰，而以運動戰輔助之。此時中國尚能保有大量的正規軍，不過一方面因敵在其佔領的大城市和大道中取戰略守勢，一方面因中國技術條件一時未能完備，尚難迅即舉行戰略反攻。除正面防禦部隊外，我軍將大量地轉入敵後，比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敵人未佔區域，配合民眾武裝，向敵人佔領地作廣泛的和猛烈的游擊戰爭，並儘可能地調動敵人於運動戰中消滅之，如同現在山西的榜樣。此階段的戰爭是殘酷的，地方將遇到嚴重的破壞。但是游擊戰爭能夠勝利，做得好，可能使敵只能保守佔領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區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們的，這就是敵人的大失敗，中國的大勝利。那時，整個敵人佔領地將分為三種地區：第一種是敵人的根據地，第二種是游擊戰爭的根據地，第三種是雙方爭奪的游擊區。這個階段的時間的長短，依敵我力量增減變化的程度如何及國際形勢變動如何而定，大體上我們要準備付給較長的時間，要熬得過這段艱難的路程。這將是中國很痛苦的時期，經濟困難和漢奸搗亂將是兩個很大的問題。敵人將大肆其破壞中國統一戰線的活動，一切敵之佔領地的漢奸組織將合流組成所謂“統一政府”。

我們內部，因大城市的喪失和戰爭的困難，動搖分子將大倡其妥協論，悲觀情緒將嚴重地增長。此時我們的任務，在於動員全國民眾，齊心一致，絕不動搖地堅持戰爭，把統一戰線擴大和鞏固起來，排除一切悲觀主義和妥協論，提倡艱苦鬥爭，實行新的戰時政策，熬過這一段艱難的路程。此階段內，必須號召全國堅決地維持一個統一政府，反對分裂，有計劃地增強作戰技術，改造軍隊，動員全民，準備反攻。此階段中，國際形勢將變到更於日本不利，雖可能有張伯倫一類的遷就所謂“既成事實”的“現實主義”的調頭出現，但主要的國際勢力將變到進一步地援助中國。日本威脅南洋和威脅西伯利亞，將較之過去更加嚴重，甚至爆發新的戰爭。敵人方面，陷在中國泥潭中的幾十個師團抽不出去。廣大的游擊戰爭和人民抗日運動將疲憊這一大批日本軍，一方面大量地消耗之，又一方面進一步地增長其思鄉厭戰直至反戰的心理，從精神上瓦解這個軍隊。日本在中國的掠奪雖然不能說它絕對不能有所成就，但是日本資本缺乏，又困於游擊戰爭，急遽的大量的成就是不可能的。這個第二階段是整個戰爭的過渡階段，也將是最困難的時期，然而它是轉變的樞紐。中國將變為獨立國，還是淪為殖民地，不決定於第一階段大城市之是否喪失，而決定於第二階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持久戰，中國將在此階段中獲得轉弱為強的力量。中國抗戰的三幕戲，這是第二幕。由於全體演員的努力，最精彩的結幕便能很好地演出來。

(三八) 第三階段，是收復失地的反攻階段。收復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國自己在前階段中準備著的和在本階段中繼續地生長著的力量。然而單只自己的力量還是不夠的，還須依靠國際力量和敵國內部變化的援助，否則是不能勝利的，因此加重了中國的國際宣傳和外交工作的任務。這個階段，戰爭已不是戰略防禦，而將變為戰略反攻了，在現象上，並將表現為戰略進攻；已不是戰略內線，而將逐漸地變為戰略外線。直至打到鴨綠江邊，才算結束了這個戰爭。第三階段是持久戰的最後階段，所謂堅持戰爭到底，就是要走完這個階段的全程。這個階段我所採取的主要的戰爭形式仍將是運動戰，但是陣地戰將提到重要地位。如果說，第一階段的陣地防禦，由於當時的條件，不能看作重要的，那末，第三階段的陣地攻擊，由於條件的改變和任務的需要，將變成頗為重要的。此階段內的游擊戰，仍將輔助運動戰和陣地戰而起其戰略配合的作用，和第二階段之變為主要形式者不相同。

(三九) 這樣看來，戰爭的長期性和隨之而來的殘酷性，是明顯的。敵人不能整個地吞併中國，但是能夠相當長期地佔領中國的許多地方。中國也不能迅速地驅逐日本，但是大部分的土地將依然是中國的。最後是敵敗我勝，但是必須經過一段艱難的路程。

(四〇) 中國人民在這樣長期和殘酷的戰爭中間，將受到很好的鍛煉。參加戰爭的各政黨也將受到鍛煉和考驗。統一戰線必須堅持下去；只有堅持統一戰線，才

能堅持戰爭；只有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戰爭，才能有最後勝利。果然是這樣，一切困難就能夠克服。跨過戰爭的艱難路程之後，勝利的坦途就到來了，這是戰爭的自然邏輯。

（四一）三個階段中，敵我力量的變化將循著下述的道路前進。第一階段敵是優勢，我是劣勢。我之這種劣勢，須估計抗戰以前到這一階段末尾，有兩種不同的變化。第一種是向下的。中國原來的劣勢，經過第一階段的消耗將更為嚴重，這就是土地、人口、經濟力量、軍事力量和文化機關等的減縮。第一階段的末尾，也許要減縮到相當大的程度，特別是經濟方面。這一點，將被人利用作為亡國論和妥協論的根據。然而必須看到第二種變化，即向上的變化。這就是戰爭中的經驗，軍隊的進步，政治的進步，人民的動員，文化的新方向的發展，游擊戰爭的出現，國際援助的增長等等。在第一階段，向下的東西是舊的量和質，主要地表現在量上。向上的東西是新的量和質，主要地表現在質上。這第二種變化，就給了我們以能夠持久和最後勝利的根據。

（四二）第一階段中，敵人方面也有兩種變化。第一種是向下的，表現在：幾十萬人的傷亡，武器和彈藥的消耗，士氣的頹靡，國內人心的不滿，貿易的縮減，一百萬萬日元以上的支出，國際輿論的責備等等方面。這個方面，又給予我們以能夠持久和最後勝利的根據。然而也要估計到敵人的第二種變化，即向上的變化。那就是他擴大了領土、人口和資源。在這點上面，又產生

我們的抗戰是持久戰而不能速勝的根據，同時也將被一些人利用作為亡國論和妥協論的根據。但是我們必須估計敵人這種向上變化的暫時性和局部性。敵人是行將崩潰的帝國主義者，他佔領中國的土地是暫時的。中國游擊戰爭的猛烈發展，將使他的佔領區實際上限制在狹小的地帶。而且，敵人對中國土地的佔領又產生了和加深了日本同外國的矛盾。再則，根據東三省的經驗，日本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一般地只能是支出資本時期，不能是收穫時期。所有這些，又是我們擊破亡國論和妥協論而建立持久論和最後勝利論的根據。

（四三）第二階段，上述雙方的變化將繼續發展，具體的情形不能預斷，但是大體上將是日本繼續向下，中國繼續向上。例如日本的軍力、財力大量地消耗於中國的游擊戰爭，國內人心更加不滿，士氣更加頹靡，國際更感孤立。中國則政治、軍事、文化和人民動員將更加進步，游擊戰爭更加發展，經濟方面也將依憑內地的小工業和廣大的農業而有某種程度的新發展，國際援助將逐漸地增進，將比現在的情況大為改觀。這個第二階段，也許將經過相當長的時間。在這個時間內，敵我力量對比將發生巨大的相反的變化，中國將逐漸上升，日本則逐漸下降。那時中國將脫出劣勢，日本則脫出優勢，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優劣相反的地位。然後中國大體上將完成戰略反攻的準備而走到實行反攻、驅敵出國的階段。應該重複地指出：所謂變劣勢為優勢和完成反攻準備，是包括中國自己力量的增長、日本困難的增

長和國際援助的增長在內的，總合這些力量就能形成中國的優勢，完成反攻的準備。

（四四）根據中國政治和經濟不平衡的狀態，第三階段的戰略反攻，在其前一時期將不是全國整齊劃一的姿態，而是帶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態。敵人採用各種分化手段破裂中國統一戰線的企圖，此階段中並不會減弱，因此，中國內部團結的任務更加重要，務不令內部不調致戰略反攻半途而廢。此時期中，國際形勢將變到大有利於中國。中國的任務，就在於利用這種國際形勢取得自己的徹底解放，建立獨立的民主國家，同時也就是幫助世界的反法西斯運動。

（四五）中國由劣勢到平衡到優勢，日本由優勢到平衡到劣勢，中國由防禦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進攻到保守到退卻——這就是中日戰爭的過程，中日戰爭的必然趨勢。

（四六）於是問題和結論是：中國會亡嗎？答復：不會亡，最後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復：不能速勝，必須是持久戰。這個結論是正確的嗎？我以為是正確的。

（四七）講到這裏，亡國論和妥協論者又將跑出來說：中國由劣勢到平衡，需要有同日本相等的軍力和經濟力；由平衡到優勢，需要有超過日本的軍力和經濟力；然而這是不可能的，因此上述結論是不正確的。

（四八）這就是所謂“唯武器論”，是戰爭問題中

的機械論，是主觀地和片面地看問題的意見。我們的意見與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國人的大多數、日本人的大多數、世界各國人的大多數是站在抗日戰爭方面的話，那末，日本少數人強制地掌握著的軍力和經濟力，還能算是優勢嗎？它不是優勢，那末，掌握比較劣勢的軍力和經濟力的中國，不就成了優勢嗎？沒有疑義，中國只要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其軍力和經濟力是能夠逐漸地加強的。而我們的敵人，經過長期戰爭和內外矛盾的削弱，其軍力和經濟力又必然要起相反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難道中國也不能變成優勢嗎？還不止此，目前我們不能把別國的軍力和經濟力大量地公開地算作自己方面的力量，難道將來也不能嗎？如果日本的敵人不只中國一個，如果將來有一國或幾國以其相當大量的軍力和經濟力公開地防禦或攻擊日本，公開地援助我們，那末，優勢不更在我們一方面嗎？日本是小國，其戰爭是退步的和野蠻的，其國際地位將益處於孤立；中國是大國，其戰爭是進步的和正義的，其國際地位將益處於多助。所有這些，經過長期發展，難道還不能使敵我優劣的形勢確定地發生變化嗎？

（四九）速勝論者則不知道戰爭是力量的競賽，在

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沒有起一定的變化以前，就要舉行戰略的決戰，就想提前到達解放之路，也是沒有根據的。其意見實行起來，一定不免於碰壁。或者只是空談快意，並不準備真正去做。最後則是事實先生跑將出來，給這些空談家一瓢冷水，證明他們不過是一些貪便宜、想少費氣力多得收成的空談主義者。這種空談主義過去和現在已經存在，但是還不算很多，戰爭發展到相持階段和反攻階段時，空談主義可能多起來。但是在同時，如果第一階段中國損失較大，第二階段時間拖得很長，亡國論和妥協論更將大大地流行。所以我們的火力，應該主要地向著亡國論和妥協論方面，而以次要的火力，反對空談主義的速勝論。

(五〇) 戰爭的長期性是確定了的，但是戰爭究將經過多少年月則誰也不能預斷，這個完全要看敵我力量變化的程度才能決定。一切想要縮短戰爭時間的人們，惟有努力於增加自己力量減少敵人力量之一法。具體地說，惟有努力於作戰多打勝仗，消耗敵人的軍隊，努力於發展游擊戰爭，使敵之佔領地限制於最小的範圍，努力於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團結全國力量，努力於建設新軍和發展新的軍事工業，努力於推動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進步，努力於工、農、商、學各界人民的動員，努力於瓦解敵軍和爭取敵軍的士兵，努力於國際宣傳爭取國際的援助，努力於爭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壓迫民族的援助，做了這一切，才能縮短戰爭的時間，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圖便的法門。

犬牙交錯的戰爭

(五一) 我們可以斷言，持久戰的抗日戰爭，將在人類戰爭史中表現為光榮的特殊的一頁。犬牙交錯的戰爭形態，就是頗為特殊的一點，這是由於日本的野蠻和兵力不足，中國的進步和土地廣大這些矛盾因素產生出來的。犬牙交錯的戰爭，在歷史上也是有過的，俄國十月革命後的三年內戰，就有過這種情形。但其在中國的特點，是其特殊的長期性和廣大性，這將是突破歷史紀錄的東西。這種犬牙交錯的形態，表現在下述的幾種情況上。

(五二) 內線和外線——抗日戰爭是整個處於內線作戰的地位的；但是主力軍和游擊隊的關係，則是主力軍在內線，游擊隊在外線，形成夾攻敵人的奇觀。各游擊區的關係亦然。各個游擊區都以自己為內線，而以其他各區為外線，又形成了很多夾攻敵人的火線。在戰爭的第一階段，戰略上內線作戰的正規軍是後退的，但是戰略上外線作戰的游擊隊則將廣泛地向著敵人後方大踏步前進，第二階段將更加猛烈地前進，形成了後退和前進的奇異形態。

(五三) 有後方和無後方——利用國家的總後方，而把作戰線伸至敵人佔領地之最後限界的，是主力軍。脫離總後方而把作戰線伸至敵後的，是游擊隊。但在每一游擊區中，仍自有其小規模的後方，並依以建立非固定的作戰線。和這個區別的，是每一游擊區派遣出去向

該區敵後臨時活動的游擊隊，他們不但沒有後方，也沒有作戰線。“無後方的作戰”，是新時代中領土廣大、人民進步、有先進政黨和先進軍隊的情況之下的革命戰爭的特點，沒有可怕而有大利，不應懷疑而應提倡。

（五四）包圍和反包圍——從整個戰爭看來，由於敵之戰略進攻和外線作戰，我處戰略防禦和內線作戰地位，無疑我是在敵之戰略包圍中。這是敵對於我之第一種包圍。由於我以數量上優勢的兵力，對於從戰略上的外線分數路向我前進之敵，採取戰役和戰鬥上的外線作戰方針，就可以把各路分進之敵的一路或幾路放在我之包圍中。這是我對於敵之第一種反包圍。再從敵後游擊戰爭的根據地看來，每一孤立的根據地都處於敵之四面或三面包圍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後者例如晉西北。這是敵對於我之第二種包圍。但若將各個游擊根據地聯繫起來看，並將各個游擊根據地和正規軍的陣地也聯繫起來看，我又把許多敵人都包圍起來，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圍了同蒲路（路之東西兩側及南端），四面包圍了太原城；河北、山東等省也有許多這樣的包圍。這又是我對於敵之第二種反包圍。這樣，敵我各有加於對方的兩種包圍，大體上好似下圍棋一樣，敵對於我我對於敵之戰役和戰鬥的作戰，好似吃子，敵的據點（例如太原）和我之游擊根據地（例如五台山），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的圍棋也算在內，那就還有第三種敵我包圍，這就是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的關係。敵以前者來包圍中、蘇、法、捷等國，我以後者反包圍德、日、意。但是我之包

圍好似如來佛的手掌，它將化成一座橫亘宇宙的五行山，把這幾個新式孫悟空——法西斯侵略主義者，最後壓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陣線，把中國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又把蘇聯及其他可能的國家也各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又把日本人民運動也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形成一個使法西斯孫悟空無處逃跑的天羅地網，那就是敵人死亡之時了。實際上，日本帝國主義完全打倒之日，必是這個天羅地網大體布成之時。這絲毫也不是笑話，而是戰爭的必然的趨勢。

（五五）大塊和小塊——一種可能，是敵佔地區將佔中國本部之大半，而中國本部完整的區域只佔一小半。這是一種情形。但是敵佔大半中，除東三省等地外，實際只能佔領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說是一等的，依面積和人口來說可能只是敵佔區中之小半，而普遍地發展的游擊區，反居其大半。這又是一種情形。如果超越本部的範圍，而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算了進來，則在面積上中國未失地區仍然是大半，而敵佔地區包括東三省在內，也只是小半。這又是一種情形。完整區域當然是重要的，應集大力去經營，不但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文化方面也要緊。敵人已將我們過去的文化中心變為文化落後區域，而我們則要將過去的文化落後區域變為文化中心。同時，敵後廣大游擊區的經營也是非常之要緊的，也應把它們的各方面發展起來，也應發展其文化工作。總起來看，中國將是大塊的鄉村變為進步和光明的地區，而小塊的敵佔區，尤其是大城市，

將暫時地變為落後和黑暗的地區。

（五六）這樣看來，長期而又廣大的抗日戰爭，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錯的戰爭，這是戰爭史上的奇觀，中華民族的壯舉，驚天動地的偉業。這個戰爭，不但將影響到中日兩國，大大推動兩國的進步，而且將影響到世界，推動各國首先是印度等被壓迫民族的進步。全中國人都應自覺地投入這個犬牙交錯的戰爭中去，這就是中華民族自求解放的戰爭形態，是半殖民地大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舉行的解放戰爭的特殊形態。

為永久和平而戰

（五七）中國抗日戰爭的持久性同爭取中國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離的。沒有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像今天一樣，戰爭是接近於永久和平的。由於階級的出現，幾千年來人類的生活中充滿了戰爭，每一個民族都不知打了幾多仗，或在民族集團之內打，或在民族集團之間打。打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帝國主義時期，仗就打得特別廣大和特別殘酷。二十年前的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在過去歷史上是空前的，但還不是絕後的戰爭。只有目前開始了的戰爭，接近於最後戰爭，就是說，接近於人類的永久和平。目前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進入了戰爭，你們看，一個意大利，又一個日本，一個阿比西尼亞，又一個西班牙，再一個中國。參加戰爭的這些國家共有差不多六萬萬人口，幾乎佔了全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目前的戰爭的特點是無間斷和接近永久和平的性質。為什麼無間斷？意大利同阿比西尼亞打了之後，接著意大利同西班牙打，德國也搭了股份，接著日本又同中國打。還要接著誰呢？無疑地要接著希特勒同各大國打。“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一點也不錯。目前的戰爭發展到世界大戰之間，是不會間斷的，人類的戰爭災難不可避免。為什麼又說這次戰爭接近於永久和平？這次戰爭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已開始的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發展的基礎上發生的，由於這種總危機，逼使各資本主義國家走入新的戰爭，首先逼使各法西斯國家從事於新戰爭的冒險。我們可以預見這次戰爭的結果，將不是資本主義的獲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潰。這次戰爭，將比二十年前的戰爭更大，更殘酷，一切民族將無可避免地捲入進去，戰爭時間將拖得很長，人類將遭受很大的痛苦。但是由於蘇聯的存在和世界人民覺悟程度的提高，這次戰爭中無疑將出現偉大的革命戰爭，用以反對一切反革命戰爭，而使這次戰爭帶著為永久和平而戰的性質。即使爾後尚有一個戰爭時期，但是已離世界的永久和平不遠了。人類一經消滅了資本主義，便到達永久和平的時代，那時候便再也不要戰爭了。那時將不要軍隊，也不要兵船，不要軍用飛機，也不要毒氣。從此以後，人類將億萬斯年看不見戰爭。已經開始了的革命的戰爭，是這個為永久和平而戰的戰爭的一部分。佔著五萬萬以上人口的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爭，在這個戰爭中將佔著重要的地位，中華民族的解放將從這個戰爭中得來。將來的被解放了

的新中國，是和將來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離的。因此，我們的抗日戰爭包含著為爭取永久和平而戰的性質。

（五八）歷史上的戰爭分為兩類，一類是正義的，一類是非正義的。一切進步的戰爭都是正義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我們共產黨人反對一切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的戰爭，但是不反對進步的正義的戰爭。對於後一類戰爭，我們共產黨人不但反對，而且積極地參加。前一類戰爭，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雙方都是為著帝國主義利益而戰，所以全世界的共產黨人堅決地反對那一次戰爭。反對的方法，在戰爭未爆發前，極力阻止其爆發；既爆發後，只要有可能，就用戰爭反對戰爭，用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日本的戰爭是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的戰爭，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內，都應該反對，也正在反對。我們中國，則從人民到政府，從共產黨到國民黨，一律舉起了義旗，進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戰爭。我們的戰爭是神聖的、正義的，是進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國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時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達此目的，便須決一死戰，便須準備著一切犧牲，堅持到底，不達目的，決不停止。犧牲雖大，時間雖長，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經鮮明地擺在我們的前面。我們從事戰爭的信念，便建立在這個爭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國和新世界的上面。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要把戰爭延長到無盡期，我們則要把戰爭在一個不很久

遠的將來給以結束。為了這個目的，人類大多數應該拿出極大的努力。四億五千萬的中國人佔了全人類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夠一齊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創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對於爭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貢獻，無疑地是非常偉大的。這種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會經濟的行程已經接近了這一點，只須加上多數人的努力，幾十年工夫一定可以達到目的

能動性在戰爭中

（五九）以上說的，都是說明為什麼是持久戰和為什麼最後勝利是中國的，大體上都是說的“是什麼”和“不是什麼”。以下，將轉到研究“怎樣做”和“不怎樣做”的問題上。怎樣進行持久戰和怎樣爭取最後勝利？這就是以下要答復的問題。為了這個，我們將依次說明下列的問題：能動性在戰爭中，戰爭和政治，抗戰的政治動員，戰爭的目的，防禦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主動性，靈活性，計劃性，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戰，殲滅戰，消耗戰，乘敵之隙的可能性，抗日戰爭的決戰問題，兵民是勝利之本。我們現在就從能動性問題說起吧。

（六〇）我們反對主觀地看問題，說的是一個人的思想，不根據和不符合於客觀事實，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敗，故須反對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戰和最後勝利沒有人做就不會出現。做就必須先有人根據客觀事實，引出思想、道理、意見，

提出計劃、方針、政策、戰略、戰術，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觀的東西，做或行動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東西，都是人類特殊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我們名之曰“自覺的能動性”，是人之所以區別於物的特點。一切根據和符合於客觀事實的思想是正確的思想，一切根據於正確思想的做或行動是正確的行動。我們必須發揚這樣的思想 and 行動，必須發揚這種自覺的能動性。抗日戰爭是要趕走帝國主義，變舊中國為新中國，必須動員全中國人民，統統發揚其抗日的自覺的能動性，才能達到目的。坐著不動，只有被滅亡，沒有持久戰，也沒有最後勝利。

（六一）自覺的能動性是人類的特點。人類在戰爭中強烈地表現出這樣的特點。戰爭的勝負，固然決定於雙方軍事、政治、經濟、地理、戰爭性質、國際援助諸條件，然而不僅僅決定於這些；僅有這些，還只是有了勝負的可能性，它本身沒有分勝負。要分勝負，還須加上主觀的努力，這就是指導戰爭和實行戰爭，這就是戰爭中的自覺的能動性。

（六二）指導戰爭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戰爭的勝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觀條件的限度之內，能動地爭取戰爭的勝利。戰爭指揮員活動的舞台，必須建築在客觀條件的許可之上，然而他們憑藉這個舞台，卻可以導演出很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戲劇來。在既定的客觀物質的基礎之上，抗日戰爭的指揮員就要發揮他們的威力，提挈全軍，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敵人，改變我們這個被侵略被壓迫的社會國家的狀態，

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國，這裏就用得著而且必須用我們的主觀指導的能力。我們不贊成任何一個抗日戰爭的指揮員，離開客觀條件，變為亂撞亂碰的魯莽家，但是我們必須提倡每個抗日戰爭的指揮員變為勇敢而明智的將軍。他們不但要有壓倒敵人的勇氣，而且要有駕馭整個戰爭變化發展的能力。指揮員在戰爭的大海中游泳，他們要不使自己沈沒，而要使自己決定地有步驟地到達彼岸。作為戰爭指導規律的戰略戰術，就是戰爭大海中的游泳術。

戰爭和政治

（六三）“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在這點上說，戰爭就是政治，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動，從古以來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爭。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革命戰爭，它的勝利，離不開戰爭的政治目的——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離不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總方針，離不開全國人民的動員，離不開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等項政治原則，離不開統一戰線政策的良好執行，離不開文化的動員，離不開爭取國際力量和敵國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話，戰爭一刻也離不了政治。抗日軍人中，如有輕視政治的傾向，把戰爭孤立起來，變為戰爭絕對主義者，那是錯誤的，應加糾正。

（六四）但是戰爭有其特殊性，在這點上說，戰爭不即等於一般的政治。“戰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繼續”。

政治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再也不能照舊前進，於是爆發了戰爭，用以掃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礙。例如中國的半獨立地位，是日本帝國主義政治發展的障礙，日本要掃除它，所以發動了侵略戰爭。中國呢？帝國主義壓迫，早就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障礙，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戰爭，企圖掃除這個障礙。日本現在用戰爭來壓迫，要完全斷絕中國革命的進路，所以不得不舉行抗日戰爭，決心要掃除這個障礙。障礙既除，政治的目的達到，戰爭結束。障礙沒有掃除得乾淨，戰爭仍須繼續進行，以求貫徹。例如抗日的任務未完，有想求妥協的，必不成功；因為即使因某種緣故妥協了，但是戰爭仍要起來，廣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繼續戰爭，貫徹戰爭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說，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

（六五）基於戰爭的特殊性，就有戰爭的一套特殊組織，一套特殊方法，一種特殊過程。這組織，就是軍隊及其附隨的一切東西。這方法，就是指導戰爭的戰略戰術。這過程，就是敵對的軍隊互相使用有利於己不利於敵的戰略戰術從事攻擊或防禦的一種特殊的社會活動形態。因此，戰爭的經驗是特殊的。一切參加戰爭的人們，必須脫出尋常習慣，而習慣於戰爭，方能爭取戰爭的勝利。

抗日的政治動員

（六六）如此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勝利的。抗日以前，沒有抗日的政治動員，這是中國的大缺陷，已經輸了敵人一著。抗

日以後，政治動員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說深入。人民的大多數，是從敵人的炮火和飛機炸彈那裏聽到消息的。這也是一種動員，但這是敵人替我們做的，不是我們自己做的。偏遠地區聽不到炮聲的人們，至今還是靜悄悄地在那裏過活。這種情形必須改變，不然，拼死活的戰爭就得不到勝利。決不可以再輸敵人一著，相反，要大大地發揮這一著去制勝敵人。這一著是關係絕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這一著實在是頭等重要。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要勝利，就要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然而一切這些，離不開動員老百姓。要勝利又忽視政治動員，叫做“南其轅而北其轍”，結果必然取消了勝利。

（六七）什麼是政治動員呢？首先是把戰爭的政治目的告訴軍隊和人民。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民都明白為什麼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麼關係。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必須把這個目的告訴一切軍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熱潮，使幾萬萬人齊心一致，貢獻一切給戰爭。其次，單單說明目的還不夠，還要說明達到此目的的步驟和政策，就是說，要有一個政治綱領。現在已經有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又有了一個《抗戰建國綱領》，應把它們普及於軍隊和人民，並動員所有的軍隊和人民實行起來。沒有一個明確的具體的政治綱領，是不能動員全軍全民

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樣去動員？靠口說，靠傳單佈告，靠報紙書冊，靠戲劇電影，靠學校，靠民眾團體，靠幹部人員。現在國民黨統治地區有的一些，滄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眾口味，神氣和民眾隔膜，必須切實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動員就夠了，抗日戰爭的政治動員是經常的。不是將政治綱領背誦給老百姓聽，這樣的背誦是沒有人聽的；要聯繫戰爭發展的情況，聯繫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戰爭的政治動員，變成經常的運動。這是一件絕大的事，戰爭首先要靠它取得勝利。

戰爭的目的

（六八）這裏不是說戰爭的政治目的，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前面已經說過了。這裏說的，是作為人類流血的政治的所謂戰爭，兩軍相殺的戰爭，它的根本目的是什麼。戰爭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

（消滅敵人，就是解除敵人的武裝，也就是所謂“剝奪敵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滅其肉體）。古代戰爭，用矛用盾：矛是進攻的，為了消滅敵人；盾是防禦的，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還是這二者的繼續。轟炸機、機關槍、遠射程炮、毒氣，是矛的發展；防空掩蔽部、鋼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發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結合為一的新式武器。進攻，是消滅敵人的主要手段，但防禦也是不能廢的。進攻，是直接為了消滅敵人的，同時也是為了保存自己，因為如不消滅敵人，

則自己將被消滅。防禦，是直接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時也是輔助進攻或準備轉入進攻的一種手段。退卻，屬於防禦一類，是防禦的繼續；而追擊，則是進攻的繼續。應該指出：戰爭目的中，消滅敵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為只有大量地消滅敵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為消滅敵人之主要手段的進攻是主要的，而作為消滅敵人之輔助手段和作為保存自己之一種手段的防禦，是第二位的。戰爭實際中，雖有許多時候以防禦為主，而在其餘時候以進攻為主，然而通戰爭的全體來看，進攻仍然是主要的。

（六九）怎樣解釋戰爭中提倡勇敢犧牲呢？豈非與“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價的，有時是極大的代價。部分的暫時的犧牲（不保存），為了全體的永久的保存。我們說，基本上為著消滅敵人的進攻手段中，同時也含了保存自己的作用，理由就在這裏。防禦必須同時有進攻，而不應是單純的防禦，也是這個道理。

（七〇）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這個戰爭的目的，就是戰爭的本質，就是一切戰爭行動的根據，從技術行動起，到戰略行動止，都是貫徹這個本質的。戰爭目的，是戰爭的基本原則，一切技術的、戰術的、戰役的、戰略的原理原則，一點也離不開它。射擊原則的“蔭蔽身體，發揚火力”是什麼意思呢？前者為了保存自己，後者為了消滅敵人。因為前者，於是利用地形地物，採取躍進運動，疏開隊形，種種方法都發生了。因為後者，於是

掃清射界，組織火網，種種方法也發生了。戰術上的突擊隊、鉗制隊、預備隊，第一種為了消滅敵人，第二種為了保存自己，第三種準備依情況使用於兩個目的——或者增援突擊隊，或者作為追擊隊，都是為了消滅敵人；或者增援鉗制隊，或者作為掩護隊，都是為了保存自己。照這樣，一切技術、戰術、戰役、戰略原則，一切技術、戰術、戰役、戰略行動，一點也離不開戰爭的目的，它普及於戰爭的全體，貫徹於戰爭的始終。

（七一）抗日戰爭的各級指導者，不能離開中日兩國之間各種互相對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導戰爭，也不能離開這個戰爭目的去指導戰爭。兩國之間各種互相對立的基本因素展開於戰爭的行動中，就變成互相為了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而鬥爭。我們的戰爭，在於力求每戰爭取不論大小的勝利，在於力求每戰解除敵人一部分武裝，損傷敵人一部分人馬器物。把這些部分地消滅敵人的成績積累起來，成為大的戰略勝利，達到最後驅敵出國，保衛祖國，建設新中國的政治目的。

防禦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

（七二）現在來研究抗日戰爭中的具體的戰略方針。我們已說過了，抗日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是的，這是完全對的。但這是一般的方針，還不是具體的方針。怎樣具體地進行持久戰呢？這就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我們的答復是：在第一和第二階段即敵之進攻和保守階段中，應該是戰略防禦中的戰役和戰鬥的進攻戰，戰略

持久中的戰役和戰鬥的速決戰，戰略內線中的戰役和戰鬥的外線作戰。在第三階段中，應該是戰略的反攻戰。

(七三) 由於日本是帝國主義的強國，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日本是採取戰略進攻方針的，我們則居於戰略防禦地位。日本企圖採取戰略的速決戰，我們應自覺地採取戰略的持久戰。日本用其戰鬥力頗強的幾十個師團的陸軍（目前已到了三十個師團）和一部分海軍，從陸海兩面包圍和封鎖中國，又用空軍轟炸中國。目前日本的陸軍已佔領從包頭到杭州的長陣線，海軍則到了福建廣東，形成了大範圍的外線作戰。我們則處於內線作戰地位。所有這些，都是由敵強我弱這個特點造成的。這是一方面的情形。

(七四) 然而在另一方面，則適得其反。日本雖強，但兵力不足。中國雖弱，但地大、人多、兵多。這裏就產生了兩個重要的結果。第一，敵以少兵臨大國，就只能佔領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由是，在其佔領區域，則空出了廣大地面無法佔領，這就給了中國游擊戰爭以廣大活動的地盤。在全國，即使敵能佔領廣州、武漢、蘭州之線及其附近的地區，但以外的地區是難於佔領的，這就給了中國以進行持久戰和爭取最後勝利的總後方和中樞根據地。第二，敵以少兵臨多兵，便處於多兵的包圍中。敵分路向我進攻，敵處戰略外線，我處戰略內線，敵是戰略進攻，我是戰略防禦，看起來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廣和兵多兩個長處，不作死守的陣地戰，採用靈活的運動戰，以幾個師對他一個

師，幾萬人對他一萬人，幾路對他一路，從戰場的外線，突然包圍其一路而攻擊之。於是敵之戰略作戰上的外線和進攻，在戰役和戰鬥的作戰上，就不得不變成內線和防禦。我之戰略作戰上的內線和防禦，在戰役和戰鬥的作戰上就變成了外線和進攻。對其一路如此，對其他路也是如此。以上兩點，都是從敵小我大這一特點發生的。又由於敵兵雖少，乃是強兵（武器和人員的教養程度），我兵雖多，乃是弱兵（也僅是武器和人員的教養程度，不是士氣），因此，在戰役和戰鬥的作戰上，我不但應以多兵打少兵，從外線打內線，還須採取速決戰的方針。為了實行速決，一般應不打駐止中之敵，而打運動中之敵。我預將大兵蔭蔽集結於敵必經通路之側，乘敵運動之際，突然前進，包圍而攻擊之，打他一個措手不及，迅速解決戰鬥。打得好，可能全部或大部或一部消滅他；打不好，也給他一個大的殺傷。一戰如此，他戰皆然。不說多了，每個月打得一個較大的勝仗，如像平型關台兒莊一類的，就能大大地沮喪敵人的精神，振起我軍的士氣，號召世界的聲援。這樣，我之戰略的持久戰，到戰場作戰就變成速決戰了。敵之戰略的速決戰，經過許多戰役和戰鬥的敗仗，就不得不改為持久戰。

（七五）上述這樣的戰役和戰鬥的作戰方針，一句話說完，就是：“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這對於我之戰略方針“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說來，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實現這樣的戰略方針之必要的方針。如果戰役和戰鬥方針也同樣是“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例如抗戰

初起時期之所為，那就完全不適合敵小我大、敵強我弱這兩種情況，那就決然達不到戰略目的，達不到總的持久戰，而將為敵人所擊敗。所以，我們歷來主張全國組成若干個大的野戰兵團，其兵力針對著敵人每個野戰兵團之兵力而二倍之、三倍之或四倍之，採用上述方針，與敵周旋於廣大戰場之上。這種方針，不但是正規戰爭用得著，游擊戰爭也得著，而且必須要用它。不但適用於戰爭的某一階段，而且適用於戰爭的全過程。戰略反攻階段，我之技術條件增強，以弱敵強這種情況即使完全沒有了，我仍用多兵從外線採取速決的進攻戰，就更能收大批俘獲的成效。例如我用兩個或三個或四個機械化的師對敵一個機械化的師，更能確定地消滅這個師。幾個大漢打一個大漢之容易打勝，這是常識中包含的真理。

（七六）如果我們堅決地採取了戰場作戰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就不但在戰場上改變著敵我之間的強弱優劣形勢，而且將逐漸地變化著總的形勢。在戰場上，因為我是進攻，敵是防禦；我是多兵處外線，敵是少兵處內線；我是速決，敵雖企圖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於是在敵人方面，強者就變成了弱者，優勢就變成了劣勢；我軍方面反之，弱者變成了強者，劣勢變成了優勢。在打了許多這樣的勝仗之後，總的敵我形勢便將引起變化。這就是說，集合了許多戰場作戰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的勝利以後，就逐漸地增強了自己，削弱了敵人，於是總的強弱優劣形勢，就不能不受其影響而發生變化。

到那時，配合著我們自己的其他條件，再配合著敵人內部的變動和國際上的有利形勢，就能使敵我總的形勢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優敵劣。那時，就是我們實行反攻驅敵出國的時機了。

（七七）戰爭是力量的競賽，但力量在戰爭過程中變化其原來的形態。在這裏，主觀的努力，多打勝仗，少犯錯誤，是決定的因素。客觀因素具備著這種變化的可能性，但實現這種可能性，就需要正確的方針和主觀的努力。這時候，主觀作用是決定的了。

主動性，靈活性，計劃性

（七八）上面說過的戰役和戰鬥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中心點在於一個進攻；外線是說的進攻的範圍，速決是說的進攻的時間，所以叫它做“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這是實行持久戰的最好的方針，也即是所謂運動戰的方針。但是這個方針實行起來，離不了主動性、靈活性和計劃性。我們現在就來研究這三個問題。

（七九）前面已說過了自覺的能動性，為什麼又說主動性呢？自覺的能動性，說的是自覺的活動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區別於物的特點，這種人的特點，特別強烈地表現於戰爭中，這些是前面說過了。這裏說的主動性，說的是軍隊行動的自由權，是用以區別於被迫處於不自由狀態的。行動自由是軍隊的命脈，失了這種自由，軍隊就接近於被打敗或被消滅。一個士兵被繳械，是這個士兵失了行動自由被迫處於被動地位的結果。一個軍隊

的戰敗，也是一樣。為此緣故，戰爭的雙方，都力爭主動，力避被動。我們提出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以及為了實現這種進攻戰的靈活性、計劃性，可以說都是為了爭取主動權，以便逼敵處於被動地位，達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之目的。但主動或被動是和戰爭力量的優勢或劣勢分不開的。因而也是和主觀指導的正確或錯誤分不開的。此外，也還有利用敵人的錯覺和不意來爭取自己主動和逼敵處於被動的情形。下面就來分析這幾點。

(八〇) 主動是和戰爭力量的優勢不能分離的，而被動則和戰爭力量的劣勢分不開。戰爭力量的優勢或劣勢，是主動或被動的客觀基礎。戰略的主動地位，自然以戰略的進攻戰為較能掌握和發揮，然而貫徹始終和普及各地的主動地位，即絕對的主動權，只有以絕對優勢對絕對劣勢才有可能。一個身體壯健者和一個重病患者角鬥，前者便有絕對的主動權。如果日本沒有許多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它能一下出幾百萬至一千萬大兵，財源比現在多過幾倍，又沒有民眾和外國的敵對，又不實行野蠻政策招致中國人民拼死命反抗，那它便能保持一種絕對的優勢，它便有一種貫徹始終和普及各地的絕對的主動權。但在歷史上，這類絕對優勢的事情，在戰爭和戰役的結局是存在的，戰爭和戰役的開頭則少見。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屈服的前夜，這時協約國變成了絕對優勢，德國則變成了絕對劣勢，結果德國失敗，協約國獲勝，這是戰爭結局存在著絕對的優勢和劣勢之例。又如台兒莊勝利的前夜，這時當地孤立的日軍經過

苦戰之後，已處於絕對的劣勢，我軍則造成了絕對的優勢，結果敵敗我勝，這是戰役結局存在著絕對的優勢和劣勢之例。戰爭或戰役也有以相對的優劣或平衡狀態而結局的，那時，在戰爭則出現妥協，在戰役則出現對峙。但一般是以絕對的優劣而分勝負居多數。所有這些，都是戰爭或戰役的結局，而非戰爭或戰役的開頭。中日戰爭的最後結局，可以預斷，日本將以絕對劣勢而失敗，中國將以絕對優勢而獲勝；但是在目前，則雙方的優劣都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日本因其具有強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這個有利因素，對於我們弱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佔了優勢，因而造成了它的主動權的基礎。但是因為它的軍力等等數量不多，又有其他許多不利因素，它的優勢便為它自己的矛盾所減殺。及到中國，又碰到了中國的地大、人多、兵多和堅強的民族抗戰，它的優勢再為之減殺。於是在總的方面，它的地位就變成一種相對的優勢，因而其主動權的發揮和維持就受了限制，也成了相對的東西。中國方面，雖然在力量的強度上是劣勢，因此造成了戰略上的某種被動姿態，但是在地理、人口和兵員的數量上，並且又在人民和軍隊的敵愾心和士氣上，卻處於優勢，這種優勢再加上其他的有利因素，便減殺了自己軍力、經濟力等的劣勢的程度，使之變為戰略上的相對的劣勢。因而也減少了被動的程度，僅處於戰略上的相對的被動地位。然而被動總是不利的，必須力求脫離它。軍事上的辦法，就是堅決地實行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和發動敵後的游擊戰爭，

在戰役的運動戰和游擊戰中取得許多局部的壓倒敵人的優勢和主動地位。通過這樣許多戰役的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就能逐漸地造成戰略的優勢和戰略的主動地位，戰略的劣勢和被動地位就能脫出了。這就是主動和被動之間、優勢和劣勢之間的相互關係。

(八一)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主動或被動和主觀指導之間的關係。如上所述，我之相對的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地位，是能夠脫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們許多的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去剝奪敵人的許多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把他拋入劣勢和被動。把這些局部的東西集合起來，就成了我們的戰略優勢和戰略主動，敵人的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這樣的轉變，依靠主觀上的正確指導。為什麼呢？我要優勢和主動，敵人也要這個，從這點上看，戰爭就是兩軍指揮員以軍力財力等項物質基礎作地盤，互爭優勢和主動的主觀能力的競賽。競賽結果，有勝有敗，除了客觀物質條件的比較外，勝者必由於主觀指揮的正確，敗者必由於主觀指揮的錯誤。我們承認戰爭現象是較之任何別的社會現象更難捉摸，更少確實性，即更帶所謂“蓋然性”。但戰爭不是神物，仍是世間的一種必然運動，因此，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仍是科學的真理。錯誤由於對彼己的無知，戰爭的特性也使人們在許多的場合無法全知彼己，因此產生了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的不確實性，產生了錯誤和失敗。然而不管怎樣的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知其大略，知其要點，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種偵察手段，繼之以指

揮員的聰明的推論和判斷，減少錯誤，實現一般的正確指導，是做得到的。我們有了這個“一般地正確的指導”做武器，就能多打勝仗，就能變劣勢為優勢，變被動為主動。這是主動或被動和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之間的關係。

（八二）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影響到優勢劣勢和主動被動的變化，觀於強大之軍打敗仗、弱小之軍打勝仗的歷史事實而益信。中外歷史上這類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國如晉楚城濮之戰，楚漢成皋之戰，韓信破趙之戰，新漢昆陽之戰，袁曹官渡之戰，吳魏赤壁之戰，吳蜀彝陵之戰，秦晉淝水之戰等等，外國如拿破崙的多數戰役，十月革命後的蘇聯內戰，都是以少擊眾，以劣勢對優勢而獲勝。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優勢和主動，向著敵人局部的劣勢和被動，一戰而勝，再及其餘，各個擊破，全域因而轉成了優勢，轉成了主動。在原佔優勢和主動之敵則反是；由於其主觀錯誤和內部矛盾，可以將其很好的或較好的優勢和主動地位，完全喪失，化為敗軍之將，亡國之君。由此可知，戰爭力量的優劣本身，固然是決定主動或被動的客觀基礎，但還不是主動或被動的現實事物，必待經過鬥爭，經過主觀能力的競賽，方才出現事實上的主動或被動。在鬥爭中，由於主觀指導的正確或錯誤，可以化劣勢為優勢，化被動為主動；也可以化優勢為劣勢，化主動為被動。一切統治王朝打不贏革命軍，可見單是某種優勢還沒有確定主動地位，更沒有確定最後勝利。主動和勝利，是可以根據真實的情況，經過主

觀能力的活躍，取得一定的條件，而由劣勢和被動者從優勢和主動者手裏奪取過來的。

(八三) 錯覺和不意，可以喪失優勢和主動。因而有計劃地造成敵人的錯覺，給以不意的攻擊，是造成優勢和奪取主動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錯覺是什麼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錯覺之一例。“聲東擊西”，是造成敵人錯覺之一法。在優越的民眾條件具備，足以封鎖消息時，採用各種欺騙敵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敵於判斷錯誤和行動錯誤的苦境，因而喪失其優勢和主動。“兵不厭詐”，就是指的這件事情。什麼是**不意？就是無準備。優勢而無準備，不是真正的優勢，也沒有主動。**懂得這一點，劣勢而有準備之軍，常可對敵舉行不意的攻勢，把優勢者打敗。我們說運動之敵好打，就是因為敵在不意即無準備中。這兩件事——造成敵人的錯覺和出以不意的攻擊，即是以戰爭的不確實性給予敵人，而給自己以儘可能大的確實性，用以爭取我之優勢和主動，爭取我之勝利。要做到這些，先決條件是優越的民眾組織。因此，發動所有一切反對敵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裝起來，對敵進行廣泛的襲擊，同時即用以封鎖消息，掩護我軍，使敵無從知道我軍將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去攻擊他，造成他的錯覺和不意的客觀基礎，是非常之重要的。過去土地革命戰爭時代的中國紅軍，以弱小的軍力而常打勝仗，得力於組織起來和武裝起來了的民眾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戰爭照規矩應比土地革命戰爭更能獲得廣大民眾的援助；可是因為歷史的錯誤，民眾

是散的，不但倉卒難為我用，且時為敵人所利用。只有堅決地廣泛地發動全體的民眾，方能在戰爭的一切需要上給以無窮無盡的供給。在這個給敵以錯覺和給敵以不意以便戰而勝之的戰爭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我們要把敵人的眼睛和耳朵儘可能地封住，使他們變成瞎子和聾子，要把他們的指揮員的心儘可能地弄得混亂些，使他們變成瘋子，用以爭取自己的勝利。所有這些，也都是主動或被動和主觀指導之間的相互關係。戰勝日本是少不了這種主觀指導的。

（八四）大抵日本在其進攻階段中，因其軍力之強和利用我之主觀上的歷史錯誤和現時錯誤，它是一般地處於主動地位的。但是這種主動，已隨其本身帶著許多不利因素及其在戰爭中也犯了些主觀錯誤（詳論見後），與乎我方具備著許多有利因素，而開始了部分的減弱。敵之在台兒莊失敗和山西困處，就是顯證。我在敵後游擊戰爭的廣大發展，則使其佔領地的守軍完全處於被動地位。雖則敵人此時還在其主動的戰略進攻中，但他的主動將隨其戰略進攻的停止而結束。敵之兵力不足，沒有可能作無限制的進攻，這是他不能繼續保持主動地位的第一個根源。我之戰役的進攻戰，在敵後的游擊戰爭及其他條件，這是他不能不停止進攻於一定限度和不能繼續保持主動地位的第二個根源。蘇聯的存在及其他國際變化，是第三個根源。由此可見，敵人的主動地位是有限制的，也是能夠破壞的。中國如能在作戰方法上堅

持主力軍的戰役和戰鬥的進攻戰，猛烈地發展敵後的游擊戰爭，並從政治上大大地發動民眾，我之戰略主動地位便能逐漸樹立起來。

（八五）現在來說靈活性。靈活性是什麼呢？就是具體地實現主動性於作戰中的東西，就是靈活地使用兵力。靈活地使用兵力這件事，是戰爭指揮的中心任務，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戰爭的事業，除了組織和教育軍隊，組織和教育人民等項之外，就是使用軍隊於戰鬥，而一切都是為了戰鬥的勝利。組織軍隊等等固然困難，但使用軍隊則更加困難，特別是在以弱敵強的情況之中。做這件事需要極大的主觀能力，需要克服戰爭特性中的紛亂、黑暗和不確實性，而從其中找出條理、光明和確實性來，方能實現指揮上的靈活性。

（八六）抗日戰爭戰場作戰的基本方針，是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執行這個方針，有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進和合擊、攻擊和防禦、突擊和鉗制、包圍和迂迴、前進和後退種種的戰術或方法。懂得這些戰術是容易的，靈活地使用和變換這些戰術，就不容易了。這裏有時機、地點、部隊三個關節。不得其時，不得其地，不得於部隊之情況，都將不能取勝。例如進攻某一運動中之敵，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給了敵人以防防條件；打遲了，敵已集中駐止，變為啃硬骨頭。這就是時機問題。突擊點選在左翼，恰當敵之弱點，容易取勝；選在右翼，碰在敵人的釘子上，不能奏效。這就是地點問題。以我之某一部隊執行某種任務，容易取勝；以另一部隊執行同

樣任務，難於收效。這就是部隊情況問題。不但使用戰術，還須變換戰術。攻擊變為防禦，防禦變為攻擊，前進變為後退，後退變為前進，鉗制隊變為突擊隊，突擊隊變為鉗制隊，以及包圍迂迴等等之互相變換，依據敵我部隊、敵我地形的情況，及時地恰當地給以變換，是靈活性的指揮之重要任務。戰鬥指揮如此，戰役和戰略指揮也是如此。

（八七）古人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個“妙”，我們叫做靈活性，這是聰明的指揮員的出產品。靈活不是妄動，妄動是應該拒絕的。靈活，是聰明的指揮員，基於客觀情況，“審時度勢”（這個勢，包括敵勢、我勢、地勢等項）而採取及時的和恰當的處置方法的一種才能，即是所謂“運用之妙”。基於這種運用之妙，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就能較多地取得勝利，就能轉變敵我優劣形勢，就能實現我對於敵的主動權，就能壓倒敵人而擊破之，而最後勝利就屬於我們了。

（八八）現在來說計劃性。由於戰爭所特有的不確實性，實現計劃性於戰爭，較之實現計劃性於別的事業，是要困難得多的。然而，“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沒有事先的計劃和準備，就不能獲得戰爭的勝利。戰爭沒有絕對的確實性，但不是沒有某種程度的相對的確實性。我之一方是比較地確實的。敵之一方很不確實，但也有徵兆可尋，有端倪可察，有前後現象可供思索。這就構成了所謂某種程度的相對的確實性，戰爭的計劃性就有了客觀基礎。近代技術（有線電、無線電、飛機、

汽車、鐵道、輪船等)的發達，又使戰爭的計劃性增大了可能。但由於戰爭只有程度頗低和時間頗暫的確實性，戰爭的計劃性就很難完全和固定，它隨戰爭的運動（或流動，或推移）而運動，且依戰爭範圍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戰術計劃，例如小兵團和小部隊的攻擊或防禦計劃，常須一日數變。戰役計劃，即大兵團的行動計劃，大體能終戰役之局，但在該戰役內，部分的改變是常有的，全部的改變也間或有之。戰略計劃，是基於戰爭雙方總的情況而來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戰略階段內適用，戰爭向著新的階段推移，戰略計劃便須改變。戰術、戰役和戰略計劃之各依其範圍和情況而確定而改變，是戰爭指揮的重要關節，也即是戰爭靈活性的具體的實施，也即是實際的運用之妙。抗日戰爭的各級指揮員，對此應當加以注意。

（八九）有些人，基於戰爭的流動性，就從根本上否認戰爭計劃或戰爭方針之相對的固定性，說這樣的計劃或方針是“機械的”東西。這種意見是錯誤的。如上條所述，我們完全承認：由於戰爭情況之只有相對的確實性和戰爭是迅速地向前流動的（或運動的，推移的），戰爭的計劃或方針，也只應給以相對的固定性，必須根據情況的變化和戰爭的流動而適時地加以更換或修改，不這樣做，我們就變成機械主義者。然而決不能否認一定時間內的相對地固定的戰爭計劃或方針；否認了這點，就否認了一切，連戰爭本身，連說話的人，都否認了。由於戰爭的情況和行動都有其相對的固定性，因而應之

而生的戰爭計劃或方針，也就必須拿相對的固定性賦予它。例如，由於華北戰爭的情況和八路軍分散作戰的行動有其在一定階段內的固定性，因而在這一定階段內賦予相對的固定性於八路軍的“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種戰略的作戰方針，是完全必要的。戰役方針，較之上述戰略方針適用的時間要短促些，戰術方針更加短促，然而都有其一定時間的固定性。否認了這點，戰爭就無從著手，成為毫無定見，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這也是、那也是的戰爭相對主義了。沒有人否認，就是在某一一定時間內適用的方針，它也是在流動的，沒有這種流動，就不會有這一方針的廢止和另一方針的採用。然而這種流動是有限制的，即流動於執行這一方針的各種不同的戰爭行動的範圍中，而不是這一方針的根本性質的流動，即是說，是數的流動，不是質的流動。這種根本性質，在一定時間內是決不流動的，我們所謂一定時間內的相對的固定性，就是指的這一點。在絕對流動的整個戰爭長河中有其各個特定階段上的相對的固定性——這就是我們對於戰爭計劃或戰爭方針的根本性質的意見。

（九〇）在說過了戰略上的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和戰役戰鬥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又說過了主動性、靈活性和計劃性之後，我們可以總起來說幾句。抗日戰爭應該是有計劃的。戰爭計劃即戰略戰術的具體運用，要帶靈活性，使之能適應戰爭的情況。要處處照顧化劣勢為優勢，化被動為主動，以便改變敵我之間的形勢。

而一切這些，都表現於戰役和戰鬥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同時也就表現於戰略上的內線的持久的防禦戰之中。

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戰

(九一) 作為戰爭內容的戰略內線、戰略持久、戰略防禦中的戰役和戰鬥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在戰爭形式上就表現為運動戰。運動戰，就是正規兵團在長的戰線和大的戰區上面，從事於戰役和戰鬥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的形式。同時，也把為了便利於執行這種進攻戰而在某些必要時機執行著的所謂“運動性的防禦”包括在內，並且也把起輔助作用的陣地攻擊和陣地防禦包括在內。它的特點是：正規兵團，戰役和戰鬥的優勢兵力，進攻性和流動性。

(九二) 中國版圖廣大，兵員眾多，但軍隊的技術和教養不足；敵人則兵力不足，但技術和教養比較優良。在此種情形下，無疑地應以進攻的運動戰為主要的作戰形式，而以其他形式輔助之，組成整個的運動戰。在這裏，要反對所謂“有退無進”的逃跑主義，同時也要反對所謂“有進無退”的拼命主義。

(九三) 運動戰的特點之一，是其流動性，不但許可而且要求野戰軍的大踏步的前進和後退。然而，這和韓復榘式的逃跑主義是沒有相同之點的。戰爭的基本要求是：消滅敵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於消滅敵人；而消滅敵人，又是保存自己的

最有效的手段。因此，運動戰決不能被韓復榘一類人所藉口，決不是只有向後的運動，沒有向前的運動；這樣的“運動”，否定了運動戰的基本的進攻性，實行的結果，中國雖大，也是要被“運動”掉的。

（九四）然而另一種思想也是不對的，即所謂有進無退的拼命主義。我們主張以戰役和戰鬥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為內容的運動戰，其中包括了輔助作用的陣地戰，又包括了“運動性的防禦”和退卻，沒有這些，運動戰便不能充分地執行。拼命主義是軍事上的近視眼，其根源常是懼怕喪失土地。拼命主義者不知道運動戰的特點之一是其流動性，不但許可而且要求野戰軍的大踏步的進退。積極方面，為了陷敵於不利而利於我之作戰，常常要求敵人在運動中，並要求有利於我之許多條件，例如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敵情、能封鎖消息的居民、敵人的疲勞和不意等。這就要求敵人的前進，雖暫時地喪失部分土地而不惜。因為暫時地部分地喪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復土地的代價。消極方面，凡被迫處於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軍力的保存時，應該勇敢地退卻，以便保存軍力，在新的時機中再行打擊敵人。拼命主義者不知此理，明明已處於確定了的不利情況，還要爭一城一地的得失，結果不但城和地俱失，軍力也不能保存。我們歷來主張“誘敵深入”，就是因為這是戰略防禦中弱軍對強軍作戰的最有效的軍事政策。

（九五）抗日戰爭的作戰形式中，主要的是運動戰，其次就要算游擊戰了。我們說，整個戰爭中，運動戰是

主要的，游擊戰是輔助的，說的是解決戰爭的命運，主要是依靠正規戰，尤其是其中的運動戰，游擊戰不能擔負這種解決戰爭命運的主要的責任。但這不是說：游擊戰在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不重要。游擊戰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僅僅次於運動戰，因為沒有游擊戰的輔助，也就不能戰勝敵人。這樣說，是包括了游擊戰向運動戰發展這一個戰略任務在內的。長期的殘酷的戰爭中間，游擊戰不停止於原來地位，它將把自己提高到運動戰。這樣，游擊戰的戰略作用就有兩方面：一是輔助正規戰，一是把自己也變為正規戰。至於就游擊戰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空前廣大和空前持久的意義說來，它的戰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輕視的了。因此，在中國，游擊戰的本身，不只有戰術問題，還有它的特殊的戰略問題。這個問題，我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裏面已經說到了。前面說過，抗日戰爭三個戰略階段的作戰形式，第一階段，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和陣地戰是輔助的。第二階段，則游擊戰將升到主要地位，而以運動戰和陣地戰輔助之。第三階段，運動戰再升為主要形式，而輔之以陣地戰和游擊戰。但這個第三階段的運動戰，已不全是由原來的正規軍負擔，而將由原來的游擊軍從游擊戰提高到運動戰去擔負其一部分，也許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從三個階段來看，中國抗日戰爭中的游擊戰，決不是可有可無的。它將在人類戰爭史上演出空前偉大的一幕。為此緣故，在全國的數百萬正規軍中間，至少指定數十萬人，分散於所有一切敵佔地區，發動和配合

民眾武裝，從事游擊戰爭，是完全必要的。被指定的軍隊，要自覺地負擔這種神聖任務，不要以為少打大仗，一時顯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資格，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游擊戰爭沒有正規戰爭那樣迅速的成效和顯赫的名聲，但是“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在長期和殘酷的戰爭中，游擊戰爭將表現其很大的威力，實在是非同小可的事業。並且正規軍分散作游擊戰，集合起來又可作運動戰，八路軍就是這樣做的。八路軍的方針是：“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反對這個方針的人們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九六）防禦的和攻擊的陣地戰，在中國今天的技術條件下，一般都不能執行，這也就是我們表現弱的地方。再則敵人又利用中國土地廣大一點，迴避我們的陣地設施。因此陣地戰就不能用為重要手段，更不待說用為主要手段。然而在戰爭的第一第二兩階段中，包括於運動戰範圍，而在戰役作戰上起其輔助作用的局部的陣地戰，是可能的和必要的。為著節節抵抗以求消耗敵人和爭取餘裕時間之目的，而採取半陣地性的所謂“運動性的防禦”，更是屬於運動戰的必要部分。中國須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戰略反攻階段中能夠充分地執行陣地攻擊的任務。戰略反攻階段，無疑地將提高陣地戰的地位，因為那時敵人將堅守陣地，沒有我之有力的陣地攻擊以配合運動戰，將不能達到收復失地之目的。雖然如此，第三階段中，我們仍須力爭以運動戰為戰爭的主要形式。

因為戰爭的領導藝術和人的活躍性，臨到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期以後西歐地區那樣的陣地戰，就死了一大半。然而在廣大版圖的中國境內作戰，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方面又還保存著技術貧弱這種情況，“把戰爭從壕溝裏解放”的事，就自然出現。就在第三階段，中國技術條件雖已增進，但仍不見得能夠超過敵人，這樣也就被逼著非努力講求高度的運動戰，不能達到最後勝利之目的。這樣，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國將不會以陣地戰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運動戰和游擊戰。在這些戰爭形式中，戰爭的領導藝術和人的活躍性能夠得到充分地發揮的機會，這又是我們不幸中的幸事啊！

消耗戰，殲滅戰

（九七）前頭說過，戰爭本質即戰爭目的，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然而達此目的的戰爭形式，有運動戰、陣地戰、游擊戰三種，實現時的效果就有程度的不同，因而一般地有所謂消耗戰和殲滅戰之別。

（九八）我們首先可以說，抗日戰爭是消耗戰，同時又是殲滅戰。為什麼？敵之強的因素尚在發揮，戰略上的優勢和主動依然存在，沒有戰役和戰鬥的殲滅戰，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滅殺其強的因素，破壞其優勢和主動。我之弱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戰略上的劣勢和被動還未脫離，為了爭取時間，加強國內國際條件，改變自己的不利狀態，沒有戰役和戰鬥的殲滅戰，也不能成功。因此，戰役的殲滅戰是達到戰略的消耗戰之目的的手段。

在這點上說，殲滅戰就是消耗戰。中國之能夠進行持久戰，用殲滅達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

（九九）但達到戰略消耗目的的，還有戰役的消耗戰。大抵運動戰是執行殲滅任務的，陣地戰是執行消耗任務的，游擊戰是執行消耗任務同時又執行殲滅任務的，三者互有區別。在這點上說，殲滅戰不同於消耗戰。戰役的消耗戰，是輔助的，但也是持久作戰所需要的。

（一〇〇）從理論上和需要上說來，中國在防禦階段中，應該利用運動戰之主要的殲滅性，游擊戰之部分的殲滅性，加上輔助性質的陣地戰之主要的消耗性和游擊戰之部分的消耗性，用以達到大量消耗敵人的戰略目的。在相持階段中，繼續利用游擊戰和運動戰的殲滅性和消耗性，再行大量地消耗敵人。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使戰局持久，逐漸地轉變敵我形勢，準備反攻的條件。戰略反攻時，繼續用殲滅達到消耗，以便最後地驅逐敵人。

（一〇一）但是在事實上，十個月的經驗是，許多甚至多數的運動戰戰役，打成了消耗戰；游擊戰之應有的殲滅作用，在某些地區，也還未提到應有的程度。這種情況的好處是，無論如何我們總算消耗了敵人，對於持久作戰和最後勝利有其意義，我們的血不是白流的。然而缺點是：一則消耗敵人的不足；二則我們自己不免消耗的較多，繳獲的較少。雖然應該承認這種情況的客觀原因，即敵我技術和兵員教養程度的不同，然而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無論如何也應該提倡主力軍在一切有利場合努力地執行殲滅戰。游擊隊雖然為了執行許多具體

任務，例如破壞和擾亂等，不能不進行單純的消耗戰，然而仍須提倡並努力實行在戰役和戰鬥之一切有利場合的殲滅性的作戰，以達既能大量消耗敵人又能大量補充自己之目的。

(一〇二) 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之所謂外線，所謂速決，所謂進攻，與乎運動戰之所謂運動，在戰鬥形式上，主要地就是採用包圍和迂迴戰術，因而便須集中優勢兵力。所以，集中兵力，採用包圍迂迴戰術，是實施運動戰即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之必要條件。然而一切這些，都是為著殲滅敵人之目的。

(一〇三) 日本軍隊的長處，不但在其武器，還在其官兵的教養——其組織性，其因過去沒有打過敗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對天皇和對鬼神的迷信，其驕慢自尊，其對中國人的輕視等等特點；這是日本軍閥多年的武斷教育和日本的民族習慣造成的。我軍對之殺傷甚多、俘虜甚少的現象，主要原因在此。這一點，過去許多人是估計不足的。這種東西的破壞，需要一個長的過程。首先需要我們重視這一特點，然後耐心地有計劃地從政治上、國際宣傳上、日本人民運動上多方面地向著這一點進行工作；而軍事上的殲滅戰，也是方法之一。在這裏，悲觀主義者可以據之引向亡國論，消極的軍事家又可以據之反對殲滅戰。我們則相反，我們認為日本軍隊的這種長處是可以破壞的，並且已在開始破壞中。破壞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爭取。對於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瞭解和順導他們的這種自尊心，從寬待俘虜

的方法，引導他們瞭解日本統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義。另一方面，則是在他們面前表示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頑強的戰鬥力，這就是給以殲滅戰的打擊。在作戰上講，十個月的經驗證明殲滅是可能的，平型關、台兒莊等戰役就是明證。日本軍心已在開始動搖，士兵不瞭解戰爭目的，陷於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的包圍中，衝鋒的勇氣遠弱於中國兵等等，都是有利於我之進行殲滅戰的客觀的條件，這些條件並將隨著戰爭之持久而日益發展起來。在以殲滅戰破壞敵軍的氣焰這一點上講，殲滅又是縮短戰爭過程提早解放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的條件之一。世界上只有貓和貓做朋友的事，我沒有貓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一〇四) 另一方面，應該承認在技術和兵員教養的程度上，現時我們不及敵人。因而最高限度的殲滅，例如全部或大部俘獲的事，在許多場合特別是在平原地帶的戰鬥中，是困難的。速勝論者在這點上面的過分要求，也屬不對。抗日戰爭的正確要求應該是：儘可能的殲滅戰。在一切有利的場合，每戰集中優勢兵力，採用包圍迂迴戰術——不能包圍其全部也包圍其一部，不能俘獲所包圍之全部也俘獲所包圍之一部，不能俘獲所包圍之一部也大量殺傷所包圍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於執行殲滅戰的場合，則執行消耗戰。對於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則；對於後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則。在戰役的指揮關係上，對於前者，用集中指揮的原則；對於後者，用分散指揮的原則。這些，就是抗日戰爭戰場作戰的基本方針。

乘敵之隙的可能性

(一〇五) 關於敵之可勝，就是在敵人的指揮方面也有其基礎。自古無不犯錯誤的將軍，敵人之有岔子可尋，正如我們自己也難免出岔子，乘敵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從戰略和戰役上說來，敵人在十個月侵略戰爭中，已經犯了許多錯誤。計其大者有五。一是逐漸增加兵力。這是由於敵人對中國估計不足而來的，也有他自己兵力不足的原因。敵人一向看不起我們，東四省得了便宜之後，加之以冀東、察北的佔領，這些都算作敵人的戰略偵察。他們得來的結論是：一盤散沙。據此以為中國不值一打，而定出所謂“速決”的計劃，少少出點兵力，企圖嚇潰我們。十個月來，中國這樣大的團結和這樣大的抵抗力，他們是沒有料到的，他們把中國已處於進步時代，中國已存在著先進的黨派、先進的軍隊和先進的人民這一點忘掉了。及至不行，就逐漸增兵，由十幾個師團一次又一次地增至三十個。再要前進，非再增不可。但由於同蘇聯對立，又由於人財先天不足，所以日本的最大的出兵數和最後的進攻點都不得受一定的限制。二是沒有主攻方向。台兒莊戰役以前，敵在華中、華北大體上是平分兵力的，兩方內部又各自平分。例如華北，在津浦、平漢、同蒲三路平分兵力，每路傷亡了一些，佔領地駐守了一些，再前進就沒有兵了。台兒莊敗仗後，總結了教訓，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這個錯誤算是暫時地改了一下。三是沒有戰略協同。敵之華中、華北兩集團中，

每一集團內部是大體協同的，但兩集團間則很不協同。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時，北段不動；北段打台兒莊時，南段不動。兩處都觸了霉頭之後，於是陸軍大臣來巡視了，參謀總長來指揮了，算是暫時地協調了一下。日本地主資產階級和軍閥內部存在著頗為嚴重的矛盾，這種矛盾正在向前發展著，戰爭的不協同是其具體表現之一。四是失去戰略時機。這點顯著地表現在南京、太原兩地佔領後的停頓，主要的是因為兵力不足，沒有戰略追擊隊。五是包圍多殲減少。台兒莊戰役以前，上海、南京、滄州、保定、南口、忻口、臨汾諸役，擊破者多，俘獲者少，表現其指揮的笨拙。這五個——逐漸增加兵力，沒有主攻方向，沒有戰略協同，失去時機，包圍多殲減少，是台兒莊戰役以前日本指揮的不行之點。台兒莊戰役以後，雖已改了一些，然根據其兵力不足和內部矛盾諸因素，求不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且得之於此者，又失之於彼。例如，將華北兵力集中於徐州，華北佔領地就出了大空隙，給予游擊戰爭以放手發展的機會。以上是敵人自己弄錯，不是我們使之錯的。我們方面，尚可有意地製造敵之錯誤，即用自己聰明而有效的動作，在有組織的民眾掩護之下，造成敵人錯覺，調動敵人就我範圍，例如聲東擊西之類，這件事的可能性前面已經說過了。所有這些，都說明：我之戰爭勝利又可在敵之指揮上面找到某種根源。雖然我們不應把這點作為我之戰略計劃的重要基礎，相反，我之計劃寧可放在敵人少犯錯誤的假定上，才是可靠的做法。而且我乘敵隙，敵也可以乘我之隙，少授敵以可

尋之隙，又是我們指揮方面的任務。然而敵之指揮錯誤，是事實上已經存在過，並且還要發生的，又可因我之努力製造出來的，都足供我之利用，抗日將軍們應該極力地捉住它。敵人的戰略戰役指揮許多不行，但其戰鬥指揮，即部隊戰術和小兵團戰術，卻頗有高明之處，這一點我們應該向他學習。

抗日戰爭中的決戰問題

(一〇六) 抗日戰爭中的決戰問題應分為三類：一切有把握的戰役和戰鬥應堅決地進行決戰，一切無把握的戰役和戰鬥應避免決戰，賭國家命運的戰略決戰應根本避免。抗日戰爭不同於其他許多戰爭的特點，又表現在這個決戰問題上。在第一第二階段，敵強我弱，敵之要求在於我集中主力與之決戰。我之要求則相反，在選擇有利條件，集中優勢兵力，與之作有把握的戰役和戰鬥上的決戰，例如平型關、台兒莊以及許多的其他戰鬥；而避免在不利條件下的無把握的決戰，例如彰德等地戰役所採的方針。拼國家命運的戰略的決戰則根本不幹，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這樣就破壞了敵之“速決”計劃，不得不跟了我們幹持久戰。這種方針，在領土狹小的國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後的了的國家也難做到。我們是大國，又處進步時代，這點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避免了戰略的決戰，“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雖然喪失若干土地，還有廣大的迴旋餘地，可以促進並等候國內的進步、國際的增援和敵人的內潰，這是抗日戰爭的

上策。急性病的速勝論者熬不過持久戰的艱難路程，企圖速勝，一到形勢稍為好轉，就吹起了戰略決戰的聲浪，如果照了幹去，整個的抗戰要吃大虧，持久戰為之葬送，恰恰中了敵人的毒計，實在是下策。不決戰就須放棄土地，這是沒有疑問的，在無可避免的情況下（也僅僅是在這種情況下），只好勇敢地放棄。情況到了這種時候，絲毫不應留戀，這是以土地換時間的正確的政策。歷史上，俄國以避免決戰，執行了勇敢的退卻，戰勝了威震一時的拿破崙。中國現在也應這樣幹。

（一〇七）不怕人家罵“不抵抗”嗎？不怕的。根本不戰，與敵妥協，這是不抵抗主義，不但應該罵，而且完全不許可的。堅決抗戰，但為避開敵人毒計，不使我軍主力喪於敵人一擊之下，影響到抗戰的繼續，一句話，避免亡國，是完全必需的。在這上面發生懷疑，是戰爭問題上的近視眼，結果一定和亡國論者走到一夥去。我們曾經批評了所謂“有進無退”的拼命主義，就是因為這種拼命主義如果成為一般的風氣，其結果就有使抗戰不能繼續，最後引向亡國的危險。

（一〇八）我們主張一切有利條件下的決戰，不論是戰鬥的和大小戰役的，在這上面不容許任何的消極。給敵以殲滅和給敵以消耗，只有這種決戰才能達到目的，每個抗日軍人均須堅決地去做。為此目的，部分的相當大量的犧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犧牲的觀點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觀點，必須給以堅決的反對。李服膺、韓復榘等逃跑主義者的被殺，是殺得對的。在戰爭中提倡勇

敢犧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動作，是在正確的作戰計劃下絕對必要的東西，是同持久戰和最後勝利不能分離的。我們曾經嚴厲地指斥了所謂“有退無進”的逃跑主義，擁護嚴格紀律的執行，就是因為只有這種在正確計劃下的英勇決戰，才能戰勝強敵；而逃跑主義，則是亡國論的直接支持者。

（一〇九）英勇戰鬥於前，又放棄土地於後，不是自相矛盾嗎？這些英勇戰鬥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嗎？這是非常不妥當的發問。吃飯於前，又拉屎於後，不是白吃了嗎？睡覺於前，又起床於後，不是白睡了嗎？可不可以這樣提出問題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飯就一直吃下去，睡覺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戰鬥就一直打到鴨綠江，這是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幻想，在實際生活裏是不存在的。誰人不知，為爭取時間和準備反攻而流血戰鬥，某些土地雖仍不免於放棄，時間卻爭取了，給敵以殲滅和給敵以消耗的目的卻達到了，自己的戰鬥經驗卻取得了，沒有起來的人民卻起來了，國際地位卻增長了。這種血是白流的嗎？一點也不是白流的。放棄土地是為了保存軍力，也正是為了保存土地；因為如不在不利條件下放棄部分的土地，盲目地舉行絕無把握的決戰，結果喪失軍力之後，必隨之以喪失全部的土地，更說不到什麼恢復失地了。資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錢，全部破產之後，就不算什麼資本家。賭漢也要賭本，孤注一擲，不幸不中，就無從再賭。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徑情直遂的，戰爭也是一樣，只有形式主義者想不通這個道理。

(一一〇) 我想，即在戰略反攻階段的決戰亦然。那時雖然敵處劣勢，我處優勢，然而仍適用“執行有利決戰，避免不利決戰”的原則，直至打到鴨綠江邊，都是如此。這樣，我可始終立於主動，一切敵人的“挑戰書”，旁人的“激將法”，都應束之高閣，置之不理，絲毫不為其所動。抗日將軍們要有這樣的堅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將軍。那些“一觸即跳”的人們，是不足以語此的。第一階段我處於某種程度的戰略被動，然在一切戰役上也應是主動的，爾後任何階段都應是主動。我們是持久論和最後勝利論者，不是賭漢們那樣的孤注一擲論者。

兵民是勝利之本

(一一一) 日本帝國主義處在革命的中國面前，是決不放鬆其進攻和鎮壓的，它的帝國主義本質規定了這一點。中國不抵抗，日本就不費一彈安然佔領中國，東四省的喪失，就是前例。中國若抵抗，日本就向著這種抵抗力壓迫，直至它的壓力無法超過中國的抵抗力才停止，這是必然的規律。日本地主資產階級的野心是很大的，為了南攻南洋群島，北攻西伯利亞起見，採取中間突破的方針，先打中國。那些認為日本將在佔領華北、江浙一帶以後適可而止的人，完全沒有看到發展到了新階段迫近了死亡界線的日本帝國主義，已經和歷史上的日本不相同了。我們說，日本的出兵數和進攻點有一定的限制，是說：在日本一方面，在其力量基礎上，為了還要

舉行別方面的進攻並防禦另一方面的敵人，只能拿出一定程度的力量打中國打到它力所能及的限度為止；在中國一方面，又表現了自己的進步和頑強的抵抗力，不能設想只有日本猛攻，中國沒有必要的抵抗力。日本不能佔領全中國，然而在它一切力所能及的地區，它將不遺餘力地鎮壓中國的反抗，直至日本的內外條件使日本帝國主義發生了進入墳墓的直接危機之前，它是不會停止這種鎮壓的。日本國內的政治只有兩個出路：或者整個當權階級迅速崩潰，政權交給人民，戰爭因而結束，但暫時無此可能；或者地主資產階級日益法西斯化，把戰爭支持到自己崩潰的一天，日本走的正是這條路。除此沒有第三條路。那些希望日本資產階級中和派出來停止戰爭的，僅僅是一種幻想而已。日本的資產階級中和派，已經作了地主和金融寡頭的俘虜，這是多年來日本政治的實際。日本打了中國之後，如果中國的抗戰還沒有給日本以致命的打擊，日本還有足夠力量的話，它一定還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亞，甚或兩處都打。歐洲戰爭一起來，它就會幹這一手；日本統治者的如意算盤是打得非常之大的。當然存在這種可能：由於蘇聯的強大，由於日本在中國戰爭中的大大削弱，它不得不停止進攻西伯利亞的原來計劃，而對之採取根本的守勢。然而在出現了這種情形之時，不是日本進攻中國的放鬆，反而是它進攻中國的加緊，因為那時它只剩下了向弱者吞剝的一條路。那時中國的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持久戰的任務，就更加顯得嚴重，更加不能絲毫懈氣。

(一一二)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制勝日本的主要條件，是全國的團結和各方面較之過去有十百倍的進步。中國已處於進步的時代，並已有了偉大的團結，但是目前的程度還非常之不夠。日本佔地如此之廣，一方面由於日本之強，一方面則由於中國之弱；而這種弱，完全是百年來尤其是近十年來各種歷史錯誤積累下來的結果，使得中國的進步因素限制在今天的狀態。現在要戰勝這樣一個強敵，非有長期的廣大的努力是不可能的。應該努力的事情很多，我這裏只說最根本的兩方面：軍隊和人民的進步。

(一一三) 革新軍制離不了現代化，把技術條件增強起來，沒有這一點，是不能把敵人趕過鴨綠江的。軍隊的使用需要進步的靈活的戰略戰術，沒有這一點，也是不能勝利的。然而軍隊的基礎在士兵，沒有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於軍隊之中，沒有進步的政治工作去執行這種貫注，就不能達到真正的官長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發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戰熱忱，一切技術和戰術就不能得著最好的基礎去發揮它們應有的效力。我們說日本技術條件雖優，但它終必失敗，除了我們給以殲滅和消耗的打擊外，就是它的軍心終必隨著我們的打擊而動搖，武器和兵員結合不穩。我們相反，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軍隊的政治工作的基礎。軍隊應實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廢除封建主義的打罵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這樣一來，官兵一致的目的就達到了，軍隊就增加了絕大的戰鬥力，

長期的殘酷的戰爭就不患不能支持。

(一一四)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我們方面，軍隊須有源源不絕的補充，現在下面胡幹的“捉兵法”、“買兵法”，亟須禁止，改為廣泛的熱烈的政治動員，這樣，要幾百萬人當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財源十分困難，動員了民眾，則財政也不成問題，豈有如此廣土眾民的國家而患財窮之理？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於天下，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

(一一五) 很多人對於官兵關係、軍民關係弄不好，以為是方法不對，我總告訴他們是根本態度(或根本宗旨)問題，這態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從這態度出發，於是有各種的政策、方法、方式。離了這態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錯的，官兵之間、軍民之間的關係便決然弄不好。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軍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敵軍。這些原則要實行有效，都須從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經放下武器的敵軍俘虜的人格這種根本態度出發。那些認為不是根本態度問題而是技術問題的人，實在是想錯了，應該加以改正才對。

(一一六) 當此保衛武漢等地成為緊急任務之時，

發動全軍全民的全部積極性來支持戰爭，是十分嚴重的任務。保衛武漢等地的任務，毫無疑義必須認真地提出和執行。然而究竟能否確定地保衛不失，不決定於主觀的願望，而決定於具體的條件。政治上動員全軍全民起來奮鬥，是最重要的具體的條件之一。不努力於爭取一切必要的條件，甚至必要條件有一不備，勢必重蹈南京等地失陷之覆轍。中國的馬德里在什麼地方，看什麼地方具備馬德里的條件。過去是沒有過一個馬德里的，今後應該爭取幾個，然而全看條件如何。條件中的最基本條件，是全軍全民的廣大的政治動員。

（一一七）在一切工作中，應該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因為只有這種方針才能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才能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關係、軍民關係，才能發動全軍全民的全部積極性，為保衛一切未失地區、恢復一切已失地區而戰，才能爭取最後勝利。

（一一八）這個政治上動員軍民的問題，實在太重要了。我們之所以不惜反反復復地說到這一點，實在是沒有這一點就沒有勝利。沒有許多別的必要的東西固然也沒有勝利，然而這是勝利的最基本的條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全軍全民的統一戰線，決不僅僅是幾個黨派的黨部和黨員們的統一戰線；動員全軍全民參加統一戰線，才是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根本目的。

結論

（一一九）結論是什麼呢？結論就是：“在什麼條

件下，中國能戰勝並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呢？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就中國人民的立場來說，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這個戰爭要延長多久呢？要看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實力和中日兩國其他許多決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很快實現，戰爭就要延長。但結果還是一樣，日本必敗，中國必勝。只是犧牲會大，要經過一個很痛苦的時期。”“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除了調動有訓練的軍隊進行運動戰之外，還要在農民中組織很多的游擊隊。”“在戰爭的過程中……使中國軍隊的裝備逐漸加強起來。因此，中國能夠在戰爭的後期從事陣地戰，對於日本的佔領地進行陣地的攻擊。這樣，日本在中國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氣行將頹靡。中國方面，則抗戰的潛伏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眾不斷地傾注到前線去，為自由而戰爭。所有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來，就使我們能夠對日本佔領地的堡壘和根據地，作最後的致命的攻擊，驅逐日本侵略軍出中國。”

（一九三六年七月與斯諾談話）“中國的政治形勢從此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一階段的最中心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爭取抗戰勝利的中

心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只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後的勝利。”“由於當前的抗戰還存在著嚴重的弱點，所以在今後的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卻，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和局部的妥協等不利的情況。因此，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但我們相信，已經發動的抗戰，必將因為我黨和全國人民的努力，衝破一切障礙物而繼續地前進和發展。”（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這些就是結論。亡國論者看敵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勝論者看敵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這些都是錯誤的。我們的意見相反：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後勝利是中國的——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一二〇）我的講演至此為止。偉大的抗日戰爭正在開展，很多人希望總結經驗，以便爭取全部的勝利。我所說的，只是十個月經驗中的一般的東西，也算一個總結吧。這個問題值得引起廣大的注意和討論，我所說的只是一個概論，希望諸位研究討論，給以指正和補充。

——毛澤東《論持久戰》（1938年5月26日）

《論持久戰》系統總結中國革命戰爭中以弱戰強的經驗教訓，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深刻分析戰爭的形勢和特點，科學預見了抗日戰爭前景和進程，明確指出勝利的道路和方法。《論持

久戰》的發表，大大提高了全國人民堅持抗戰的信念，使毛澤東得到愈來愈多人的欽佩與尊重。一部《論持久戰》凝成國共兩黨抗日戰略共識，正面戰場的“持久消耗”戰略，與敵後戰場“持久制勝”戰略遙相呼應，成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中國抗日戰爭的發展正如毛澤東所料，特別是敵後戰場抗戰的實踐，正是按照《論持久戰》的理論和戰略指導，一步一步走向勝利的。

第六章

眾志成城奮勇抗戰 ——最終打敗日本帝侵略者

1941年至1942年，是中國敵後抗戰最為困難的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敵後抗日根據地，既要對付日軍、偽軍的“掃盪”和“清鄉”，又要和國民黨頑固勢力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作鬥爭，各抗日根據地在財政經濟上面臨嚴重困難。日軍為了盡快征服中國，對華北、華中和華南的抗日根據地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進行空前殘酷的毀滅性的“掃盪”和“清鄉”，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

1940年秋，國民黨停止向八路軍發放軍餉、彈藥等軍需物資，並對抗日根據地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斷絕外界對陝甘寧邊區和抗日根據地的援助。陝甘寧邊區內的各抗日根據地遭受了嚴重的旱、病、水、雹、風等自然災害，災情幾乎遍及每一個縣。陝甘寧邊區只有140萬老百姓，是一個地廣人稀的

地區，土地也比較貧瘠，要保證供給軍隊和機關學校人員的衣食需要是相當困難的。

早於 1939 年 2 月 2 日，毛澤東在延安生產動員大會上針對抗日根據地日益嚴重的經濟困難局面，指出：「要繼續抗戰，就需要動員全中國的人力物力。要發動人力，就要實行民權主義；要動員物力，就要實行民生主義。今天的生產動員大會，也就是實行民生主義的大會。陝甘寧邊區有 200 萬居民，還有四萬脫離生產的工作人員，要解決這 204 萬人的穿衣吃飯問題，就要進行生產運動。」¹³並號召陝甘寧邊區軍民“自己動手，生產自給”，要求部隊在不妨礙作戰的條件下參加生產運動。

在部隊的帶動下，機關和學校也開展了大規模的生產運動。毛澤東和地方各部門負責人都帶頭開荒生產，實現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目標。通過大生產運動，各抗日根據地解決了嚴重經濟困難，從而為抗日戰爭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提供

13 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22頁。

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虛心聽取，不恥下問

1941年11月6日，陝西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在延安大禮堂舉行，應邀出席的有農民、工人、幹部和黨外民主人士。在這次會議上，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了一個“精兵簡政”的議案，其主要內容是：「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國大業，兵要精，政要簡，行政機構要以質勝量，提高工作效能。」事前有一些民主人士因對共產黨能否採納建議有懷疑，曾數度勸阻他不要提出。但他看到毛澤東參加大會、小會，找參議員談話，仔細聽取對政府的批評建議，深深感到共產黨與黨外人士合作是出於至誠，就大膽地提了出來。

這個議案提出來以後，在會上引起很大反響。有一些議員以為正值抗戰救國的緊要關頭，敵人以大量兵力向我們進攻，提倡精兵主義，部隊就不能發展，豈不等於束手就擒？有的人甚至懷疑李鼎銘先生提出這個方案的動機。

毛澤東對這個提案卻非常重視，反復翻看著這個提案，拿起紅筆把重要的段落圈了起來，又一字一句地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旁邊還加上一段批語：「這個辦法很好，恰恰是改進我們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症藥。」

“精兵簡政”議案提交大會討論時，李鼎銘先生剛發完言，毛澤東就站起來，一邊鼓掌一邊走到台前，極其深刻而生動地闡述了實行精兵簡政的必要性。他說，正像人穿衣服，冬天穿得多，那麼隨著天氣的變熱，就應該逐漸脫衣服，到了夏天就穿得很少了。這個道理同樣適用於我們的隊伍。在抗戰初期，採取精兵主義自然是不對的，但現在情況不同了，全面抗戰已經四五年了，人民經濟有很大困難，而我們的大機關和不精幹的部隊，又不適合今天的戰爭環境。教條主義就是不管環境變了，還是死啃不合時宜的條文。毛澤東同時對黨內同志的宗派主義情緒進行了批評，嚴肅地指出，我們的黨是為人民服務的，不論誰提出的意見，只要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辦。

11月18日，“精兵簡政”議案提交參議會，最終以165票的多數通過審查意見。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精兵簡政議案順利通過並在陝西甘寧邊區實施，對於減輕人民負擔，度過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堅持持久抗戰，起了重大作用。¹⁴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每個人的智慧和能力都是有限的，這就需要懂得尋求幫助，認真聽取意見，敢於不恥下問。眾人之中蘊藏著巨大的智慧和創造能力。我們不妨虛心向身邊的人學習，包括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只有堅持虛心聽取，不懂就問，才能不斷豐富自身的知識，獲得無窮無盡的智慧源泉。

作為領導，即使自己的地位再高，也應該鼓勵下屬提出自己的看法，讓下屬經常有提供或反饋意見的機會。如果領導傾聽並考慮採納下屬的意見，會讓下屬更為擁護決策。

14 參見嚴奉平主編，《跟毛澤東學智慧》，頁203-204。

練習忍耐，顧全大局

1943年3月20日，毛澤東以中共主席的身份領導了第七次代表大會，成為中共的真正領導者。1943年10月，抗日戰爭後期，代軍長陳毅和代政委饒漱石在工作中發生了一些矛盾，饒漱石藉整風之機，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幹部批鬥陳毅。陳毅給毛澤東去信，訴說自己受饒漱石排擠的冤屈。

毛澤東為此復信陳毅，給予勸導：「如果你要談華中抗戰的經驗，我可以召集個會議，讓你談三天三夜。如果你要談與饒漱石的問題，我看還是一句話也不要提……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點，增益其所不能，照顧大局，只要不妨礙大的原則，多多原諒人家。忍耐最難，但作為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¹⁵

這番話解開了抑鬱在陳毅心中的委屈，幫助其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工作之中。

15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頁505。

常言道：「小不忍則亂大謀。」毛澤東可謂深諳此道，有著相忍為國的偉人胸懷。毛澤東對陳毅的這番話雖針對當時，卻也適用於今日。忍耐是自我控制的智慧，成大事的人必有寬闊大度的氣量，成大事的路就是一條忍耐之途。容天下能容之事，忍天下能忍之事；有容乃大，能忍則善。毛澤東也正是在不斷克服自身弱點的過程中，逐漸成熟並磨練成為人民擁戴的偉大領袖。

但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學會忍耐，並不意味著一味無原則的忍讓，不是消極頹廢的逆來順受，而是顧全大局，審時度勢，不計較得失，在忍耐中鏗而不捨地追求目標。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1944年夏，中央警備團戰士張思德¹⁶為響應黨中央開展大生產運動的號召，主動報名到陝北安塞縣執行燒炭任務，發揮了共產黨員的不怕苦、不怕

16 張思德，四川儀隴人，1933年12月參加紅軍，經歷過長征，曾經負過傷，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累、不怕髒精神。9月5日，碳窯在雨中突然崩塌，張思德奮力把戰友推出窯口，自己卻被埋在土堆裏不幸犧牲，犧牲時年僅29歲。

9月8日，毛澤東在張思德的追悼會上，以《為人民服務》為題發表講演：

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張思德同志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志。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麼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採用了。只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

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我們今天已經領導著有九千一百萬人口的根據地，但是還不夠，還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鬥。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儘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幹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今後我們的隊伍裏，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裏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託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1944年9月8日）

這次講演內容成為毛澤東著作中的經典名篇。毛澤東把“為人民服務”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和價值觀，在全黨全軍中鮮明地樹立起來。

此後，毛澤東在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一文中，進一步闡述了“為人民服務”，他指出：「我

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它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誌，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繫。**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

下定決心，愚公移山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出席的代表共755名，代表全黨121萬黨員。6月11日，毛澤東致閉幕詞：

我們開了一個很好的大會。我們做了三件事：第一，決定了黨的路線，這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

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第二，通過了新的黨章。第三，選舉了黨的領導機關——中央委員會。今後的任務就是領導全黨實現黨的路線。我們開了一個勝利的大會，一個團結的大會。代表們對三個報告發表了很好的意見。許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評，從團結的目標出發，經過自我批評，達到了團結。這次大會是團結的模範，是自我批評的模範，又是黨內民主的模範。

大會閉幕以後，很多同志將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去，將要分赴各個戰場。同志們到各地去，要宣傳大會的路線，並經過全黨同志向人民作廣泛的解釋。

我們宣傳大會的路線，就是要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建立起一個信心，即革命一定要勝利。首先要使先鋒隊覺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但這還不夠，還必須使全國廣大人民群眾覺悟，甘心情願和我們一起奮鬥，去爭取勝利。要使全國人民有這樣的信心：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不是反動派的。中國古代有個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說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華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門南面有兩座大山擋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決心率領他的兒子們要用鋤頭挖去這兩座大山。有個老頭子名叫智叟的看了發笑，說是你們這樣幹未免太愚蠢了，你們父子數人要挖掉這樣兩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說：我死了以後有我的兒子，兒子死了，又有孫子，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這兩座山雖然很高，卻是不會再增高了，挖一點就會少一點，為什麼挖不平呢？愚公

批駁了智叟的錯誤思想，毫不動搖，每天挖山不止。這件事感動了上帝，他就派了兩個神仙下凡，把兩座山揹走了。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麼挖不平呢？

昨天有兩個美國人要回美國去，我對他們講了，美國政府要破壞我們，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反對美國政府扶蔣反共的政策。但是我們第一要把美國人民和他們的政府相區別，第二要把美國政府中決定政策的人們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員相區別。我對這兩個美國人說：告訴你們美國政府中決定政策的人們，我們解放區禁止你們到那裏去，因為你們的政策是扶蔣反共，我們不放心。假如你們是為了打日本，要到解放區是可以去的，但要訂一個條約。倘若你們偷偷摸摸到處亂跑，那是不許可的。赫爾利已經公開宣言不同中國共產黨合作，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到我們解放區去亂跑呢？

美國政府的扶蔣反共政策，說明了美國反動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動派的阻止中國人民勝利的企圖，都是註定要失敗的。現在的世界，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動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動的逆流企圖壓倒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動的逆流終究不會變為主流。現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說過的一樣，舊世界有三個大

矛盾：第一個是帝國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個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第三個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帝國主義宗主國之間的矛盾。這三種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發展得更尖銳了，更擴大了。由於這些矛盾的存在和發展，所以雖有反蘇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這種反動逆流總有一天會要被克服下去。

現在中國正在開著兩個大會，一個是國民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一個是共產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兩個大會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個要消滅共產黨和中國民主勢力，把中國引向黑暗；一個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中國封建勢力，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把中國引向光明。這兩條路線在互相鬥爭著。我們堅決相信，中國人民將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大會的路線的領導之下，得到完全的勝利，而國民黨的反革命路線必然要失敗。

——毛澤東《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

毛澤東通過愚公移山的故事，教育黨員學習愚公為子孫後代謀利的精神，要堅忍不拔努力不懈，把壓在中華民族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這兩座大山挖掉。早於1938-1939年，他為了使黨員充分理解持久戰的偉大意義，樹立抗戰必勝決心，曾在

講演中兩次講到愚公移山的故事。愚公移山精神成為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戰勝一切困難險阻、戰勝一切頑敵強敵，最後走向勝利的強大精神動力。

重慶談判，團結一切抗日政黨及愛國志士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頒布《停戰詔書》，宣告日本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東京灣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正式簽署投降書，標誌著中國抗日戰爭取得完全勝利。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打出了「和平」的旗號，於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發電報給毛澤東，邀請他速到重慶，「惠然一行，共定大計」，並表示非毛澤東親自赴渝則不能解決國是，態度十分「懇切」。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是：如果毛澤東拒絕談判，則可安上拒絕談判、蓄意內戰的罪名，使他在政治上處於有利地位；如果同意談判，則可通過談判爭取時間，調兵遣將，部署內戰。但是毛澤東早已識破蔣介石的陰謀，並做出了「爭取和、準備打」的兩手準備，與其展開了鬥智鬥勇的較量。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與蔣介石代表張治中和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陪同下，從延安乘飛機抵達重慶。毛澤東在機場對中外記者發表書面談話：「本人此次來渝，係應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先生之邀請，商討團結建國大計。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國內政治上軍事上所存在的各項迫切問題，應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加以合理解決，以期實現全國之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希望中國一切抗日政黨及愛國志士團結起來，為實現上述任務而共同奮鬥。本人對於蔣介石先生之邀請，表示謝意。」晚上8時半，蔣介石在山洞林園為毛澤東等人舉行了歡迎宴會。席間，毛澤東稱蔣介石為“委員長”，蔣介石則稱毛澤東為“潤之”。當晚，應蔣介石挽留，毛澤東住在山洞林園。

國民黨作為談判的發起者，雖然再三邀請毛澤東赴渝共商「國是」，但並沒有準備任何談判方案，

一切提案均由中國共產黨提出。9月3日，毛澤東首先提出了談判八項原則，其中心是和平、民主與團結。同日，中共代表將擬定的談判具體方案11項交與國民黨。

毛澤東在談判中，為了避免和談破裂，為了迫使蔣介石兌現其民主的承諾，為了爭取全國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為了揭穿所謂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中國共產黨在一系列問題上表現極大的克制和讓步。在關於解放區政權和人民軍隊問題，毛澤東作出了重大讓步。但軍隊縮編、解放區、國民大會等問題還沒有解決。

經過43天的艱苦談判，1945年10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簽訂《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並公開發表。國民黨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雙方協議“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雙方還確定召開各黨派代表及無黨派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和平建國大計。這是

重慶談判最重要的兩項成果。此外，談判還達成迅速結束國民黨的“訓政”、實現政治民主化、黨派平等合法、釋放政治犯等協議。

毛澤東回到延安後起草了一份給各中央局並轉各區黨委的指示，對重慶談判作出這樣的評價：「雙十節國共協定今日公布。和平基本方針雖已奠定，但暫時許多局部的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仍不可避免，除粵、鄂、豫、浙及蘇南等地頑軍正在向我進攻外，沿平漢、津浦、同蒲、正太等路頑軍正在向我大舉進攻，爭奪北寧、膠濟、平綏三路的戰鬥亦將到來，我方必須提起充分注意，戰勝這些進攻，絕對不可以鬆懈。解放區問題未能在此次談判中解決，還須經過嚴重鬥爭。這個極端重要的問題不解決，全部和平建國的局面即不能出現。解放區軍隊一槍一彈均必須保持，這是確定不移的原則。目前尚談不到編整部隊問題，即將來實行編整時，我方亦自有辦法達到一槍一彈均須保存之目的。過去中央指示各地擴大軍隊整編主力計劃，繼續執行不變。東北問題未在此次談判中提出，我黨一切既定計劃照樣執

行。」

重慶談判充分體現了毛澤東的大智大勇，為了爭取和平和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澤東適當讓步而決不喪失原則，以真對假，有理有節，充分顯示出他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相統一的高超的領導藝術和談判技巧。談判中達成的《雙十協定》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和平、民主、團結的希望和曙光，為日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奠定了基礎。



聯繫我們

電話：+852 2681 1238

網址：www.12268341.com

www.12268341.org

可隨時登入網站，跟毛澤東填詞作詩！

電郵：fu@12268341.com

地址：香港上環干諾道中158號開橋商業大廈21樓



黃金富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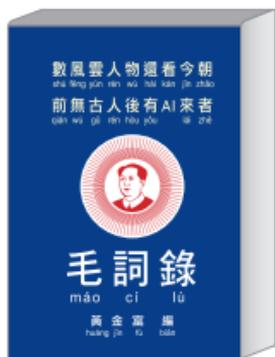
ISBN : 978-988-70287-0-3
出版 : 2023 年 11 月



ISBN : 978-988-76591-0-5
出版 : 2022 年 10 月 16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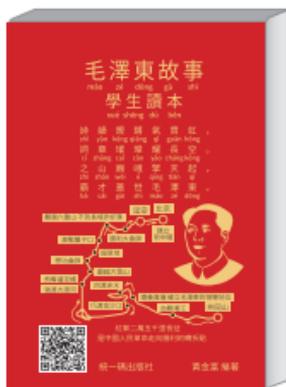
ISBN : 978-988-76591-2-9
出版 : 2023 年 7 月 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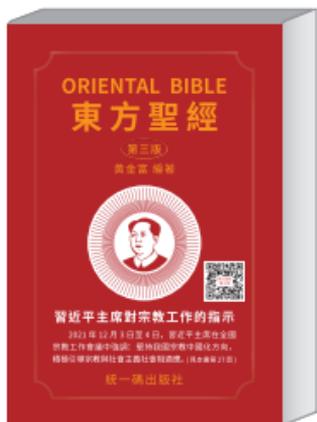
ISBN : 978-988-76591-1-2
出版 : 2023 年 3 月 6 日



ISBN : 978-988-70287-1-0
出版 : 2024 年 11 月



ISBN : 978-988-70287-4-1
出版 : 2025 年 6 月 18 日



ISBN : 978-988-70287-3-4
出版 : 2025 年 1 月



ISBN : 978-988-70287-6-5
出版 : 2025 年 7 月 24 日

如需上述書的電子版，
請用手機掃描右方二維碼，
或到以下網址下載：



<https://book.92281668.com>

ISBN 978-988-70287-6-5



9 789887 028765

定價：港 幣 68 元
人民幣 62 元